

92
K250.6
2:24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四辑
(总第124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组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

016882

责任编辑：沈美娜

《文史资料选辑》

第24辑

(总124辑)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北京上装订厂装订

*

1992年3月第一版·1992年3月第一次印刷

29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 字数：171千字

印数：1—10 000册

ISBN 7-5034-0580-5/K·3 86

定价：3.50元

18

目 录

· 人物述林 ·

- “福将”唐生明 沈 醉(1)
程潜将军二三事 陆炳熊(18)
易培基其人其事 唐士亮(27)
- 邵元冲日记选编
(1936年5月至8月)..... 郭军丽选编(35)

· 北洋军阀史料 ·

- 北伐军与五省联军之战 田韵清 潘振英(74)
我参加孙传芳飞机队的经历 陈栖霞(78)
孙传芳“五省联军”被改编及覆灭 苏桂荣(83)

· 抗日史料 ·

- 台儿庄战役亲历记 王仲廉(90)
抗战时期西南区的军邮 张人权(100)
溪口大轰炸 夏明曦(108)
祁零煤矿内迁亲历记 孙锡华(110)
马华抗日运动回忆录 王炎之(124)

· 工商史料 ·

- 上海票据交换所十八年朱博泉(138)
原中央银行总行迎接解放经过李立侠(152)

· 军统内幕 ·

- 戴笠与重庆豁庐张威信(158)
有关军统兰训班的一段回忆古汉民(165)

· 走向光明 ·

杨叔明反蒋倒王及策反十五兵团

- 起义经过 长白山(170)
军校末期起义前后谷云鹏(190)

狱中八年记(下)周春晖(198)

附录：盛世才新疆十年及“阴谋暴动案”

- 大事记(216)

“福将”唐生明

沈 醉

唐生明先生乃唐生智将军的胞弟。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长沙警备司令部代理司令、常桃警备司令、国民党总统府中将参军等职。他早年先后做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学生，所以结交了不少在共产党内的朋友，并为共产党做了不少好事。解放前夕，他协助共产党策动湖南和平运动，险遭特务暗杀。解放后，他在香港通电起义，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为祖国统一做了不少工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任常桃司令的日子里

1938年初，唐生明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代理司令。他这一职务被常德警备司令兼湖南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区保安司令鄧悌看中了，要与他对调。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治中也同意他们对调。唐是因他大哥唐生智的关系去长沙的，因不管事，张又不便撤换他，所以鄧悌一提出对调，正合他的心意。鄧很跋扈，但很能干。长沙是湖南省会，治安相当乱，正需要一个这样敢作敢为的人。而常德偏在湘西，比长沙安静得多，所以唐也愿意去。我当时正在常德附近的临澧县军统局办的特务训练班任行动术教官，常去常德看望唐生明。有次他约我去他家中吃便饭，边吃饭他边提出希望我到常德去当他警备司令部的稽

查处处长。我连连摇头说：军统的人事制度很严，不允许私人活动工作。他说这不是私事而是公事。因为他调常德时，军统局便照戴笠的指示，挑了一个黄埔四期毕业、唐的同班同学邓墨村去当他的稽查处长。邓为人拘谨，怕出事，大小事都向他请示。唐是一个不爱管事的人，所以不到一个月便感到这样太麻烦。而我和他过去认识，便希望我去。我还是认为邓墨村如果没有犯错误，没有理由调动他。唐表示 he 可以和戴笠亲自去说，唐的夫人徐来，还有住在唐家的戴笠的女友张素贞与我都相识，她们也表示，见到戴笠，一定要他答应调我去的事。不久，戴笠从武汉去临澧特训班视察训练工作，路经常德，经他们三人一说，戴笠果然同意调我去接替邓墨村当了常德（以后改为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兼第二区保安司令部侦察组组长。

我刚到常德，军统局便派了几辆卡车到常德，由军统局特务总队一个大队长拿了戴笠的亲笔信给唐生明。他们先找到我，由我带去见唐。原来是戴笠上次在常德时，看到警备司令部一个特务连的士兵正在下操，他一眼看中了这个身材高大结实而且一律配备驳壳枪的连队，便向唐提出，要他把这个连的士兵、武器、装备等都送给军统。因军统局刚成立不久的特务总团三个武装大队还差几个中队。唐一口答应了。所以戴笠回到重庆便派人派车来常德接运这个连去重庆。唐看到戴笠的信后，马上把那个连的连长等找来，说他已把这个连送给军统局了，要他们通知全连官兵，加发两个月的薪饷，马上料理一下家务等私事，三天后便动身。我一看他那么随便就把一个特务连送掉了，反而有点着急，因为这个连不但担任警备司令部和稽查处的门岗警卫，而且城区有什么事，稽查处还随时要调动这个连去搞镇压。我便问他：“特务连送掉了，谁来担任警卫等工作？”他说：“我不是要他们三天后才动身，三天内我不就可以从区保安司令部指挥的几个保安团中抽调一个连来接替特务连的工作？”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早已胸有成竹，估计他答应了戴笠以后，便已作好准备了。

唐生明刚到常德，还认为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吃的几家菜馆也觉得不合口味。不久，长沙大火，一夜之间城为瓦砾。在全国一致责难声中，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徐昆三被拿来当替罪羊公开枪决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传到常德时，唐生明和夫人徐来、张素贞和我正在参加常德商界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唐一听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高兴地说：“如果我不调到常德，这顿饭早就吃不成了。”我也补充一句：“常德菜馆的菜虽比长沙差一点，但却安全得多。”在座的无不举杯祝贺，说他是名不虚传的“福将”。

我为了调整稽查处的工作，花了不少时间，把全城都跑遍了。当我去向唐汇报稽查处的工作部署情况时，他突然提出两个我不了解的地方，叫我要经常派人去那里巡察。我很奇怪，他怎么会比我还清楚常德的地形。他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多年前，他大哥当第八军军长他当团长时，驻军在常德。他大哥对他管教很严，为了不让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的床拦在他的房门口，免得他出去。而这位风流惯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从哥哥床铺底下爬了出去。第二天天快亮时又从床铺底下爬了回来。他的话刚说完，徐来便说：“现在你要晚上出去玩，我替你吧房门打开，不让你再从床底下爬出去了。”唐听了一阵大笑，连说：“现在有这么漂亮的太太，打我也打不出去了。”玩笑开过之后，唐便告诉我，这是些暗娼居住的地方，最易窝藏盗贼，所以要加倍小心。

我和唐在一起工作时，有一个口头约定：稽查处该办的事，我可以放手去办；即使是杀人杀错了，他也愿为我负责，凡事都可以先办了再去告诉他；但若涉及到共产党问题的案件时，却一定要先告诉他，不准随便处理。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是知道如何处理的。他便很认真地告诉我：军统可不管什么合作不合作，抗战刚开始，在上海、武汉不照样秘密抓共产党？他还强调在他主管的地区内决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我便向他保证：在常德地区和第二行政区内，我一定照他的指示办，不随便

抓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案有关的人。所以，在那两年多的时间中，这个地区虽然发现过一些与共产党有关的进步活动，由于唐的关系，没有造成捕人或行凶等暴行。

有天我接到常德汽车站检查所长的电话，说司令官自己开车带两名卫士到检查站，坐也不坐一下，便站在检查站停车检查的公路上，不知道是要做什么？我立即赶去。只见他军服整齐地站在停车检查的栏杆前的公路上，朝从长沙来车的方向张望。我跑过去问他有什么事？他只向我摇摇手，要我去检查站休息，不要站在他身边。我便转身去和检查所长谈话。不一会儿，从长沙方向开来一辆小车，他上前去看了一下，马上向车内的人敬了一个军礼之后，便把手一扬，叫检查人员把栏杆高举，让汽车通过，车内的人也没有下车。唐看到汽车向沅陵公路上驶去，自己也跳上车尾随而去。我立即通知桃源汽车检查站作好准备，司令官陪送客人的汽车一到，立即举绿旗放行，不准阻拦，更不要办理一切登记手续。打完电话，我亲自在检查所等候。过了两个小时后，唐才开车回来。他邀我上车一起到他的家，坐下来之后，我才问：“刚才送谁走？”他先不答复我，而是狠狠地吸了几口烟才反问我：“你猜是谁？”我摇摇头，心想许多人都说他是直肠子、存不住话的人，怎么今天居然能把这件事保密到这种程度。他见我猜不出，才用得意的口吻说：“我刚才护送出境的是周恩来。”我立即问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副主席？”他连连点头。我真感到惊异，一位共产党的副主席打从我这里经过，我事前毫无所知，怎么向军统局作交代？他见我在思忖，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告诉我，他是接长沙来的电话，知道周恩来要乘车经常德、沅陵去重庆，所以亲自护送出境，还打了电话给沅陵警备司令孙常钧，要他亲自负责护送出境。他说周恩来是他的老师，他在共产党中有不少朋友，过去共产党在平江、浏阳活动时没有枪弹，他还送过一批，“后来这批枪也被拖上了井岗山。当时有人把这件事向蒋介石告了密，他只是挨了一顿骂。他说他什么样的朋友都交，他不管什么主义不主

义，只要是认为可交的朋友，就是掉脑袋也不在乎。我从他家出来，立即用加急电向戴笠和军统局报告：唐生明护送周恩来过境，事前不告诉我，以及他和共产党人交朋友等。戴笠没有给我回电，只有军统局指示我：“继续注意，随时电告。”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唐生明在用人方面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可以放手做事，他从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当时一般爱抓权的主官批公文时，往往详细、具体地批上自己的意见，要部下去办；有的则批交主管人员拟具体办法呈阅后再决定；有的对部下信任的便只批：某某单位办。而唐生明批公文时，大多是只批两个字，如交参谋处办的则批“参办”，交稽查处办的批“稽办”。他也不主动去查问批办的事如何？有时部下找他去汇报，他总是说：“办好就行了！”由于他这样对人对事，他的左右亲信便钻这一空子，常常使他上当吃亏。而最使他头疼的是常德警备司令部刚扩大为常桃警备司令部的時候，准备去桃源设一办事处，代行司令部职权。原任桃源县县长刘某，因任意鱼肉百姓，被人告发而免职。他一听要在桃源成立警备司令部办事处，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如果能把这个办事处主任弄到手，不但可以狠狠地报复一下过去告发他的人，还可以驾轻就熟，大捞一把。他不惜花本钱去唐的左右大肆活动。唐听了他的副官处长吕某的话，居然同意让刘去当桃源办事处主任。我听到这消息，马上就去见唐，力主不可再让刘某回桃源，即使要用他，也只能去第二行政区内给他别的职务。唐认为出过一次毛病的人，一定会谨慎小心，决不敢再乱来。不久，他发表刘某为常桃警备司令部驻桃源办事处主任。这个主任有许多地方比县长权大得多，因为抗战时期是“军事第一”，警备司令部根据紧急治罪法，可以先斩后奏。刘某上任后，除了用种种办法去惩罚告发过他的人外，连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直至发

展到借口乱杀人。有一次他竟先斩后奏一口气枪决了六个人。六条人命毕竟不是小事，死者家属到处去控告，连素不怕事的唐生明也感到有点麻烦。我力主把此人扣押交军法审讯，以免唐代人背过。唐还在犹豫时，刘某连夜弃职携眷潜逃。我一听到这一消息，只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唐生明，便带了两个特务跟踪追去。我估计此人一定是逃往云南，因当时云南还在龙云统治下，逃往云南的一些政治、刑事等犯，不能随便去逮捕，而且可以逃往国外去。我害怕他逃走了，一切责任都归到唐的身上。我赶到贵阳的第二天，刘某携带家眷才到贵阳，一下车就被我抓到了。唐生明把此人解押长沙去归案时，也自请处分。

当时在湖南负责的军政首要大都和唐生明、唐生智有深交，对唐生明自请处分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主犯刘某已逮捕归案了。不过当时驻在常德的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陈诚系的骨干。陈诚系和戴笠系是对头，霍认为唐与戴有关，早就不满意唐，看到唐提出自请处分而竟没有人处分他，非常气愤，便向湖南省负责人建议，既有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常桃警备司令部没有存在的必要，请求撤销，只保留原常桃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常德的治安，这样就等于是对唐的处分。霍揆彰本想把稽查处借此机会抓过去，派他的人来当处长，结果由于这些稽查处和警察局一贯是由军统的人担任，他没有能抓到手。稽查处改为军警稽查处，仍由我任处长，不过要受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的节制。

当我把这一切情况向戴笠和军统局汇报后，戴笠马上发来一电由我转唐，说有要事面商，传唐马上去重庆。唐接到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后，即囑副官处长吕某等负责办理结束工作，他自己则带着徐来和张素贞先回湖南东安老家去看望他的父母亲去了。他原来兼任的第二行政区专员一职，因一年多前便已让给了他的同乡冯天柱。此人原在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时，做过民政厅厅长，资格很老，唐自忖搞行政不是内行，所以向省政府推荐冯担

任行政专员，他兼的第二区保安司令也在撤销常桃警备部时，交给了冯天柱兼任，结束工作便很顺利完成了。他走不久，我也被调往重庆。

奉蒋之命当“汉奸”

我到重庆去见了戴笠，知道蒋介石已决定派唐生明去南京参加汪逆政府工作，专门负责搜集重要情报。戴笠决定派我去担任唐的助手，任务有两个：一是主持在沦陷区的暗杀工作，二是要设法保护唐及其家属的安全。当天晚上，戴笠邀唐去吃晚饭，也要我去作陪，我才知道唐把徐来和张素贞暂时安排去湖南老家，等他工作决定后再去接她们。戴笠边吃饭边告诉唐：他考虑再三，认为还是派我去协助他工作比较合适，唐也很高兴，说希望我能再和他合作。戴笠要我先去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在军统掌握的编练处正调训的便衣混城队队员中，挑选一百到两百名下级军官，施以破坏、暗杀等行动术的训练后，即由我率领分批混入上海、南京等地，配合唐在沦陷区工作。

唐生明在蒋介石亲自接见当面指示他去南京、上海的工作任务后，很高兴。因为这一特殊任务当时真是只有他能顺利完成，因为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曾经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生活上的享受远比后方要舒适得多。朋友们都知道，他最爱吃喝玩乐。若说是受不了重庆的苦而去上海，南京是会有人相信的，他自己也很愿意。但他的大哥唐生智却很反感。唐生智认为：自己是坚决抗日的将领，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敌，别人不知道他是奉派接受了特殊任务，还以为自己会同意弟弟去当汉奸。这置他自己于何地？所以他极力反对，两兄弟为此几乎吵了起来。唐生明说，他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见的，这次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为了劝说唐生智不要阻拦唐生明去南京，戴笠便亲自拜访他，结果并不理想。戴只好请蒋介

石给唐生智去了一个电话，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临行前唐生明去辞行，并恳求他写一封信给汪精卫，因过去唐与汪常有往来，私情还不错。唐生智一听要他写信给汪，更气愤异常，指着唐生明说：“你不顾一切，只图自己享乐，还想把我也搭进去。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攻击我，我如何自圆其说？你要去你就去吧！你见到汪精卫也不准提到我，我决不会再和他往来。”唐生明离开重庆飞桂林与徐来、张素贞一道前往香港时，只有我和军统局的人事主任李肖白去机场送他。我后来没有跟他去沦陷区，是因为南京方面已知道我要去的消息，所以，戴笠改派了他人。当时，唐生智生气没有去送行。戴笠则怕目标太大不便去，所以他走时显得很冷落。但在机场还是遇到几个熟人，他只说是去桂林准备回湖南，所以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去南京。

为了假戏真做，还得由唐生智出面登报声明与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当戴笠派李肖白去见他，说明等唐生明到了南京以后，便请他出面去报上刊登一则启事，说他与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唐生智余怒未消地对李肖白说：“一切都是由你们安排的，用不着找我，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李肖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后，戴笠连忙亲自赶去看他，说明这是为了抗日，为了党国等。据说唐生智还讽刺了戴笠几句，说：“为了抗日要派兵去抗，派人去投敌当汉奸怎么抗呢？”戴笠回来后虽然很气，但还得利用他一下才能达到假戏真做的目的。

唐生明偕徐来、张素贞从桂林经香港到达南京后，立即被汪精卫委派为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并在电台上大肆宣传唐生明已由重庆到达南京的消息。军统代替唐生智与唐生明所办的脱离兄弟关系的“启事”，也在重庆《中央日报》上以显著地位刊登出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也把这一启事连续播出多次，目的当然是让南京方面听到：唐生明的哥哥在骂他不肖，与他脱离了兄弟关系。当时一些不知内幕的人也在骂唐生明只图个人享受，不惜叛国投敌去当汉奸。

国民党也明令发表“通缉令”。这一“通缉令”也连续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当时南京方面也大肆宣扬，汪精卫亲自接见等。两边都闹了一阵。唐按照戴笠面授机宜：“开始不要多活动，生活上越腐化越好”来行动。这一点，迎合了唐的要求。而敌人开始也没有发觉他与重庆的关系，不到一年，戴笠就让他逐渐进行活动了。他在这几年中的情况，我曾替他写过一篇《我奉命投敌经过》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上，这里就不重述。

抗战刚一胜利，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了取消对唐生明的“通缉令”。原因很简单，因为奉命主持在沦陷地区指挥拘捕汉奸的军统头子戴笠一到上海，便住在唐的家中，如果不早取消对唐的“通缉令”，一个负责拘捕汉奸的军统头子，公然住在被通缉过的汉奸家中，怎么向沦陷区人民作交代？国民党办事虽拖拉，但这次在刚胜利可说百端待举中却能提前发布这个命令，主要是这个原因。

我于抗战胜利后去上海，第一个便是去看唐生明。他非常高兴，全家热情欢迎我。唐把我领着从前面到后面，从楼上楼下都看了一遍，说明他这几年的生活是很舒适的。不过他也受过不少惊吓，差一点被日本人杀掉；后来还是日本人从诱和蒋介石问题上考虑，虽发觉他与重庆有很深的关系，不但不杀害他，还派便衣保护他，以便有朝一日，可派他到重庆作为与蒋介石和谈的代表团成员。所以有些军统的潜伏特务被日本宪兵队捕获时，他还可以去作为担保人保释出来。而徐来却说：“几次把她吓得差点昏过去。”有次她以为日本宪兵队是来抓他们，因为军统大特务毛森被捕，唐托人去讲情，日本方面认为唐与毛森关系很深，想从唐口中了解到毛森关系，派一个宪兵小队长气势汹汹来找唐。幸好有人通知了周佛海，周打电话给日本宪兵队，才没有发生意外。因为当时日本特务机关各有一套，有的认为唐可利用，有的则希望通过唐，做一些对搜捕军统潜伏特务有帮助的事。所以徐来说，她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而唐生明却糊里糊涂只晓得享福。我却认为这

正是唐的高明地方，问题虽很严重，但表面上则装成满不在乎，才能从容应付复杂异常的环境。张素贞则说：“这是唐生明的长处，真正是‘大智若愚’。”唐却随便我们怎么说，总是照例一支接一支抽他的烟，轻轻一笑，从不作辩解。

我因听到不少人说唐在沦陷区几年中，保释和保护过不少军统特务，所以我便当面说他做了很多好事，许多人都感激他。而一向直率的他却出我意外地说，他为日本人和汉奸做的坏事比做的好事要多得多，否则日本人和汪精卫也不会相信他的。所以他很坦白地说，骂他恨他的人比说他好话的人要多几十倍。不过当时我不好意思追问他究竟给日本人和汉奸们做过哪些坏事。

美蒋特务合流的中美合作所于抗战胜利后宣布结束之前，便向国民党提出：美海军部门愿意协助国民党重建海军。因为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海军从中美所方面得到不少日本海军情报。最主要的一次情报是日本在雷伊泰湾集结所有剩余军舰准备与美方决一死战，在这一最紧急时刻适逢已被唐生明收买的周佛海赴日访问，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回上海后即密报军统，戴笠则转告美方后，经美海军密查证实，立即出动大批飞机、军舰，趁日军不备，突然发起猛攻，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剩余的全部主力部队，取得了美日海战的绝对优势。所以美海军为了酬报军统，决定将一批超龄军舰无偿赠送给国民党，条件是：希望仍与戴笠合作，无疑是想支持戴笠搞海军。所以蒋介石便指示戴笠拟海军总司令部的编制、人事等送他去考虑。戴笠召集军统一些主要人员商谈海军总司令部人事的时候，他首先提出三个人：参谋长唐生明，秘书长潘其武，副官长沈醉。毛人凤一听就说：潘任秘书长很适宜，因他原为中美所主任秘书，与美方有多年关系；我任副官长也恰当，因我搞了几年总务，对这方面有经验；唐任参谋长是否应再考虑？戴笠一听马上把手举起，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掰着说：“我知道你们对唐先生任参谋长有意见，但我认为他任参谋长：第一，他不爱管闲事，由他担任此职，决不会和我们有矛盾，只要

派一两个副参谋长去帮他主持，完全可以听我们的，第二，由他担任此职，蒋介石不会再去挑选别人，其他的人也不会来和他争这一职位；第三，他的人缘好，遇到棘手的事情请他出面周旋便可迎刃而解；第四，对外活动把他推出去，省掉许多麻烦……”他越说越起劲，似乎非唐莫属。所以大家也都认为这一安排很恰当。不过后来由于戴笠乘飞机摔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一职才落到桂永清头上。

抗战胜利后，戴笠在上海抢了几处花园洋房，但他却从不去住，总是住在唐生明家中。所以他摔死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所接收的敌伪产业中一部分珍贵文物、珠宝等物存放在唐家。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当面要我去唐家清点，因我主管清理军统在沦陷区接收的财产工作。我不得不去与唐商谈，但无任何证据。唐得知我的来意之后，便带我去戴笠在他家中住过的客房内进行清点，除几只装衣服的皮箱外，没有别的珍贵文物。我把这一情况向军统汇报时，在军统局务会议上还有人坚持戴有东西存在唐家，因戴笠在各地挑选精美物品时，从不给收条，高兴便拿走了。我后来在北平接收物品的清单上，看到戴笠在一只九龙杯和一把青锋剑下面用钢笔写了一个“笠”字，表示这两件名贵异常的古物，是他取走了。恰好他摔死时，在飞机附近居民拾到这两件宝物。我以此为例，说明戴笠没有东西存在唐家，一场纠纷才算平息。

戴笠死后，对唐生明的工作安排遇到一些麻烦，虽然对他的通缉令撤销了，人们也知道他是奉命投敌的，有些人对他毕竟给敌人做过不少事多少有些不同意见。所以蒋介石与郑介民、毛人凤研究之后，才决定发表他为保密局（军统后身）中将设计委员。唐对此很不高兴。因他不是军统成员，让他担任这一工作，这对他是一种冷遇；因胜利后，从敌人手中接收下来那么多地方，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工作，而把他安排这样一个闲职，的确出他意外。所以他这个设计委员，只到保密局去过两三次，连设计委员会办

公室他都没有去过，只在毛人凤的办公室坐一下就走了。

讲私交为汉奸说情

1947年秋，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局审讯汪逆政府陆军部长叶蓬时，唐生明多次从上海赶到南京，到处为叶蓬讲情。说叶蓬在敌伪时期，曾一再反对日寇抽调伪军出国作战，充当炮灰。由于叶蓬等坚决不同意，日寇这一阴谋才未能实现。他希望用这一点来减轻叶的罪行。当时军法局长是军统老同事徐业道，所以唐常邀我一道去徐家。我陪同前去时，总是一言不发。唐一再向徐说叶可以将功抵罪。徐虽当面说明，这样大的案子他个人作不了主，唐还是请他想想办法。有次唐走了以后，徐业道对我说：“唐这位朋友真是不知道利害，一味徇私情。”他劝我下次不要再陪唐去找他，怕别人说闲话，给这么大的汉奸讲人情，别人还以为得了多少根金条呢。我说叶的财产早就没收了，还有什么金条来活动？徐指出唐在上海住的那座大花园洋房不是叶蓬送他的吗？我说那是以前的事，徐还是认为此案无情可说，要我劝唐不要使他作难。唐听了气愤异常，说好多人比叶蓬罪还大，不也大事化小了吗！不久，叶蓬被判死刑，立即枪决了。唐闻讯大发牢骚，还要我陪他去找徐业道。我尽力劝阻他，才没有去。许多人认为他这个人只讲义气什么利害都不顾了。

1948年，蒋介石当了总统后，唐才被任命为总统府中将参军。我当时已去云南，一次有事去南京，我先到上海，去向他道贺。他气愤地说：“一个这样职务有什么值得庆贺！”我说比当保密局设计委员好听一点。他说胜利后不给他一个高于抗战初期的职位，连相等的职位也没给。他说他在汪伪政府中给蒋介石和戴笠做过不少工作，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是提着脑袋和全家人的生命在为党国尽忠，结果是过河拆桥，去时蒋介石当面说的那么好，胜利后就忘记了自己的话。我劝他少

发这些牢骚，这对自己没有好处。

屡遭军统暗算

1949年初，我再去上海，没有见到他。毛人凤却告诉我，唐生明竟去湖南担任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而不听劝告到台湾去；还听说他与军统大特务、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有勾结，准备去湖南搞和平运动，要我提高警惕，注意一下。我便把他过去发牢骚的情况讲了出来。毛人凤很不高兴地说，你早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人的关系多，而且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如果被共产党利用了，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来。我听了感到好笑，还认为毛人凤太敏感了。我估计他去搞带兵工作，是因为目前是对共产党作战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带兵打几个胜仗，就可升官。唐过去认为没有给他实权，带兵打仗正是好机会。毛人凤很不以为然，说我是感情用事，不从政治上看问题，所以他后来派一个专搞暗杀的行动组去长沙，准备暗杀的人当中有唐生明。他曾叮嘱这个组的头头，不要让我知道是去杀什么人，因这些行动人员都是经我训练过的学生。程潜宣布湖南起义时，这个组便开始行动。毛人凤通过潜伏电台指示杀程潜，没有机会下手，便要他们杀跟随程起义的军统人员，其中特别指出杀唐生明。特务在唐居住的地方守候，唐出门时，只打了一枪没有打中。陈明仁便加派人员保护他，而使其无法下手。最后他们只杀了随同程潜起义担任了长沙市警察局局长的军统人员刘仁爵，便逃跑了。后来这些人都逃到云南派在我手下工作，他们才把这些情况告诉我。

解放后唐生明告诉我，当时他在长沙家中掩护了地下党一部电台；军统特务去暗杀他的时候，因距离稍远，开一枪没有打中，他就跑了。他说如果近一点，虽不死也得重伤。湖南解放后，他因不适应解放后的生活，并且希望利用过去与国民党上中层的人事关系，做一点对台工作，所以全家迁居香港。毛人凤又派人

去打过他一次，也是远处开枪没有打中他。后来香港警察部门加强了对他的保护，特务也没有再去打他。

和共产党人交朋友

1957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唐生明夫妇随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等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曾去看望我们。这对在改造中的战犯们真正是一次喜出望外的大事。而唐生明直爽的谈话，更加强了战犯们改造的信心。所以，1958年去秦城参加农业劳动改造时，在那样宽松的环境下，成百的战犯们没有发生一次企图逃跑的事，这与那次他们去看望所带去的鼓励有关。它使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只要努力改造好，肯定会有光明前途。唐生明当时露骨地表示：从他与一些上层领导人口中，和这次毛主席、周总理让他们来看望我们时得知不但不会审判我们，将来还会重用，只要认真改造好，诚意靠拢共产党，能认罪服罪，肯定前途光明。别人说话比较含蓄，他的话的确增强了大家的信心。所以我1960年得到特赦，第一个去看望的人便是他。他和徐来以及他的孩子们对我都十分热情。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定量，特别是我女儿从湖南来到北京，除了常被邀去他家改善生活外，每月还补助我一些粮票，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所以使我不能忘怀。

我在得到特赦后，总认为原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和过去一样，可是我在唐家见到他和解放军将领与政府中一些领导人往来时，完全和过去一样亲密无间。有天陈赓大将去看他，两人谈话那么随便，并不断开玩笑。陈赓大将走后，我问他为什么和陈赓大将这么要好？他说：“我们的感情可以说和兄弟一样。”他告诉我，陈赓大将抗战前去上海医病，当时党内经费较紧张，他曾在经济上帮助过陈。我立刻想到，当年，我在上海工作时，军统得到陈赓去上海的消息，上海特区区长吴迺尧是黄埔

一期毕业与陈同一个中队，他带领我和大批特务到处去寻找陈赓。想到此，我禁不住问一声：“你在上海和陈往来我们怎么不知道？”他笑笑说：“我和陈赓往来如让你们知道，我就变成出卖朋友的小人，你们就成了立大功的人了。”

还有一次，我看到高登榜同志在和他谈话时也是那么亲切，并且对他非常关怀。高走后，我也问他，什么时候认识这位领导人的？他说解放前就有往来。我也随口说一句：“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过？”他说：“如果告诉你，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了。”不深刻了解他的人，谁会相信他在紧要问题上能做到这么守口如瓶呢？

唐生明曾不止一次告诉我，要我打破顾虑，大胆和共产党人交朋友，不要有自卑感。他说都是人么，人都要交朋友的，不过与共产党人交朋友和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有一点不同的地方，要我注意：国民党人朋友在他面前骂国民党的时候不但不生气，有时还附和骂上几句；而在共产党人面前骂共产党，共产党人却会坚决反驳，绝对不会附和你的。我说这是因为国民党有该骂的地方，而共产党没有应该骂的地方。他说，共产党是没有该骂的地方，而个别共产党员却不但有该骂的地方，还有该打屁股的地方呢？

第一次见他落泪

唐生明一生可以说是享尽人间福，除了从小就娇生惯养外，长大一直靠大哥的关系到处吃得开。他的夫人徐来，是著名的标准美人，不但能歌善舞，还和梅兰芳学了几句京戏，为他生了两男两女。不过在“文革”期间，唐也在劫难逃，吃过一段他平生没有吃过的苦头。

“文革”开始后，唐生明因多次被红卫兵抓到政协来批斗，连每月领工资都不敢去领。我当时住在政协附近，有辆自行车，加上身体还好，所以每到发放工资的时候，我就代唐生明、杜聿明、宋希濂等去领取。那时去领工资不但要挨一顿骂，还得劳动一下

才能领。我一进政协的后门（大门封闭不开，都从后门出入）便在地上拣起一把扫帚，从后门一路扫到西边的男厕所，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又从厕所一路扫地扫到会计室门口，才拍拍身上的灰尘去领工资。会计室的同志如果看到没有红卫兵在的时候，总是同意我代领一些人的工资，由我分途送去。有次会计室把上月扣发了30%的工资补发给我们，并且说，从这个月起不再扣发你们工资了。我把钱送给唐生明和杜聿明等的时候，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们。大家都很感动也很奇怪，谁会在这个时候还来关怀我们呢？我正和宋希濂研究时，唐生明眼眶通红，噙着满脸热泪来到宋希濂家，他说已经问明白了，是周恩来总理听说政协扣发我们的工资，他亲自打电话到政协，不但不准再扣，还要把已扣的全部补发。他边说边揩了一下眼泪，继续用激动的口吻说了一声：“总理待我们太好了！”说完掉头就走。我追出来，看到他还在揩眼泪。我和他往来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看到他流眼泪。

1967年11月4日，我最后一次把代领的工资送给唐生明后，7日便听到消息：唐生明和徐来于6日晚间被红卫兵抓走了。8日晚，我也被抓去。当时虽然同被囚禁在秦城监狱几年，却从未碰过面，也不知道彼此情况。1972年，周总理知道我又被关了起来，指示公安部门释放了我。而唐生明还多被关了两年才释放出来。两人重见，都不敢多说什么，因“四人帮”还在横行。他只很痛苦地告诉我，他被释放时，监狱的人告诉他，徐来已病死狱中了。我们相对无言，都默默地坐在那里，好久，我才一语不发，紧紧和他握了握手。他却站了起来，大声叱骂：“他×的！”我怕惹事，匆匆告辞，还听到他在叫骂，我又回转身去，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声：“忍一下吧！斗不过人家，不要再吃眼前亏了！”他把桌子一拍：“老子看他们把我怎样！”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恢复了政协委员待遇，1983年又被选为六届政协常委。

生荣死哀晚节全

1986年10月24日80高龄的唐生明因病与世长辞了。

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李鹏、万里、习仲勋、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还有各单位负责人及生前友好400多人。11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出的新华社的有关“唐生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的报道中，肯定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说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就赞同国共合作，“四·一二”后，“在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他一度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共产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他曾给予枪枝、弹药和军需物资的支援，保护和营救过起义部队的一些伤员。”并说他在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总之，他过去自己不愿说的事，党和人民一件也没忘记。

我在参加他的遗体告别时，曾写有一首七律，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就用它来作为此文的结尾吧！

悼唐生明

亦友亦师五十年，惊闻噩耗泪涟涟。
热情豪爽英雄色，报国忠诚意志坚。
大是非前真胆略，小糊涂处假痴癫。
一生享尽人间福，到老终能晚节全。

程潜将军二三事

陆炳熊

程潜将军系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国民政府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等职，解放前夕率部在湖南起义。

本文作者系国民党原西北行营参谋长晏勋甫之婿。与程潜将军相识多年，深受程将军提携。

初见程将军

1941年暑假中，我借着结婚不久的爱人晏章文，从陕西城固西北大学来到峨眉山四川大学，访晤分别五年的老师黄建中教授。

我们在峨眉山报国寺附近的村庄中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悠悠地度着暑天生活。过了两月，蝉声渐渐低沉，秋天来临了。

有一天，晏章文收到她三妹晏章清从重庆歌马场发来一封电报说：程伯伯（即程潜）明天乘小轿车来峨眉山。我们接电报后，即做好迎接的准备。翌日，下午四时左右，我们看见村前的公路上，有一小轿车和一大卡车奔驰而过，程潜先生带同随员果真来了。当晚，他们住报国寺四川大学的招待所中。

去年在西安时，晏章文家和程先生家同在王曲附近的杜公祠，两家交深谊厚。经晏章文的介绍，我认识了程先生。当晚，我和晏章文设便宴招待。作陪的，有黄建中，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毕

业，回国后曾任南京教育部次长，还有顾绶昌教授，他在英国专攻文学。程先生很重视专家学者，相谈之下，非常融洽。

席散后，程先生嘱咐晏章文和我准备同车回重庆。他说我的工作由他安排，我们同意了。

当程先生偕同随员上峨眉山游金顶时，我们准备行装。过了两天，程先生等下山了。就在中秋节前两天的一个早晨，我们随着程潜先生离别峨眉山，登车赴重庆。

热心的调解人

晏章文的父亲晏勋甫前年任西安西北行营参谋长时，拥有军事实权的胡宗南常是晏家的座上客。胡宗南看到晏章文的照片后，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向她的父母表示爱慕之意。她的父母对于这个权势赫赫的人也心存默契，便设法把肄业于云南大学的晏章文转学于西北大学。她从重庆回到西安时，胡宗南亲来机场迎接。胡宗南在西安王曲“官邸”宴请她和她的父母时，挂灯结彩隆重迎接。无奈晏章文视富贵如浮云，不愿和胡宗南结婚。当胡宗南第二次邀宴时，她已赴城固西北大学了。她在该校法商学院学习，我在法律系任国际公法教授。我和晏章文订了婚，但她的父母坚决反对。我们就在城固举行简单的婚礼，并在重庆大公报上登了一个结婚启事。她的父母看到我们的结婚启事后，很生气。胡宗南得知我们结婚后，不久就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位女教授结了婚。

自从我们结婚之后，一直到认识程先生之前，我和岳父母之间像是被一条冰河隔开似的。程先生对于晏家这场婚姻风波知道得很清楚。他邀我们同回重庆歇马场，是有意为我们调解。

从峨眉山出发后，第二天晚上，便到达重庆歇马场。晏章文先随程先生回家，我则暂时在离歇马场20华里的青木关一家旅店住下，等候她回家后的消息。

翌日早晨，大约八点钟，晏家派汽车来接我回去。车行一

刻钟时间，就抵达歇马场。程家和晏家的住宅在柏林湾，离歇马场还有一华里之遥。柏林湾离汽车通行的公路有几十丈的距离，中有小径相连接。

当车子行近歇马场时，我心中有些紧张，我的岳丈是反对我和晏章文结婚的，我担心他板着脸接待我。车子继续前进，隐约地看见前面公路旁站着一个人，面孔对着我坐的车子。渐渐地看清楚了，那位站在路旁的正是我的岳丈，他在等候我呢！我急忙下车，他前来和我热烈握手。于是我们二人沿着小径向柏林湾走去，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他高高兴兴地对我说：“程伯伯很称赞你，说你忠厚朴实，是很好的。”他说完后，又补上一句，“人就要忠厚”。

那天晚上，晏章文告诉我说：“程伯伯昨晚回到家中，非常高兴地对爸爸妈妈说：‘我把你们的女儿和女婿都带回来了！’程伯伯接着又说：‘你们的姑少爷（指我）是大学教授，我有几个女婿，却没有一个是大学教授。我的女婿都比不上他。’程伯伯这番谦虚而又贴切的话，像和煦的东风一样感化了我的岳父母，他们心中的疙瘩就渐渐融化了。”

歇马场上旧邻居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飞机频频轰炸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迁移到离重庆120华里的歇马场。战地党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程潜，秘书长是晏勋甫。程晏二家同住在歇马场附近的柏林湾。

晏家是全家十几口人都住在一起，程家在重庆上清寺聚兴村有住宅，住在柏林湾的只有程夫人郭翼青和她的三岁女儿程博熙，程先生每星期回柏林湾住一两天。他们两家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亲密热闹，宛如一家人。

这个院子前面有小桥流水，后面有苍松翠柏，风景清雅，环境幽静。

郭翼青秀外慧中，天真诚恳，年龄比晏章文小三岁，和晏章清同年。论辈分，郭翼清是长辈，实际上她们三人像姊妹，彼此情投意合，胜似亲姊妹。

程先生回家时，常到晏家闲谈。有一次闲谈时，程说：“姑少爷还没有工作，暂先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少将设计委员，以后有机会，再为设法。”程伯伯非常谦虚有礼貌，对我这样一个后生小辈，从不直呼名字，总喊姑少爷。

我的岳父说：“炳熊从欧洲留学回国不久，派他一个上校设计委员，也算不低了。”

程说：“他是大学教授，可以派为少将。”

程伯伯走后，晏章文埋怨她爸爸说：“程伯伯派他为少将，你把他降低为上校。”晏勋甫爱女儿胜过爱儿子。他当时听了女儿的话，默然未作回答。翌日，他回家吃中饭时，笑嘻嘻地把一张东西交给晏章文，她给我一看，原来是一张派职书，上面写着派陆炳熊为战地党政委员会全少将设计委员。

我担任“设计委员”这个闲职之后，大约过了四五个月。有一次，我的岳父告诉我：“程伯伯说你年轻，要为国家做些事，他可以为你介绍。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他。”

我说：“我曾在大学教国际公法。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需要专长国际公法的人，可否请程伯伯写信推荐？”我当时存着试一试的心理。

我的岳丈把我的意思转告后，程伯伯为我写信给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王宠惠。王担任过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在国际上是有声望的。

国防最高委员会是根据战时体制而成立的一个最高决策机构，它的权力高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高于国民政府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兼任该会的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下面设有外交、法律、财政、教育等五个专门委员会，由秘书长王宠惠领导。

外交专门委员会由三种人组成：（一）国民党中央委员；（二）现任或曾任外交部次长或曾任驻外大使；（三）国际公法专家。

有一天，程伯伯回到歇马场柏林湾住所，他交给我一封王宠惠给程伯伯的复信和派我为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函一件。这件事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没有料到真能成功，更没有料到很快就成功。

我去报到时，会见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泰祺后，又去见了王宠惠秘书长。他从我的学历中知道我考得鲁文大学的法学博士。他告诉我：“鲁文大学的国际公法教授戴贡是海牙国际法庭的创建人之一；国际公法教授窦微西哀是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这两位教授都是他的老朋友。鲁文大学有七百年校史，这大学造就了不少国际上知名的法学家。”王宠惠的一番话，使我感到很亲切。同时我想到，如果不是程伯伯写信推荐，王宠惠又怎能了解我而把我吸收在这个外交专门委员会里呢？我每次想念到程伯伯对我的关怀，我内心总是很激动的。

有一天，我岳丈把一个有一万元存款的银行存折，和一根重十四两的金条交给我说：“这笔款子和一条黄金给你。你在社会上应酬交际，手头上宽裕松动些。”我接下岳丈给我的赠款和黄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问了岳母，才知道是程伯伯的好心好意。原来是程伯伯劝我岳丈给我一笔钱。程伯伯说我30多岁，正是有所作为的时期，交际活动，需要花钱，程伯伯真是处处为我想到和考虑到了。

1942年的腊月，我在美国出版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它报道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下面各派各系的情形。这篇文章是一个来中国考察访问的美国记者写的。时隔四十年，我大概记得文章的内容：蒋介石下面有陈诚系，有何应钦系，有黄埔系，它的核心是复兴社，有军统，有中统，有陈果夫陈立夫的CC，有朱家骅系，此外还有桂系和政学系。据这位作者分析，政学系、桂系和蒋介石是合作关系。除此以外，其余各派系都是蒋介石的亲信。

蒋介石在党政军三方面的权力，建立在各派系的平衡上面。这位作者说：二陈的党徒众多，但多数是党混子，人民不信任。朱家骅手下有一批专家，但人数不多，势力不大。黄埔系的骨干，缺少才学。军统中统，杀人有余，成事不足。何应钦仅有刘峙、顾祝同虾蟹二将，力量有限。对于政学系不可小看，政学系人数虽少，但他们献策献计，常被蒋介石采纳。桂系有组织有实力，白崇禧是它的灵魂。陈诚有组织能力，有政治头脑，是蒋介石的承继人。若把白崇禧和陈诚相比，则陈诚占有很大优势。这篇文章约五六千字，我把它译成中文，送给程伯伯。

过了一星期之后，我的岳丈亲自到我的房间郑重地对我说：“程伯伯看了这篇译文后，非常感兴趣。他托你介绍五六位有真才实学的大学教授，由程伯伯聘为顾问。每位顾问派为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计委员。不定期地聚餐谈心，交换意见。我还有五万元存款，每月的利息，充作顾问来往的川资。”

我听完之后，表示愿意效劳。我经过仔细考虑，便向程伯伯介绍了黄建中、汪奠基等五位教授。程伯伯看了他们的学历和资历后，表示满意，并把我也列入其中，总数是6人。程伯伯说：“黄建中资历高，派为中将设计委员，其余的派为少将委员。”

就在1943年的2月，程潜主任委员接到蒋介石撤消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命令。战地党政委员会在各战区都设立分会，表面上是对付日寇和汉奸，实际上是以反共为主要任务。但在程潜和晏勋甫主持下，反共毫无成绩，所以蒋介石下令撤消了。

接着，蒋介石派晏勋甫去贵阳任军令部第四厅厅长，主管全国测量事宜。战地党政委员会既撤消，晏勋甫又调走，程伯伯邀请顾问的计划，随之中止了。但程伯伯延揽人才听取意见的胸怀，给人很深的印象。

晏家除了晏章文和我之外，其余的人都去贵阳。郭翼青带着程博熙迁往重庆聚兴村住宅。她和晏家姊妹欢聚二年，一旦分手时，依依不忍舍。

他带引我走革命路

程先生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副参谋总长。自从战地党政委员会撤消后，蒋介石没有派他担任其他新职，他就仅保留一个副参谋总长的职位。程先生的胸襟非常开朗达观，每天在家吟诗写字，怡然自得。

我那时住在重庆郊区唐家坨新村。有一次，我去向程伯伯请安问好。他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幅字，署名盖章后，赠送给我以留纪念。这幅字的含意是勉励我要时时求进步，跟上时代。我曾把这幅字裱好珍藏，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但他勉励我的意思，一直深记不忘。

在战地党政委员会撤消的前后，我已决心经商。我在欧洲看到资产阶级先发财而后从政，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选举才能登上政治舞台，参加选举，必须有竞选的资金；而且资金的大小决定选举的成败。我毫无财产，而学的却是法律政治，所以我要去亲自经商，创造从政的条件，那时我辞去了好几次的工作机会，一心扑在经商上面。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抗日战争。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天下午，蒋介石站在敞篷车上行经大街，和重庆市民共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蒋介石同站在敞篷车上的是程潜，两人都穿着上将的军服。有经验的人士猜到蒋介石又要借重程潜了。果然，仅过一二月，蒋介石任命程潜为武汉行营主任。那时，军令部第四厅已迁来重庆，我的岳丈又经常和程伯伯见面。他们二人商量好，派我担任武汉行营的少将参议兼外事处处长。我执迷着要经商，没有接任程伯伯派我的重要职务。不久，程伯伯去武汉就职；过了两年，他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我则一直在上海经商，和程伯伯相离有4年之久，一直到1950年在北京时才重见到他。

我缺乏经商的知识 and 经验，经商的资本又很小。经过几年的努力，仍逃不了投机市场上大鱼吃小鱼这条规律的支配。到上海解放时，我经商完全失败了。我当时徬徨徘徊，不知怎么办才好。1949年12月初，正当我处境非常困难时，忽接得北京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通知我去报到的通知书。这真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好消息，我有了新生之路了。原来程伯伯在长沙起义后，和我的岳父一起到了北京。程伯伯写信给华北大学的成仿吾副校长，介绍我到该校的政治研究所学习，成副校长批准了。程伯伯带引我走上革命的光明大道，这件事使我特别感激难忘。1949年12月中旬，我便启程赴北京了。

我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以后政治研究所归并到北京西郊的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有一次星期天，我进北京城看程伯伯。他的会客室中，只有程伯伯和我二人。他先对我说：“我在旧社会，不爱批评人。”接着说：“你苦学多年，不发挥你的所长；你不是经商的人，却想去经商发财，路子走错了！”

我认识程伯伯将近十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批评我，批评的语气是和婉的。

我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促使我想经商发财。在旧社会，政治上竞选靠金钱做后盾。您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李宗仁的部下李品仙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搜刮民脂民膏，用大卡车一车一车地把钞票运送到南京，支援竞选。李宗仁竞选用的钞票多，所以副总统的宝座就落在李宗仁手中。”程伯伯听到这里，频频点头。我接着说：“我恨自己经商无才能，要是当时我发了财，我会用经济来支援程伯伯竞选的。”他听完我的话，情绪融洽了，转过话头对我说：“共产党真是非常之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我国人民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永远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你会对人民有所贡献的。”

我从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后，组织派我到东北商专（后

归并东北财经学院)任教,寒暑假回汉口探亲,路过北京时,我总要去看看尊敬的长辈——程伯伯。1954年,我调到中南财经学院后,便没有机会再和他相见。

易培基其人其事

唐士亮

一、早期政治活动

易培基，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1880年2月28日，出生于清末武官家。其父因得罪上司被罢黜而死。

易培基在父去世后，前往武昌为父上诉伸冤，时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倡新学新政，创办湖北方言学堂，易考入该校，毕业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武昌起义。黎元洪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时，易曾任黎氏秘书。

1913年，孙中山、黄兴在南京发动讨袁战争，黎元洪反叛孙、黄附袁，易恨帝制，不与黎合作，弃职去沪，后回长沙执教，先后在湖南高等学堂及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员。毛泽东和余盖在一师读书，共事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皆得易培基赏识。易言：“毛润之将为人民天子。”

1919年，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屠杀湘人。是年12月，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员，串联省城各大、中学校，成立学联，发动各学校总罢课驱张，组织驱张代表团，易培基被推为绅商学界总代表，参加驱张运动，分赴全省各城市及北京、上海、汉口、广州活动。联络点设在易培基家，将收到的驱张消息，编成《驱张通讯》，油印分发。张敬尧在省内外的声讨与湘军的节节逼追下，于1920年6月11日，匆忙逃走。谭延闿继任督军兼省长。易

因驱张有功，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湖南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省立图书馆馆长。同年毛泽东撰写呈文，推举学生代表求谭延闿省长委易为第一师范民选校长（向来校长由官府指派的）。易培基任校长后，余盖建议易聘毛泽东为一师副小主事，继又聘为一师语文教员。毛泽东利用一师作根据地，进行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创新文化学社，继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而建立共产党小组。一师成为革命发祥之地。易培基先后撤换了思想陈旧的教员，聘请受过五四运动薰陶的新人物徐特立、李达、李维汉、周谷城、田汉等人为教员。创新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为抵制社会逆流，将自己女儿易漱平送入一师学习。废弃文言文，改用白话文。

1920年11月，湖南陆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乘机挤倒谭延闿，夺取驱张胜利果实，泡制省宪，自称省长，表面实行联省自治，骨子里仍是军人专政，残杀裕湘纱厂罢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于雪地，又下密令逮捕毛泽东。余盖闻讯，向上海陈独秀报信，又连夜冒雪去板仓向在杨开慧家过旧历年的毛泽东报信，陈独秀和赵恒惕与易培基在湖北方言学堂同学，写信给易培基骂赵恒惕假联省自治之名，实行屠杀青年的残酷手段，引起省内外舆论大不满。易将此信送赵亲阅后，赵表示已杀了黄、庞不再株连别人。易见赵在湖南倒行逆施，背叛孙中山，斥赵为无革命党人骨气的新军阀。赵知易对他不满，决心去易，遂促易辞一师校长职。

1923年，谭延闿在广州大元帅府任内务部长，得孙中山倚重，令谭回湘讨赵，任谭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⁴¹驻衡阳。易培基在长沙秘密进行拥谭倒赵活动，赵视易为眼中钉，易潜往衡阳。不久，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急电赵回师救粤。⁴²赵乘机进驻衡阳，下令⁴³捕易，易逃往广州，就任谭延闿湘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孙中山图谋策动浙江都督卢永祥及奉系军阀张作霖，共同声讨北京直系军阀曹锟。谭延闿推荐易培基为孙中山代表，赴杭州

从事联卢拥孙倒直活动，继又派易为孙中山驻京全权代表，与李石曾等密组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策动冯玉祥倒吴佩孚。

曹、吴既倒，1924年10月15日，易培基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格，代表南方革命政府，出任协政内阁，督任教育总长。易培基素爱欣赏古物摩挲金石，闻清宫古物被盗散失，不胜惋惜，商同李石曾等，策动冯玉祥派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警察总长张璧偕同李石曾带武装军警，逼迫傅仪出宫。11月20日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宫内古玩。1925年10月，清查告竣，清室善后委员会遵照协政内阁命令，成立故宫博物院。当时没有院长，聘李石曾等九人为理事，推李石曾为理事长，主持院务，易培基为古物馆馆长。

段祺瑞执政时期，任易培基为北京女师大校长。1926年3月，段祺瑞惧于日本等八国驻军公使的抗议，压迫冯玉祥撤销大沽口的设防。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等，策动“三·一八”运动，发动北京大、中学生及市民，举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主权的示威大游行，队伍游致政府门前时，惨遭镇压。段祺瑞指责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等啸聚群众，闯袭国务院，下令通缉。李大钊匿居俄国使馆。李石曾逃居法国医院。易培基匿居东交民巷。张作霖晋京称大元帅，深夜攻打俄国使馆，李大钊等十余人被捕后施以绞刑。易化装日本人逃回长沙。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原湖南一师教员匡互生乘机在上海江湾创办劳动大学，邀请李石曾、吴稚晖为董事，李石曾向国民政府推荐易培基任劳动大学校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依靠国民党元老起家。易培基经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及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的大力支持，被任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农矿部长。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派易培基北上接收故宫博物院，不久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理事会条例》。任命李石曾当理事长，易培基当院长兼古物馆馆长。易重用李石曾的胞侄，自己的女婿

李宗侗为秘书长。当时，易仍在南京农矿部，院内院务全交李宗侗主持。这时易身兼三要职，可谓盛极一时。

二、得罪蒋家王朝

蒋政府贪污腐化，在蒋政府做大官，就得与他们同流才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易培基却相反，已在蒋政府中做了大官，而依然一派名士作风。一不巴结独揽大权的蒋介石，只以“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之；二对孔、宋、二陈全不买账。这种态度在蒋家王朝中，当然站不住脚，彼此之间的矛盾表现在下列六个方面。

一、易培基任农矿部长之初，蒋介石派人向易示意，陈立夫是留美国矿冶专家，有丰富的采矿冶金知识，拟派为农矿部次长，有利于助易开展矿政。易不接受，马上提请简派曾养甫为农矿部次长，以抵制陈立夫。曾养甫辞职后，易又提保肖瑜、陈郁继任次长。故此，易第一步得罪了蒋介石、陈立夫。

二、蒋介石为贯彻培植嫡系，排除异己的政策，以缩编为名义，淘汰了许多杂牌军队，而巧立名目，暗中扩展自己军力，除了囑宋子文编练税警团外，又指使其侍从秘书郭一予，（郭系湖南第一师范学生，又系黄埔一期学生，与易培基有师生关系。）劝易迎合蒋意与宋合作，编练矿警，被易拒绝。郭又劝余盖和熊集生劝易，亦遭拒绝。这样易培基第二步又得罪了蒋介石、宋子文。

三、财政部长宋子文见易态度高傲，对农矿部经费，多方制肘，而易对应解矿税亦多扣留。例如：开滦煤矿应解矿税100万元，被易扣储银行，直到农矿部结束时，才以抵缴方法报解，这样互相摩擦的事，举不胜举，因而与国舅宋子文势如水火。

四、农矿部、工商部这两个部的管辖权，根本难以划清。例如，矿山所设矿冶、工厂两部争着管理，又如，商品检验与农产品检查所，亦常发生互争产品检查权之事。因此，农矿部与工商部常因争权摩擦，嗷嗷不休。因而孔祥熙与易培基两部长间的意

见，也如同水火。

五、孔、宋、陈宴请易培基数十次，易每次不到。有一次，孔祥熙在行政院会议上对易说：“我宴请你数十次，你不赏光一次，是何原故。”易仅以“对不起”三字答之。甚至蒋介石宴请易培基多次，易也于接到请柬后，立即赴沪深避，次次都是这样，蒋亦明白易对他的疏远态度了。

六、陈立夫、陈果夫组织CC团，向各大学中学扩展势力，以实行清党反共的毒计。易培基主办上海劳动大学，闭关自守，拒绝CC分子渗入，对清党反共之事，置之不理，深为蒋介石和两陈的不满。

蒋介石居心去易，借此打击国民党元老，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上，对于中央各部门首长，遥兼数百里外的大学校长空衔一事，严词斥责。于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辞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辞浙江大学校长，铁道部部长孙科，辞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农矿部部长易培基也不得不辞上海劳动大学校长。蒋介石及两陈认为这时是扩展CC势力侵入劳动大学的最好机会，就内定CC骨干余景塘为劳动大学校长。易闻讯后，拟其女婿李宗侗为副校长，俟李宗侗到校视事，造成既成事实，易再提出辞呈，同时保荐李宗侗为校长，以抵制余景塘。李宗侗刚到沪，陈立夫，陈果夫即知道，就促教育部应即下令劳大，将易撤职查办，掀起翻然大波，经元老调解，李宗侗、余景塘两人都不做校长，而以前任驻比利时公使王景岐为校长，才解除纠纷。蒋介石遂于1930年9月下令，免除易培基劳动大学校长之职。

易培基既以此高傲作风，得罪了蒋、宋、孔、陈，故在蒋家王朝中变成孤臣孽子，自然遭受排挤。蒋介石意欲去易，将农矿部工商部合并，改为实业部。蒋在发表孔祥熙为实业部长之前夕，犹假意邀请易谈话，对易说：“实业部部长一席，拟请你或庸之（即孔祥熙）担任，以资熟手，特先征询你意。”易见蒋将两人并提，而且先征易意，即是蒋决心用孔去易。所以，易当即答蒋

说：“我有宿病，需要休养，请另简贤能。”蒋介石马上说：“那么你专心将故宫博物院院事，好好整顿，中央政事，俟有机会，再请你帮忙。”蒋于1930年11月下令将农矿、工商两部合并为实业部，由孔祥熙担任部长。同时，还免去了易培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这样易只存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后蒋介石虽然发表过易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但易未就职，不久易将家迁往北京，专心办理故宫博物院院事。

三、含冤身死

易培基任职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前，在官场上已得罪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院内人事布置，又错聘司法院副院长张继，挂了一个副馆长空衔，（张虽是国民党元老，但非书画金石专家）。易培基督促女婿李宗侗尽力整理院事，而掌管蒋政府财政大权的国舅宋子文，偏不给易方便，削减该院经费易无可奈何之中，1933年采纳了李宗侗等建议，将故宫博物馆一些与考古和文献无关系，对艺术无价值，收藏易霉损难保存的贵重狐、貂皮货，药材处理。5月请准南京政府公卖，将所得款项扩充经费。张继之妻崔振华，去神武门东边厢房公卖处选皮货，同值岗警察因误会发生争吵。崔振华仗副院长太太身威，以长辈自居，责怪李宗侗说：“今天警察对我无礼，是你平日缺乏教练。”而大少爷出身的李宗侗脾气不小，不但不赔小心，反而冲撞崔振华说：“你不早告我，何能怪我。”崔火上加油，以致两人大抬杠子。崔气愤回家，叫老丈夫向易培基告状，易素知崔振华是一个有名的疯婆，张继是一个惧内懦夫，故对此置之不理。张、崔认为易偏袒女婿，见易培基政治上已走下坡，乘机落井下石，要惩李宗侗，必需打垮易培基。于是暗向院内职工搜集易、李材料，冤案由此开端。

张继以司法院副院长之权，指使亲手提拔的最高检察署署长郑烈购买被博物院开除的会计室职工秦汉功，暗中诬告易培基、

李宗侗改造单据，浮报贪污。郑烈为报答张继提拔之恩，电嘱秦汉功速来南京，^{*}电文落于易培基手，秦汉功知事不妙，见风转舵，求助于余盖向易说情，并求照顾生活。易培基嘱余盖叫泰写出张继、崔振华、郑烈贿买作证的坦白书，并助秦汉功携眷属迁居上海江湾，与张、崔、郑杜绝往来。

易将秦汉功坦白书作为张、崔、郑行贿证据刊登于报，舆论纷纷指责法台行贿，张、郑老羞成怒，要置易于死地方休。“九·一八”事变发生，古物南迁，有一凤冠，因箱小冠大，不能封盖，该院职工肖襄沛摘下凤冠珠子，装入箱内南迁。此仅是没有保存原冠的小差错，郑烈则以肖襄沛“破坏古物，以假换真”之罪，主使检察官向苏州法院提起公诉，判处肖襄沛徒刑。借此又登报宣传，说易培基李宗侗指使肖盗宝，苏州法院已通缉易培基、李宗侗、易蒙冤住天津，后迁居上海法租界养病。怕事的李宗侗认为只要易辞掉院长，此事就可了之，主动辞去秘书长职，并劝易辞职。易见曾经凭秦汉功的坦白书已控告过张、崔、郑行贿舞弊和勾串之罪，国民党各部、会、院皆无反响，蒋介石对他又无好感，反诉不可能得到上级支持，张、崔、郑还可滥用职权，主使法台另加罪名，枉作囚犯，于是违心的同意了女婿之劝。1933年10月14日由李宗侗替老丈人发电话辞职。10月15日北京就报载故宫博物院经理事会在京开会议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辞职，以古物馆副馆长马衡代之。易正式提送辞职呈文，张继即力保马衡升任院长。张继、马衡又将易安置在院内工作的湖南人，先后辞退。

国民党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三元老，商议向蒋介石进言，求政治解决易培基冤案，由于李石曾以前因周旋于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之间，挟冯、张以自重，对蒋施加过压力。吴稚晖、张静江独霸浙江时，以老卖老，失欢于蒋。加之易培基出任要职的有力内援谭延闿已病死南京，因而无结果。1937年，易培基肺病加剧，于9月含冤病死于上海，年57岁。

后 语

易培基的得意门生余盖，湖南冷水江市人，1918年在湖南一师与毛泽东同学时，共事湖南早期学运、工运，为易所器重。余盖1925年从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被易培基作为自己的亲信，先后安置在北京女师大及故宫博物院工作。1928年任上海劳动大学事务主任。1929年任农矿部上海农产物检查所总务课课长兼故宫博物院驻沪科长，后又随易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易含冤辞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余盖辞职去重庆。因此，余盖深为了解易的一生以国是为重。易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也庇护余盖暗中安置大革命失败后，潜入上海的C、P同志刘千昂为总务课办事员。易任农矿部部长时，何键逮捕杨开慧，有人报请易解救，易当即电何键解救杨开慧，何键很狡猾，将杨开慧杀害后，再回易电。易痛恨何键说：“我加速了杨开慧的死。”

1963年余盖接毛泽东信，嘱他回忆故宫盗宝实情。余盖写了《故宫博物院盗宝冤案之迷》送中央。经核实后发表，余盖生前向我口述过易培基的事迹，并写了易早期活动，和蒋介石的矛盾，嘱我有朝之日，将这些资料发表，以明真相。此文主要内容，根据余盖遗稿及口述，并参阅有关易培基的传记，加以补充整理。

邵元冲日记选编

——1936年5月至8月

邵元冲（1890——1936），字翼如，浙江绍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是国民党决策机关的重要成员之一。1936年12月，奉蒋介石电召入陕，适逢西安事变，12日晨被士兵击伤，14日逝于陕西省立医院，卒年46岁。

在此，我们编选了邵元冲1936年5月至8月期间所写的部分日记，为研究邵元冲及这段历史，提供一些参考材料。

由于日记原件系墨笔草书，个别字迹不清者用□标明。选编时加了标点及简要的注释。

——选编者：郭军丽

（1936年）

5月13日 星期三 晴

晨闻胡展堂^①于昨夕7时40分因脑冲血在广州逝世，为之慨然。9时赴中政委员会^②，当与溥泉^③等提议：关于展堂追悼典礼及纪念办法等，半小时散。至党史会^④分别发电慰问展堂家属。11时顷归。午后罗翼群夫妇、赵子懋、俞子厚、泰水^⑤等先后来。晚补日记。

① 胡汉民，字展堂。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简称。③ 张继，字溥泉。④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简称。⑤ 指邵元冲之岳母。

5月14日 星期四 晴

午前补日记。鲁觉吾、孙德中等先后来。午后访吴稚晖，谈半时归。彭革陈、孙东城等来。晚补日记。

闻展堂遗囑有：非抗日无以完成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无以完成民权主义，非剿匪无以完成民生主义云云。辞颇露骨，各报皆不敢披露云。

5月15日 星期五 阴晴

午前补日记。贺壮予、陶亦英等来。午后阅《青田县志》。偕默①一访侠魂②。并至精益眼镜公司试眼镜，即归。沐浴。晚阅《永康县志》及书牍。

5月16日 星期六 晴

午前复刘允臣函。阅《刘青田集》，于其与明太祖离合之间，及其末年之蹉跌，殊感于仕途全始终之难。10时江康梨来谈译印《伦敦蒙难记》③事。党史会全体纂修、采访等来，拟推我赴粤代表党史会祭展堂，余以粤局内容尚未详晰，当以考虑复之而去。11时后至挹江饭店访罗翼群少谈，渠拟明夕转沪赴粤也。午后书立轴联辞数件。朱浩怀来谈湘省党务。3时至金陵大学观版本展览会。因时代之递进，说明印刷术之进。于中国古时写本，以至刻本、石印、影印；有元明刻本，以至清代康、乾软体字刻本，名家写校本，以及西夏文、梵文、西藏文、傣文④、朝鲜、日本版各种图画刻本，影印本，各种杂志创刊号，乃至西洋各种印刷书籍、地图。又伦敦出版之敦煌壁画。各种尽出该校所藏。而能美富若是，已不易矣。4时后访觉生⑤一谈，渠拟日内与楚伦⑥等至粤吊祭展堂云。5时后归。晚阅书。

① 指邵元冲之妻张默君。② 邵元冲之妻妹，竺可桢之妻。③ 指孙中山用英文撰写的该书。④ 傣文即苗族文。⑤ 居正，字觉生。⑥ 指叶楚伦。

5月17日 星期日 晴

晨8时顷偕默率森、能两儿至后湖购樱桃，并放舟湖上。10时半归。陶林英、陆达节、马耐园等先后来。午后临写《李卫公上西岳书》一通。徐忍茹送马宗霍所作祭展堂文来看，略易数字，交去誊写。晚阅杜于皇《变雅堂集》，颇多至性文字。

5月18日 星期一 傍晚暴雨时许霁

午前阅《变雅堂集》，于明末军政之废弛及民俗均有所述。临写王右军千字文数页。9时至中央党部参加纪念周^①，并举行追悼胡展堂及陈英士^②殉国纪念日，由林子超^③报告，词简而哀，9时半散会归。临书数帧，阅《变雅堂集》。午后临书。至商务书馆购书，并至中央饭店理发。晚阅情报。

5月19日 星期二 晴

午前临书数帧。至党史会办事。午后王伯秋等来。晚临书。作寄王子余等函，论编印绍兴先哲遗书事。闻倭军^④益增驻平津及石家庄以北各要隘，寇势益迫，而华北一带走私者又纷起，财政日现崩溃，中枢大计迟迟不决，前途殊靡知所届也。

5月20日 星期三 晴

晨临书数页。午前赴中央政治委员会。余提询倭寇在华北增兵之情形，由张岳军^⑤等将经过加以说明。讨论各案之重要者，为决定：（一）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110万镑；（二）中法修正滇越铁路合同；（三）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孔财长^⑥对走私案有所说

① 指由国民党中央执会制定的，1925年11月9日起开始的每周纪念孙中山的仪式。② 陈其美，字英士。③ 林森，字子超。④ 指日本军队。⑤ 张群，字岳军。⑥ 即孔祥熙，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明)及国防工业建设各案。(又因洛阳等处,发冢益盛,决施盗墓治罪办法等。)12时顷散会。午后临书,并阅《变雅堂集》。晚阅戚继光等传记。

5月21日 星期四 午后雨

午前阅张九如著《非常时期青年救国之路》。其议论尚能切实。午后阅教育问题各书。陶林英率鲍事天(诗田,鲍慧僧^①之弟,在军事委员长行营服务,菲律宾大学政治科毕业。)来见,与之谈青年努力之道。晚阅教育各书。

5月22日 星期五 晴

午前阅教育参考资料。作榜书,为宁夏题青铜峡诸处。至史料陈列馆一看工程。并至陵园看月季花。晚阅李次青《天岳山馆集》,其文亦颇能作健叙,记有雅洁女柳州者。

5月23日 星期六 晴

午前阅教育问题各书。午后写展堂悼辞,阅阁帖。晚阅教育书。

闻白崇禧等主张展期召开国民大会。赵戴文将继任山西省主席。倭贼对我将有更严厉之新要求,提出欲我为彻底之屈服云。

5月24日 星期日 午后雨

午前偕默访侠魂八姨。又至沙塘园谒泰水。旋同至陵园观蔷薇,凡500余种,颇多佳品,傍午阻雨而归。午后朱君毅及陆舒农、曾介木、周欣为等先后来。晚阅史通。

5月25日 星期一 阴

午前9时赴中央纪念周,由丁惟汾主席并报告。9时半散会

^① 疑是包惠僧之误。

归。整理展堂遗墨。午后2时偕默至励志社^①参加展堂追悼会，由林子超主席并致词，甚简单，辞毕各界代表皆不发言，末由雨岩^②稍述数言，匆匆半小时即散会而归。贺壮予等来。晚属草党史史料，陈述馆记，修词犹不能凝炼。

5月26日 星期二 阴

午前8时偕默赴励志社，参加中央党部公祭展堂，由介石^③主席，继由余率党史会同人举行祭礼。9时顷归。修改文稿，并改国庆歌。午后袁同畴、习文德等来谈国民大会选举事。阅《天岳山馆文钞》。六时半听中央广播电台，讲述余之《民族正气文钞序》之播音。晚阅《天岳山馆文钞》。

5月27日 星期三 晴

晨雨岩来谈筹备选举事。10时顷答访张九如一谈，渠近辑民族兴亡史，唯于搜辑材料尚费时日云。谈半小时顷归。午后整理书稿。徐忍茹等来述会务。云南刘德泽送来中华革命党^④外史，颇多可参考处；唯中间于政学会^⑤沮遏总理及仇党诸事迹，则于今为烈何主魁枋者之不寤也。6时顷访藕舫^⑥一谈，渠述接办浙江大学经过颇详。7时归。晚作复各函及批答无谓之人事，屡来扰人，既不能澄思著述，又不能飞骑杀贼，时艰方滋，坐糜盛时，为之悒悒。而逐逐利禄之徒，犹逐逐奔走，不悟国已屠于积薪猛火之上也。哀哉！王子余来书，附来明末祁忠敏（彪佳）遗像及上叔婢最后遗书、墨迹。摄影书法敦厚。闻有手书日记两本，殊可珍，拟为付影印也。

① 蒋介石仿效日本创办的军官俱乐部。② 蒋作宾，字雨岩。为邵元冲联襟。③ 即蒋介石。④ 1914年7月，由孙中山在日本以国民党为基础创立的组织，即中国国民党的前身。⑤ 即政学系。⑥ 竺可桢，字藕舫，为邵元冲之联襟。

5月28日 星期四 晴

午前致王子余函，商影行祁忠敏遗墨事。郑仲劲来商请中央抚恤会，济助林颂亭(述庆)子女学费事。李志刚来谈陕中情形及剿匪经过。徐忍茹、习文德来谈国民大会事。阅《全谢山文钞》。午后赴中央抚恤委员会，对林颂亭^①子女各年给学费400元，至大学毕业时为止。又讨论冯焕章^②等提请抚恤邵飘萍事，子超极反对之，乃以查无党籍，碍难办理打消之。飘萍私行实多可议。5时顷归。阮毅成来谈国民大会选举事，谓浙江现已有省党部派及浙中旧军人：如吕公望、张载阳等，又全浙公会派，如褚蕙僧^③等均将活动，彼亦拟有所组织，或用国民宪草讨论会名义云云。乃稍为之剖析现势，谓此半年中，国难尚不易应付，究环境能否容吾人从容办理选举，此拟熟考之。谈半时许去。闻于右任患足疾，特往视之，知已渐瘳，与之稍谈时事及书法而别。晚阅全谢山文。

5月29日 星期五 晴

午前王扶生送来伦敦1921年印行司坦因所编辑之敦煌画像，即千佛洞中所发现大氏，为绢、纸两种，多精善，计48幅，并另有说明一册，实国宝也。赵子懋来，渠意欲余为介绍之于介石，以立法委员等职。余往日对其属望颇深，不图于此荆天棘地之时，犹为利禄萦心若是，今日之青年，诚难言矣。午后阅宋景文集，其直言对诸文所云：“与贤人谋事，而与不肖者断之，一患也；重选大臣，而轻任之，二患也；大事不图，而小事是急，三患也。”云云。处专制之廷，犹能不讳若此，诚今日所望尘莫及

① 林述庆，字颂亭。

② 冯玉祥，字焕章。

③ 褚辅成，字蕙僧。

也。李晓钟来辞行赴青海。彭革陈来。晚阅缪荃荪自撰年谱。默自沙塘园归，为言雨岩、张群等评余为书生迂拙等语。若辈机械变诈，营私植党，糜烂国事，乃犹施然自为得意，欲以讥评，丧国男儿抑何不量！然介石蔽于群小而不寤，甚为其前途忧之也。宵中感时事之危棘，而终日溷迹朝市，虚糜盛时，拟脱离现状，创造一新环境，以尽卫国之责也。

5月30日 星期六 晴

午前贡沛诚来谈时事。观影印敦煌画，拟选印若干幅。午后作复各函。阅冯国瑞绛华阁诗及其所辑张介侯(澍)年谱。傍晚徐忍茹等来商党史会会务。

5月31日 星期日 晴

午前习文德、袁同畴来谈会务。张九如来谈西北情形。奚度青来谈叶荭渔事，谓其晚年饮博声色并营并鹜，遂患消渴，卒以不起，惜哉。午后2时偕默至考试院明志楼参观古物展览会。即为去年中国古物之一部，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者，其中分书画、瓷、铜、织绣、玉器各具，古书及考古各部，共陈列四室。书画中计：唐五代画各数幅，中包：李昭道(李思训子，人称小李将军)岳阳楼图，春山行旅图；五代刁光胤画团扇及花卉写生册，宋、元、明、清书画100数十件，有巨然葑北苑半海岳，范宽、马麟、夏圭(长江万里图)，马远、管道升(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王叔明(东山草堂图)，倪雲林诸家画；苏、黄、米、蔡及朱子诸家书牍、诗、札。铜器有商父率鬲、父乙甗，周饗饗鼎、康鼎及鬲、敦、簠、簋等。瓷器自宋之定窑、钧窑、汝窑、官孚龙泉，南宋之余杭湘湖，元之临川枢府，明之永乐宣德成化，清之康熙、雍正乾隆各窑；织绣有宋之缂丝书画，元、明、清之缂丝及绣画；玉器多为汉代之琮璜圭璧等(此部最为寒俭)，又翠玉、水晶、玛瑙各器，其他又有景泰蓝、剔红折扇及清帝御座、文

具；考古类有甲骨、铜器、骨器、石刀、石斧之属；古书部分有敦煌六朝写经，五代刻经，北宋本文选，李善注名贤文粹、册府元龟，南宋本乐书、诸臣奏议，金刻本五音类聚、四声篇，元刻本通鉴总类、通志、通考、十八史略、宣和博古图，明洪武本华夷译语、孟子节文，大浩天顺本，永乐本神僧传、大明一统志，成化本贞观政要，万历本秦汉印统，清顺治刻本楚辞，康熙本耕织图等。其出品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河南博物馆者。本日为预展，招待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及各院部会长官等，从明日起则展览三星期云。5时后归。侠魂八姨及族侄傅志等来。晚阅《武汉首义实录》（蔡济民、吴醒汉合编），及《辛亥劄记》（居正纂），所记尚多，可资考证，唯与其他数种史料尚多出入之处，则考定犹难言也。

6月1日 星期一 晴

本日为总理奉安之期^①，中央本有循例谒陵之举。余以为奉安之期，本与诞辰、忌辰不同，奚必岁岁循例趋谒，徒扰陵寝，故未往。10时顷陈紫枫来谈边疆事及国民大会事。贡沛诚来与之同看敦煌各影印画幅。午后阅民族教育史料。邹德高来谈两粤情形。晚阅晨风阁丛书，多为诗词丛辑，不足观。

6月2日 星期二

午前吴醒汉来述武汉起义史实，与党史会所辑者不同，希望订正云云，少谈去。阅古物展览会分类图说，叙述源流颇详。午后阅倭国军部所撰倭俄备战之情形，对苏联远东备战调查颇精确，敌之觊国也如此。徐忍茹等来陈述党史会事。晚阅斯坦因辑印敦煌藏画叙说，于中国中古时期之佛教艺术，多所考证。

香港报载胡展堂之遗嘱，全文如次：

^①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灵柩安葬于南京紫金山陵墓，史称奉安大典。从此每年6月1日为孙中山奉安纪念日。

余以久病之躯，养痾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詎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维追随总理，从事革命30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情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5月9日午后11时。 报记者肖佛成。证明者：陈济棠、邹鲁、林云陔、杨熙绩、陈耀垣、张任民、王季文、陈融、林翼中、刘纪文、黄季陆、陈嘉祐、陈淑子、胡木兰、胡毅生。

6月3日 星期三 晴

晨阅敦煌藏画说明。9时赴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25年度岁出入概算。其中岁入经常门为753,823,155元，岁入临时门为236,835,215元，总计990,658,450元；岁出经常门为754,063,198元，岁出临时门为236,595,252元，总计岁出经临为990,658,450元似出入尚能相抵，唯据孔庸之^①说明，谓岁入经常门中，关税虽列303,676,073元，而现在走私及国民购买力薄弱与此后海上发生障碍之时，此数决不可靠。又盐税一项，虽列189,187,225元，然实际中央收到者不过7200万元，不过2/5，余皆为地方截留。统税虽列132,796,117元，实际只纸烟税稍加，棉纱亦有问题。至国有营业收入虽列4100余万，而其中之营业纯益4000万元，尚未摊定。故9万万余总岁入中，实际约有1/3以上，殊非确数。而岁出方面，国防设备应付之3500余万元，航空设备费1500万元，均未列入实际，则为一假设之预算，于今后随时发生摇动者也。又决定修正偷漏关税暂行条例及续征公务员飞机捐办法等。11时顷散会归。本日为旧历4月14日，为余47岁初度。正午泰水及雨岩、淑

^① 孔祥熙，字庸之。

嘉^①、侠魂、叔同^②、仁甫^③等各家戚属暨中山学院学生、陆舒农等来，设宴招待。午后3时顷散。5时顷偕默至后湖泛舟，时许归。罗毅荪来，述将出国参加国际运动会云。晚阅教育各书。报载粤纸币狂跌，恐有事变。

6月4日 星期四 晴

本日各方情报竞传两广已于2日下午对南京宣告独立^④。白崇禧即誓师出发，闻已赴桂林，即往柳州。借口谓中央对日不抵抗，而以重兵压迫；西南由闽赣黔集中压迫谓中央军有30余万人。故为尊重胡展堂之遗志起见，率兵反蒋抗日，其兵力约为粤军七万，桂军正式军队约六、七万人，民团约五、六万人，共约二十万人云。此说如确，则不幸之内战又将开始。而华北倭寇又驩驩进迫，安得不现土崩之势！黑雾迷云，殊不知所届也。此后御侮、剿匪二事，究作如何应付，吾人心虽谓危，而中枢同志之散漫犹如故，如何能稍尽其责职，思之恍然。对于研究亦绝不感兴趣，终日闷闷。

6月5日 星期五 晴闷

本日各报纸多载中央对于两粤动员事辟谣。谓中央绝无增兵粤边之事，故两粤亦决不至有动作；然其下又称，如有此类行动，则不啻自绝于国民，为举国所不容云云。又似万一有事也者。且粤币日内狂跌，每港币千元须粤币一千七百数十元。则决非空穴来风之说，姑俟此数日中再证明耳。午前阅敦煌画像各考

① 指蒋作宾之妻张淑嘉。

② 张元祐，字叔同。

③ 张元群，字仁甫。

④ 1936年6月2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吁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对日抗战，并以抗日反蒋为名，组成抗日救国西南联军，是为两广事变。

证。马耐园偕警官高等学校校长李士珍(梦周、浙江宁海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来见,少谈去。贺壮子来报告经办各事。午后至党史会办事,观档案处整理情形,并召集编辑征集档案,三处主管人员告以工作轮替之意义。5时顷归。晚阅《天岳山馆文钞》。

6月6日 星期六 晴

晨送默至和平门站,候其登车赴沪而归。阅情报及教育问题资料。约马宗霍来谈整理史料事。午后沈毅(建邦、粤人,前广州市党部委员)来述两粤军情,谓粤中陆军统系未能一致。余汉谋与陈济棠尚有参差,其黄光锐经办之飞机制造厂,糜款千余万,实不能制一飞机,所购各机其数虽近百架,然款多中饱,能用作战者不及1/10,又无海军,故如与中央军相抗,必失败。故陈本意,尚踌躇不决。唯桂军中白健生^①与蒋有不两立之势,故较粤为难妥协。然桂军物质设备过薄,能否有决心,犹难言。又谓党政方面,邹海滨^②自去冬出席南京代表大会后,对中央态度较好,故返粤后,粤中即诋其为中央所软化,遇事掣肘乃不得安于其位。展堂返粤以后,海滨亦易与之直接谈话,每谈话时王养冲、胡木兰辄监视其旁,随时加以阻止,即许汝为^③访胡时亦然。肖佛成在先颇不为两粤所重视,乃胡逝世后,桂中因欲借之支持西南党政局面,故加以尊重,而海滨遂不得不行矣。又言林翼中在粤操纵政权情形,及陈济棠之兄陈维周借青鸟及风鉴之说操纵其弟。又追溯陈铭枢等在福建叛变前情况,谓蒋光鼐实无意作乱,乃蔡廷锴受黄琪翔胁迫,遂有暴举,谈时许去。黄甥冷玉偕其婿李震东来少谈,即去。率森、能两儿至后湖放舟,8时许归。晚阅书目。

① 白崇禧,字健生。

② 邹鲁,字海滨。

③ 许崇智,字汝为。

6月7日 星期日 午后雨

晨7时顷率森、能两儿至陵园散步，至紫霞洞休憩，循水榭而归。午后邵履均（鲁人，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现署陕西咸阳县县长）来述陕中建设情形，少顷去。阅阁帖。晚阅浙江图书馆馆刊。

6月8日 星期一 晴

感冒头疼，偃卧终日。

6月9日 星期二 晴

午前仍偃息。孙慕迦来谈时事，少顷去。午后准备演稿。阅报载：昨介石在中央纪念周报告西南军事，谓希望其不致有妨碍安内及统一行动；又谓最近当召开第二届全体会议，以谋共决国事云云。又闻罗文干已就任西南政务委员，并办理外交，而两粤军队已有一部分入湘，则恐非口舌之所能奏效也。晚8时半至中央广播电台播音，讲演题为：《民族复兴之条件》，大略谓欲求复兴，必先求能生存，亦须多数人具有生存之能力；最要者，则为智德群体诸要义，而终之以为民族牺牲奋斗之决心云云。9时顷毕。至沙塘园谒泰水，并与雨岩、淑嘉谈，11时顷归。

6月10日 星期三 晴

今日未开政治会，改开中央常会，决议7月10日举行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应付时局云。10时后访林子超谈时事及党机之阂阻，相对慨然。12时后归。午后整理演辞。阅《苏联阴谋文证》^①。至党史陈列馆看工程。7时后归。晚阅汪梅村（士铎）乙丙日记，系叙太平天国军入南京情形，颇多轶闻，亦并议论其主见，似感于

^① 即《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京师警察厅编译会1928年编印。

乱世故主严刑峻法，又以人多而多兵祸及屠杀；又以彼之二女，皆死于兵间。并鉴于嫁女之劳，遂力主溺女；谓非富人不可生女，产即溺之；又谓非富人亦不可娶妻，生子而不端正健全者亦溺之，即端好，亦以一为准，多不过二，过即溺之。其论之偏激若此，乃曾涤生^①等均推挹之，何耶？

6月11日 星期四 晴

晨默自沪归。午前赴财务委员会，讨论党史陈列馆预算事，决定不作独立预算，只在党史会经常费内月加2000元，于实际颇为支绌，然四海困穷，此后能维持几时，尚是问题，尚安能谈充裕耶。午后徐忍茹、陆舒农、高良佐来陈述党史会会务。寿毅成、勉成兄弟来，闻系在京参加经济建设专门委员会云。晚整理史料。阅孙退谷山居随笔（风雨楼影印手写本），多阅历深长之语，如谓：“宋庆历之时，老成登用，而雄俊强直之士，如石守道、尹师晋辈，比肩而出。盖所谓千人而一见，百年而一遇者，然其不幸，而为世所指，名奸邪小人，相与出力挤之，唯恐其不困。而天之于斯人也，恒使之齟齬连蹇，邑邑不得志以死。天之意殆勇于困君子，而巧于助小人也。”又曰：“金源未祀为宰执者，上下同风，以苟安目前为乐。每北兵压境，君臣相对泣下，已而敌少退解严，则大张具会饮，黄阁中无议事，至危处辄罢散，日俟再议，已而复然。用人必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日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用，虽用亦未久而遽退。近侍谄谀成每风。每奏四方灾异及民间疾苦，率不以上闻，谓恐圣主心困。”又曰：“治世之主，未尝不逸乐，乱世之主，未尝不忧勤。厉精而治，乱相悬者，何也？明主之忧勤，在于择贤，而逸乐在于得人。武王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夫乱世之君，各贤其贤，虽有真贤，而不能用也。是故悬不

^① 即曾国藩。涤生为其别号。

程书，损撤膳服，忧劳日昃，而天下滋乱。书曰：知人则哲，唯帝其难之。此之谓也。”其他粹语尚多，而皆平情勘理，无几偏激之议，诚为政者所应朝夕之复者也。

6月12日 星期五 晴

午前检书。中央军校政治主任教官何理润（泽荪），四川来请，约期为首都学生训练总队作精神讲话，乃定下星期一午后前往。午后孙慕邇、陶林英等先后来。闻中央军已与西南军昨日在衡州^①正式接触，此后兵连祸结，于国家元气将益凋病，而貽倭贼以无穷之利，此甚可痛。然中央亦颇多主战派，并作乐观论者，谓率性乘此统一西南。其司计政者，亦鉴于财源之日涸，谓粤东赋税，岁入可溢万万元，故亦望能乘机取之。众意如此，故当轴之意乃决。此亦天数也。晚检书。

6月13日 星期六 晴热

午前阅《正气堂集》。10时后至淮清桥参观西北文物展览会，为陈立夫等之开发西北协会主办，筹备已及二年。所陈列之物品，包括陕甘青宁察绥蒙古新疆康藏各区域，其种类凡分摄影、物产（包药材矿产、食品、林产、园艺、畜产、农产、工艺品、植物标本）宗教、风俗、古物、货币、图书七类，凡1900余种。其物品之来源，除一部分直接征集在外，则假诸中央研究院、蒙藏学院，地志图书等则假之国府图书馆及内政部。而西安碑林之拓片百数十种，亦全部陈列，宜其称类之博也。12时顷归。午后整理史料。晚7时至沙塘园应雨岩约餐，同席为孔文宣等，10时顷默君亦来谈，至11时后归。

① 今湖南衡阳。

6月14日 星期日 热，雨后骤雨数次

午前阅情报，称粤军有暂停顿之说，不谕确否。10时顷雨岩、淑嘉来，并留餐。午后同至后湖放舟，骤雨风急，乃登岸归。朱彬元来（近任金城银行储蓄处长），言近自粤中归，述彼中金融紊乱情形，少谈去。程沧波来，言章太炎^①于今晨8时顷在苏州逝世，年71。太炎近年于论事诸文，虽恒流于偏颇，然数十年中，以学术而创导民族大谊者，实为今日之灵光奄然谢去。海内读书种子尽矣，而清史掌故，亦阙一老师，为之敷述考证。惜哉！沧波并索太炎遗墨，为检其于民国6年冬，奉使赴滇，上孙公一书手迹，为影印之用。7时顷去。晚作复函，并准备演稿。

6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骤雨晚霁

午后赴中央纪念周。10时顷归。准备演稿。函楚伦谈济助邵次公^②事。午后3时顷，赴通光营首都学生军训总队（队长为桂永清），讲演题为：《非常时期青年之大任》。以放音机待修，又加暴雨，发音颇费力。5时顷毕返。晚捡物。11时偕默乘京沪夜车赴苏。本日《中央日报》社论栏载，程沧波悼章太炎一文，拟之于杨雄、蔡邕，用笔谿刻，殊与中枢尊重耆旧之意相违，究不知其意何居，乃肆讥评若此也。

6月16日 星期二 晴

晨5时顷抵苏州站，下车至花园饭店小憩。8时顷至城内锦帆路五十号章宅吊唁。各方来者颇多，由京往者有丁鼎丞^③、邓孟硕^④、陶冶公、刘禹生及余等数人。太炎之遗体，本定今日大殓，

① 即章炳麟。太炎为其别号。

② 邵瑞彭，字次公。

③ 丁惟汾，字鼎丞。

④ 邓家彦，字孟硕。

以气候炎热故已于昨日安殓。谒灵后，章夫人汤国梨与众协商太炎身后事宜，谓葬事外，则为其学会维持事宜。众谓葬事，中央同志颇有主提请国葬之拟议，容到京后再行决定；学会维持事，分为建筑讲舍、设藏书楼及继续刊行《制言》半月刊事。并拟先组织一筹备委员会，再推定董事，组织董事会云云。11时顷，大体商定，遂辞别返旅舍。默旋赴沪。余于3时顷亦乘京甬通车离苏，7时后到和平门站下车返宅。晚阅书报。

6月17日 星期三 晴

午前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所得税原则等各案。散会后与溥泉、焕章、礼明^①、立夫^②、伯群^③、頌云^④等谈昨在苏州章宅所商太炎身后诸事。溥泉谓晨间已商介石关于太炎国葬事，彼亦以为可行云。众乃推余起草应恤太炎提案，交立夫转送介石，签名提出而散。午后贺壮予等来。4时顷至中央饭店理发，并晤溥泉，并约孟硕同访林主席子超商太炎恤典事。又访丁鼎丞一谈。8时顷归。晚阅张慰西《南园丛稿》，以地理著述较有特色，其他文字亦多芜杂，如民国名人各传记中，陈英士等传已多采用余之成语，颇未能加以化炼。其他类似者犹多。因感于文字不能自成系统，终有杂凑之弊，余之著述亦多不免。此后应从专诣守约处致力，而力戒旁通广鹜，精勤数年，斯渐有所得。因感于慰西之丛稿，而不觉反省凜然焉。

6月18日 星期四 晴

午前作致介石函，为章太炎国葬事有所陈述，并对国际问题

① 疑为理鸣之误。覃振，字理鸣。

② 即陈立夫。

③ 即王文选。王文选，字伯群。

④ 程潜，字頌云。

谓宜致力于与苏联提携，如有可能，则余亦可出国一行云云。函虽发，然测介石之意，此时未必愿对苏联接近，以妨碍彼之外交政策，姑尽我忠告之谊，从否听之而已。陶林英、许师慎来述党史会事，知内部颇有派别及专擅之人，青年不知谦逊收敛，此后为祸为福殊未可知也。午后黎东方来，谈近学者对于中国古史之怀疑。余为言，古史有实证者，固从实证，无实证者，则从反证。如近人顾颉刚等谓古代无大禹，然对甲骨文者则不敢驳斥。若甲骨文固可信，则观其文字之整齐，文理组织之绵密，决非数百年所能发明，则殷前之文化可知。不能谓中国古代皆无文化，至殷而始，突然猛进也。近代言进化论者，皆谓进化必以期渐，无突然之理。固即以甲骨文可信而言，亦应认中国文化已发源甚早。再中国古代所经之冰川时期及地震、洪水诸灾，皆足毁除若干万年之文化及人种。不能因无确证而遽信为太古无文化之证。又谓吾人研究学术必以有益于时代，有益于人生为旨。若如怀疑古史论者，举一切中国古代之名人与文化而疑之，否认之，抹煞之，则是自戕其民族之自信心，而为异族张目，助其诋吾为本无文化之蛮族也，于心安乎云云。彼亦释然，4时顷去。访李协和^①谈二中全会及章太炎身后事，时许归。晚率森、能至世界剧院，观西北文物展览会经办之西北民俗歌舞及电影。其电影部分为余之西北视察记一段及斯文赫定之新疆考古，中央摄影场所摄之塞外大观各一部分。歌舞有蒙古、新疆、青海……各节，及东北之秧歌。10时半散归。

6月19日 星期五

晨阅《正气堂集》。午前赴党史委员会，处理会务。午后选《正气堂集》诗文及《止止堂集》诗文。俞、戚二公在当时不但以将略著，即其人亦博学潜修。恂恂儒者，如愚愚稿中所称，治天下

^① 李烈钧，字协和。

只节用青人一语，已足不在于半部论语。而俞虚江尤研治理学，故不以得失荣辱稍动其心也。晚作致默君函。选点愚愚稿。西南事犹未可乐观，固由桂军悍气难驯，亦中枢诸将不乏好大喜功者，欲乘机建立非常，仍图锐进耳。

6月20日 星期六 晴雨不时

午前补作闰上已修禊诗七古一首，尚待锤炼。上海中国书店送书画来看，陈老莲画佛一幅，索四百数十金，赵悲庵一隶书立轴，索百金，可谓咄咄逼人，乃均退还之。贡沛诚来谈时事，颇致愤慨，当告以唤起民众，应仍在三民主义立场努力。盖过去之错误，乃不实行主义之故，非主义本身有疵也。谈半时顷去。马宗霍来谈太炎身后讲学事，以为极不易维持，不如设纪念图书馆及编刊遗著较为切实云。午餐后去。午后阅书。徐忍茹等来陈述会务。晚孙慕迦来谈。校阅文稿。

阅季三《玄圃集》得会均韵：

两度元已花事奢，指点羲轮驻春旆；寒消渐见丁香繁，雨润乍意新竹大；群贤济济美东南，我愧园林媿水绘；随分还须略主宾，乱世几回容倾盖；新章奔赴万壑流，操选讵能定殿最；堂堂笔阵齐楚军，摩垒咨余同苦蔡；干戈动地催鬓斑，转毂人生几否泰；卅九年来历劫重（自戊戌闰重三至今岁为卅九年），莫负今朝良宴会。

6月21日 星期日 晴

晨6时半赴龙蟠里高等警官学校讲演，题为《非常时期之地方组织》。6时余毕。9时半至第一公园公祭杜仲虑^①，11时顷礼成。同雨岩出中山门至灵谷寺散步。归途至沙塘园一谒泰水即归。午后邓宝珊来访，新任监察委员王新会亦同来，谈西北情况

① 杜纘，字仲虑。

及今后对日方略，谈时许去。5时顷宗人鹤扬来，少谈去。6时半应焦易堂招宴，同席为邓宝珊、张溥泉、杨耿光^①、续式甫等。耿光并谈对日军事诸意见。10时顷散归。

6月22日 星期一 晴

晨赴中央纪念周，冯焕章报告对倭贼走私问题。10时顷散归。整理稿件。午后访邓宝珊等一谈。冯有真将赴欧，特来辞行。7时默自沪归。7时半居觉生约餐，同席为冯焕章、程颂云、丁鼎丞、张溥泉、李协和等，对太炎国葬事有所讨论，唯仍将取决于介石，又谈西南情形。10时顷散归。

6月23日 星期二 晴热，旧历端午节

晨8时顷赴第一公园，送仲虑启灵。闻陶冶公、周仲良等言，杨少炯（熙绩）由粤经湘抵鄂，被捕解京云。七时顷仲虑灵柩自公园启行，余及丁鼎丞、张溥泉、于范亭等均随行执紼，经常府街花牌楼而达励志社，遂分别乘车抵棲霞山棲霞寺，少憩，并一访乌目山僧，宗仰灵塔。11时举行葬礼，择于本日葬者，以为旧历端午，屈子湛身之日者，仲虑志事庶得之也。墓在棲霞寺右侧山腰，幽居庵地颇幽邃甚宜。榱真礼成后，随下山乘车返京。12时半返宅。偕默祭祖。午后朱镜宙、水楚琴、田崑山等先后来。晚招宴邓宝珊、焦易堂、张九如各伉俪及续式甫、王新会等，10时顷散。

6月24日 星期三 晴

午前访友、检书。马宗霍来谈太炎葬事。午后检书。徐忍菴等来。晚检书。

^① 杨杰，字耿光。

6月25日 星期四 晴

午前陈立夫来言，介石对太炎国葬事，犹主从缓，不知其意究何居，视本日常会结果何如耳。润色仲虑墓表稿。午后捡书物。贺壮予及藕舫来。晚捡书。

6月26日 星期五 晴

晨偕默至和平门站，乘8时半京沪车赴沪。车次遇上官修者（湘，石门人），自言曾在川办党务，又曾在组织委员会服务。因对现在党务及组织部张厉生不满意而辞去，谈时事极多，愤慨政局现状，不能定民志，亦可忧也。午后2时一刻车抵上海北站，偕默至古神父路51号新寓。室尚整洁，乃整理一切。宵中以蚊扰，颇不能甘寝。

6月27日 星期六 晴热

午前酌购文具、杂件，午后捡书物。

6月28日 星期日 晴热，傍晚雨

炽热不可耐，达90余度^①。稍整书室，阅《北江诗话》自遣。傍晚骤雨数次，气候较爽，乃研墨临写急就章数页。

6月29日 星期一 午前、后暴雨

午前至中华书局等处购书。又至宁波同乡会观褚礼堂、陈恣斋金石书画展览会。褚氏颇负鉴赏名，陈列尚富，乃与默购得沈寐叟联一副，郑叔向画筵及词扇、立轴一，以志墨缘。2时顷归。午后寿毅成来谈，半时许去。阅《南渡录》等。晚阅《南渡录》。

^① 指华氏温度。华氏表(F)32度为冰点，212度为沸点。华氏温度换算成摄氏温度的计算方法为： $摄氏C^{\circ}=5/9 \times (F^{\circ}-32)$

6月30日 星期二 晴，午后阴云不雨

闷热，不能出门。临写急就章数页自遣。

7月1日 星期三 晴

午前访许汝为谈，又访于右任，观其近辑之草书千字文。傍午归。午后捡书物。晚写急就章数页。

7月2日 星期四 午后雨

晨8时偕默乘京沪车赴京，午后2时顷抵和平门站。下车适暴雨，冒雨而归。阅各方函件。7时黄慕松^①在明湖春招宴，同席有赵芷青^②及蒙藏学院诸人。9时顷归。阅陆卿子《考槃集》，殊不能得有关翁孺安史料为恨。闻昨日中政会已决定太炎国葬。

7月3日 星期五 雨

午前偕默率森、能两儿至玄武湖泛舟，莲花已盛放，约行1小时，阻雨而归。作榜书数件。邓孟硕来谈太炎国葬办法。午后作书。5时后偕默分别访罗翼群夫妇及邓孟硕谈。7时顷应藕舫约餐。9时顷归。

7月4日 星期六 雨

午前骤雨不外出，捡书。贺壮予来有所陈述。午后雨岩来谈。晚捡书。

连日闻粤桂军仍分别布防，桂军除在柳州、桂林严防外，并进窥黔中，已占数县(独山、都匀等)。黔主席吴忠信有引咎辞职说。

① 黄慕松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② 赵丕廉，字芷青，时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

7月5日 星期日 晴

午前邓孟硕来，约同访居觉生，谈章太炎国葬具体办法，觉生谓拟俟本周政治委员会二读通过时再商，或提请推定国葬筹备委员会后，再由委员会中商之。10时顷归。孙德中来谈河南大学事，并以李涵础所藏影印之王阳明书四篇见贻。阳明书源出圣教序，而锋颖特张，犹见精悍之色。午招宴罗翼群、邓孟硕夫妇，及王玉父、田崑山、丘远雄、王超凡等，3时顷散。4时顷马耐园偕警官学校学员谢熊（拍淮、醴陵人，复旦大学法学士）、王复初（河南商城人）来，与之谈政治哲理。又朱君毅夫妇来。晚张九如约餐，偕默同往，张妇周嘉青为默之女子师范学生，同席有邓宝珊夫妇等。9时顷归。闻近日有粤军空军驾驶员20余人及战斗机7架，已归附中央军。

唐少川^①因不满粤省行动，已由港来沪，闻明日将来京。

7月6日 星期一 晴

午前至党史会办事，并处分验收史料陈列馆工程，及迁移档案事。党史会人员作事终不上紧，泄泄沓沓，令人闷损。正午归。午后袁同畴、习文德来谈国民大会选举事。徐忍茹率胡×来，稍询其略而去。检阅祁忠敏夫妇史料，备著述用。晚检阅孙退谷史料。

7月7日 星期二 晴

午前王培仁、寿昌^②等来，为之指示会务。又整理史料。午后徐忍茹等来。晚撰稿。

① 唐绍仪，字少川。

② 谢冠生，字寿昌。

7月8日 星期三 晴

晨撰稿，题为：《建设民族，中兴文学议》。10时顷偕默至青年会观书画展览会，无可观，时许而归。午后3时至中央党部召集党史会常务会议，对于迁赴陈列馆及筹备各事有所讨论。5时顷散会。晚炽热，不能治事。

7月9日 星期四 晴

晨7时赴明故宫飞机场，参加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①年纪念，并举行阅兵典礼。参加演习者除军校教导队外，有上海、南京各地受军训之大、中学生数千人，由桂永清^②任临时指挥。10时顷礼成归。午后炽热，不能治事。晚7时半偕默赴励志社应介石招宴，其余兴有军校乐剧及刘宝全大鼓等，9时半散。

昨陈济棠之东区军司令李汉魂通电，主停战；北区军司令余汉谋亦已到京。闻陈势颇蹙，有软化之意云。

7月10日 星期五 晴95°（华氏）

晨4时顷起赴陵园。6时在总理陵堂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礼。由林子超主席并致词。7时顷礼成归。8时在中央党部举行预备会议，推定蒋介石等为主席团，会期为3日至5日。9时顷散会归。续草文稿。午后访冯焕章，并晤唐少川诸人，谈时许归。晚检书。

7月11日 星期六 晴

午前7时举行二中全会第一次会议。由居觉生报告中央常会

①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表就职宣言，至此北伐正式开始。

② 桂永清时任中央军官学校教异总队总队长和首都警备副司令。

工作概况，张群报告外交政策之经过。9时顷散。偕默君访唐少川一谈，渠对粤政颇有所批评，又谓中枢政治必以通情志，集贤能，对地方必以通力协济为主云云。谈半时许别归。途至中央商场理发。午后偕默至后湖放舟，看荷花。晚热不能治事。

7月12日 星期日 晨风稍凉

昨宵中忽东北风作，气候较凉。午前审阅文稿。午应徐忍菴、林一厂在吴宫食堂约餐，同席为柳亚子数人。散席后至沙塘园一候泰水，谈半小时归。阅书牍。族侄秀明、傅志等来。晚阅程易畴《论学小记》及《论学外篇》，于修省之理言之颇详。闻王养冲为陈济棠所杀。宵人倒行，宜及祸也。

7月13日 星期一 晴

晨7时中央纪念周，介石报告对时事及国策有所批评，并表示最后奋斗之决心。8时举行全会第二次会议，由孔庸之报告国家财政现状，何敬之^①报告军事设备，程颂云报告国防计划。讨论事项中重要者为：取消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唐少川等提案）；免陈济棠本兼各职，调为国防会议委员；以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总司令；以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正、副绥靖主任；以林云陔、黄旭初为广东、广西省政府主席；又在中央设国防会议，以军事委员长、行政院长为正、副议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及军政、财政、海军、交通各部长等为会员，另指定张学良等20余人为会员，参谋总长兼秘书厅长。11时半散会。余汉谋奉命后，即于午前乘飞机至大庾，指挥粤军返粤。又赴党务组审查会议。十二时半散会。午后及晚捡书物。

① 何应钦，字敬之。

7月14日 星期二 阴雨

午前9时赴全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宣言等即去，10时后举行闭幕式，由冯焕章致词，并读大会宣言。11时散会归。午后捡书物。王亮畴^①、吴礼卿^②及邓孟硕夫妇先后来访谈。7时后应警官学校校长李士珍在中央饭店约餐，9时顷归。

7月15日 星期三 傍晚阴雨

午前招王扶生来，命其约束世澄来谈；又约寿昌、徐忍茹、许师慎、贺壮予来，分别处分各事。10时半访丁鼎丞，谈太炎恤典事，值溥泉及石敬亭在，并稍谈华北及两粤事，谈半时许归。午后题总理手改演稿。王扶生、束世澄来与谈古代史等。鲁觉吾来报告办《大夏晚报》事。陆舒农、高良佐来述党史会迁移事。泰水及雨岩来。傍晚云生率傅宅甥来。晚写题总理遗墨跋文。

7月16日 星期四 晴

午前赴党史委员会办事。至龙幡里国学图书馆访柳翼谋^③谈影印祁忠敏公日记事，因昨接王子余来书称：已觅得祁忠敏手书日记，自辛未年秋（崇祯四年）至乙酉夏（闰六月四日止，即公殉国之前二日），所记多明末朝章国故暨，当时清流党人之行述，关系绝大。且明人之日记，有系统者，除李日华之味水轩日记外，殊空前。即李氏所记，亦多为鉴赏及退居之事，近于小说。故祁公书实为空前瑰宝也。翼谋意以全部影印为宜，当与子余再函商之。11时后归。午后因宅中人事纷拏，因至紫霞洞读祁忠敏日记抄本。首尾两册，祁公当国变后，鉴于时事日非，退隐越中，本已有潜居之志，观其所记修缮斋舍，整理藏书，俸音酬

① 王宠惠，字亮畴。

② 吴忠信，字礼卿。

③ 柳诒征，字翼谋。

对，有终焉之意，乃清军必欲迫其出山，遂浩然长归。亦足慨焉。5时顷归。6时至中央党部，应丁鼎丞约餐，并商筹备章太炎国葬事宜，到冯焕章、李协和、张溥泉、于右任等，当商宜推筹备委员，请葬费，定葬地等各事。8时顷散归。检物至宵分寝。

7月17日 星期三 晴

晨7时顷，偕默率森、能两儿赴下关，乘招商局^①江新轮赴牯岭。9时启碇，午后5时顷过芜湖。舟次读闾古古诗集。古古当国变以后，辞多变征五、七律，尤纵横不羁；王渔洋讥其诗无法度，余则以为古古诗乃在运典苦多，刻意矜奇，尚非如渔洋之所评也。

7月18日 星期六 晴，晚骤雨即霏

晨舟过安庆，午后4时抵九江登岸。至中国旅行社雇车，乃以介石自京飞来，全市汽车均为省府征雇至飞机场。交通全为阻绝，地方当局之媚兹一人，欲政治之清明难矣。5时顷始雇得公共汽车行大汽车一辆，(需价16元，即为20人之票价。)由九江至莲花洞，改乘藤舆(每乘3元余)。登山行，中途遇介石舆过，略一通问而行。抵牯岭后，天渐黑，与人途不熟悉，辗转至医生窪17号槐庐假寓，(寓主为王介民，湖北黄冈人。)晚餐后已11时顷矣。(地处山巅，宵中风号甚厉。)

7月19日 星期日 晴78°(华氏)

午前偕默至大林街访淑嘉一谈，归。硕民甥同来午餐后去。偕默至茭芸桥一行。晚风号甚厉，触绪纷纶，眠殊不安。

7月20日 星期一 78°(华氏)

午前捡书，并整理书室。午后阅韩退之诗。晚作函。闻陈济

^① 即轮船招商局，清末李鸿章招商创建。1932年归属国民政府交通部，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财产。

業已避居香港，粵事可速了。

7月21日 星期二 82°（华氏）

午前作寄京中各函，并定聘束世澄为党史会编审。草俞武襄、威武毅诗文钞序。午后读韩退之诗。晚较热，有蚊。

7月22日 星期三 82°午后大雨

午前偕默至复兴路猴子岭上194号看屋。又至黄龙寺附近访林子超主席，渠于今晨始至山，谈少顷别。至黄龙潭少憩。归途至牯岭稍购物归。午后读杜诗。大雷雨傍晚放霁，霞彩绚烂。

7月23日 星期四 晴午后雨80°

晨6时至河南路、经牯岭市街、河西路小步一周归。午前读杜诗。午后读中华通史。

闻广西李德邻^①、白健生亦有离职之说。余汉谋今日可至广州。财政部派宋子良为广东财政特派员兼财政厅长。林云陔亦已返省。刘纪文来京云。

7月24日 星期五 晴，午后大雨，78°（华氏）

晨6时顷至大林路及仙人洞一带散步。8时顷偕默雇竹舆经小天池至王家坡。碧龙潭地幽邃，瀑分三股，汇为澄潭可浴。因为盘礴时许，归途经小天池遇骤雨，2时后返旅舍。假寐时许，读杜诗。晚读钱警石《曝书杂记》。警石为钱箴石之曾孙，博闻敏学，能世其业。其所记皆为所藏及所见诸书，考订评论，用力甚勤，甚可一读也。

^① 李宗仁，字德邻。

7月25日 星期六 78°午后大雷雨，傍晚霁

晨读杜诗。午前偕默至芸林看屋，其第67号一宅，为闽女士陈一德（清华文科毕业，陈子范之女）奉母以居，闻为魏子杞之宅，尚轩敞。又至47号茭芸精舍，即15年偕默同住之俄国饭店，今为李君一平在此办学，其主旨首在予学生以生活之技能，注重农业，兼及读书，唯其道大艰，恐未能推行尽利也。午后大雷雨。阅中国通史。

7月26日 星期日 74°（华氏）午后大雷雨

晨至河南路散步。午前阅中华通史。雨岩自京来谈，至11时顷偕默同至大林路渠寓一谈，晤沈葆德，为周钟岐之妇（为默在务本之同学）。午餐后同至御碑亭、仙人洞一行，4时后归。阅通史。5时后大雷雨，彻夕不息。

国府昨明令调白崇禧为浙省主席；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李品仙为副主任。

7月27日 星期一 暴风雨终日，想益厉，70°（华氏）

晨读杜诗。午前阅中华通史。内政部视察蒋天擎（湘人，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来谒。午后读通史。雪窦寺方丈太虚来约讲演。傍晚读杜诗。

7月28日 星期二 风晴，73°（华氏）

读中华通史。傍晚至河西路一带小步。

本日行政院会议，改组粤省府，以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调林云陔为蒙藏委员长）曾养甫为广州市长。

昨国府令，派余及丁鼎丞、张溥泉等为章太炎国葬筹备委员。

7月29日 星期三 晴77° (华氏)

晨至松林路散步。午前、后读通史。闻桂军犹布防分进，李①、白②将不受命，或尚有事变。

7月30日 星期四 晴78° (华氏)

午前偕默及雨岩至芦林看屋。又偕默经黄龙寺而至神龙潭一观，飞流壮阔，林泉深美，逸境也。午后1时顷归。庐山管理局局长谭炳训（济南人）及黄子荫先后来。为蒋天擎等作书数帧。

7月31日 星期五 晴78° (华氏)

晨至松林散步。午前至145号访黄子荫。大林枋6号访李协和。仙岩饭店访那文。庐山图书馆晤陈立夫。正午归。雨岩来，午餐后去。午后阅通史。傍晚偕默小步松林路，并至牯岭少购物，循河南路归。晚稍读报。

8月1日 星期六 晴78° (华氏)，晚暴风雨

晨至松林路小步。午前稍准备演稿。傍午偕默访李协和一谈。午应太虚上人约，在大林寺素餐，同席有居觉生、李拙翁、李子宽、雨岩诸人。2时顷在寺举行讲演会，由余及协和、雨岩、默君、又释、慈航分别讲演。余讲题为：《宗教与人生》。略述人生活为物质及精神之二部分。精神之生活包涵理智与修养二者。在释典之小乘，以劝善惩恶为义；大乘则主舍己度人，并泯人我诸相。而其修持程序，必经戒、定、慧，以达于八正道。由正思惟端其始，正精进励其业，乃可圆觉究竟得无边胜义，而完成精神之修养，充实人性之虚灵，以度人、度世云云。约三刻钟而毕。

① 指李宗仁。

② 指白崇禧。

5时顷散。至雨岩处一谈。并小步花径，7时顷归。晚骤风雨。

8月2日 星期日 72° (华氏), 暴风雨终日

本晨原拟登汉阳峰，乃因风雨甚恶不果。阅闾古古集。傍午张莼鸥偕龙绳武（滇省主席龙云之子）来见，谈滇中近状，时许去。午后雨岩及卫挺生夫妇来。晚风雨不辍。

李宗仁等在桂有组织国防政府之说^①，其参加人员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刘芦隐等云。

8月3日 星期一 73° (华氏), 风雨时作

午前、后为《建国月刊》撰人鉴技义。就前著人鉴通义之旨而绎之，中多采闾古古著知人、用才二篇之说。闾氏生遭乱世，见闻颇周，故能博征，而见其大也。

8月4日 星期二 晴, 72° (华氏)

午前至仙岩饭店访居觉生、肖纫秋、王亮畴等谈。归途至牯岭教堂观书画展览会，购得歙砚一方、寿山石章数盒。中有一白寿山刊印禅二字者，疑为曼殊流散画印，当与其原画一证之，如确为其故物，亦曼殊身后一段翰墨因缘也。默亦购宣德炉及玉琮等数件。正午归。午后阅杜诗。雨岩等来谈。

8月5日 星期三 73° (华氏), 午后山南大雨

午前阅中华通史。10时应介石海会寺午餐之约，乘舆行。经大月山、鸡爪峰、南山峡、木瓜岩。在南山峡观五老峰及俯瞰鄱阳湖，皆甚佳，唯时已阴雨，晦算云弥不能及远。12时顷抵海会寺。四周建屋甚多，皆为近年庐山训练之需。午间同席有冯焕章、李协和、居觉生、肖纫秋各部长等。餐后至海会寺小憩，旋

^① 7月30日，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组织军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

乘汽车赴秀峰寺，沿途观鄱阳湖景颇佳，2时半抵秀峰寺。寺建于南唐李景时，后庆洪武初重建。即居僧楼，以雨急不及出观青玉峡。院中有老桂二本，传系明天启时植，已三百数十年，高逾四丈，荫蔽数亩，花时必甚可赏，惜寺僧不学，四周皆以墙垣院宇阻之，损其美矣。晤潘赞纪夫妇，来此数日矣。据言距此五里双剑峰下，有黄岩，唯路甚崎岖，颇艰登降。其北有开先瀑，即马尾泉，势颇壮。其右为香炉峰，皆匡庐胜地，拟明日往观之（秀峰寺西10里为归宗寺，更西则为温泉及渊明栗里，以达星子县云）。解装后，雨终不辍，乃枯坐阅庐山志自遣。驻星子军队派员携食品及啤酒来佐餐。宵中多蚊及蠓虫，雨声彻夕，玉峡亦瀑声喧阗，不能甘寝。日前卫挺生言秀峰精洁可住，乃殊不然，则知事不亲验之，不可恃也。

8月6日 星期四 山南仍雨70°（华氏）

晨5时顷起，雨仍不止。10时顷稍减。以枯待非计，乃决起行，先至青玉峡一观，由黄岩瀑奔赴而来，以雨盛，势甚汹涌。两崖石壁有朱元璋题第一山等石刻，稍观即启行。本可径向观音桥、棲贤寺登山，以雨甚，舆夫谓沿途山流纵横难行，宜仍由海会登山，循昨日原路行。虽多20余里，而较稳妥，乃听之。途中雨仍不止。12时顷过海会寺。登山过南山峡时，石崖苍黑如铁，飞瀑乱流，舆夫踏流而过，不啻人在瀑中也。过鸡爪峰、大月山时，风极厉，舆欲乘风飞去。6时顷返寓，默为举觞相庆。晚阅函牍书报。

8月7日 星期五 晴72°（华氏）

午前至古物商场一观，无当意者，默购得叶小鸾花卉四幅，尚精洁，题亦娟秀；又黄石斋夫妇合作手卷，则尚待考。午后食西瓜，颇不舒畅。

8月8日 星期六 晴75° (华氏)

午前作函多通，率以人事殊病琐琐。王亮畴来谈。画估来，购得元郭天锡山水立轴，有姚少师题。午后分别访冯焕章、林云咳、刘显丞、刘纪文谈。晚阅书报。

8月9日 星期日 晴

午前画估送书画来看。习文德来，渠日内拟赴湖北竞选。午偕默率森、能至白云观路应般若精舍住持定念素斋。定念为神州女学学生，以感于身世，遂事披缁。其室殊精洁，3时顷归。午后画估仍送书画及磁器、图章来看，购得钱维城枯墨山水及禹之鼎、青绿山水等，数条。

8月10日 星期一 晴

捡物。画估上、下午送来书画多件，其中多湘乡曾氏（梅花书屋）、长沙叶氏（郎园）、安化陶氏（印心石屋）之物，诸家当数十年前赫奕一时，宁知今日乃为不肖子孙以累代珍藏，易作饮博之资耶！家教之宜亟不益可征欤！当购得陆包山没骨花卉4帧，倪雲林山水姚少师册页12帧，王烟客、文衡山山水各1帧。王、文两帧尚有疑义，陆、倪、姚各帧均极精。傍晚淑嘉来谈，饭后去。晚捡装。

8月11日 星期二 晴82° (华氏)

午前9时后乘藤舆至海会寺。11时3刻到。以本日天气晴朗，故下山之。顷旁五老峰降南山峡，俯对鄱湖，气象壮丽，唯以湖渐淤故，洲屿多显露，蓄水不丰，长江所以一遇水盛，即宣泄而下也。到寺后，潘佑强来迎。午后稍憩，并准备演稿。3时在大讲堂为特别训练班诸生讲话，题为：《国民革命之过程与成功》。约两小时而毕。以听众约2000人，又无传音设备，大声疾呼，颇为费

力。晚餐后，在游泳池一带巡行一过归。洗沐，9时后寝。

8月12日 星期三 晴85°（华氏）

晨5时半起，6时半离海会寺，潘佑强派政治训练处长吴君伴乘汽车赴白鹿洞。距海会寺约5里，后倚五老峰。入山道中，松杉交荫，溪流委婉，间以农田，绿耘如绮。约2里许，渡贯道桥，有名教乐地，坊额其内，即为鹿洞书院。今为江西农业学校，事务所犹贮有旧书院所存经史各书数10筐。宋时朱晦庵讲学于此，为四大书院之一，规模甚弘。今堂宇颓芜，为之慨然。若能加以葺治，犹足为讲学胜地也。8时半至秀峰寺，以上周来此阻雨，不得详观，乃重至青玉峡流憩。又观寺门、亭、壁所刊唐绘观世音半身像，又寺后南唐李后主读书台所刊黄山谷七佛偈，王阳明平众壕纪功题名碑，并遇卫挺生一谈。旋步行，登黄岩寺，寺在双剑峰下，距秀峰寺只五、六里，而山道崎岖，登陟颇艰，气候又骤热，休息数次始到寺。院宇已蔽，因移竹榻于寺外柳杉下，听瀑看山，约半小时。登对崖虎山顶，有石亭亦圯。其北石壁深逾百丈，开先瀑（即马尾瀑一线）倾泻而下，源出汉阳峰，经黄岩洞而下，李白观瀑布诗所谓飞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银河落九天者，即指此。季陶于瀑侧崖间题字，以过小，数年后，朱漆剥落，不可见矣。少顷，仍循山道下，返秀峰寺午餐。午后至万杉寺一游，距秀峰二里许庆云峰下。建于梁代，为五大丛林之一，今已荒芜。少憩即行，经秀峰仍乘汽车赴归宗寺，在金轮峰下，形势甚佳，殿宇亦尚轮奂，有右军洗墨池，池上壁间刊宗鉴堂丛帖，数十方，多二王法书。又至紫桑桥附近温泉，距归宗五、六里，已建温泉旅舍，尚精洁，以时促不及入浴而行。6时顷达九江大华饭店，馥已率两儿自牯岭来。乃观其两日新得书画，有沈石田长卷山水殊佳。稍息至中华池沐浴，并按摩。晚间以气候热，不能甘寝。

8月13日 星期四 晴82°，晚雷雨

午前10时顷，招商局江安轮已抵码头，乃检装离旅舍登舟，乃以装货多，至午后5时顷始启轮。傍午牯岭画估又来，复购得浙江山水直幅，沈石天白描山水数帧。可谓满载而归矣，然囊橐垂罄，亦无憾焉。汇记此次在山所购书画目：姚少师广孝山水册页12幅，极精，罕见神品；黄石斋夫人临陈白阳花卉长卷，极精，有石斋跋；冒辟疆山水立轴，董小宛题诗，逸品；陆包山花卉四帧，精品；叶小鸾花卉四帧，并题诗，精品难得；沈石田山水长卷，晚年之笔，极精，神品；董香光诗画手卷，精品；倪雲林山水立轴，精品；浙江浅绛山水立轴，精品；张大凤山水立轴，精品；倪鸿宝树石，逸品；陆包山山水立轴，精品；瑶华道人墨笔山水册页，精品；南楼老人临赵承旨双马立轴，逸品；沈石天（颢）白描山水立轴，逸品。以上15种，皆真罕见之品。宋巨然层峦肖寺图立轴；宋李迪丹凤朝阳图立轴；元郭天锡山水立轴，有姚少师、王梦楼跋。以上三轴亦颇精，若考定为真，则连城不易也。王烟客山水立轴；文征明山水立轴；石溪山水立轴；禹之鼎山水立轴；钱维城山水立轴；张船山红梅立轴；黄瘦瓢枯树立轴；吴莆田山水立轴；虚谷指画木石斗方。以上9种，有待考证，或非最精者。

8月14日 星期五 晴

午前舟经大通，午过芜湖，下午3时抵南京下关登岸，徐忍茹等来迎，进城返宅，诸人率谈，少顷去。园中紫薇盛放，池荷以水涨，花开不繁。一月旅行，小作结束，而满载名画归来，亦旅中胜缘也。

8月15日 星期六 晴凉

午前至史料陈列馆，看布置情形，并处分各事。午后会客，

阅书报。桂事尚未易乐观。

8月16日 星期日 晴

午前张凤九来谈国际问题，且以为西北基础，必需得俄国谅解，对俄外交应需努力云云。谈半时顷去。马耐园来报告党务。马宗霍来同读画。午后访侠魂八姨。晚阅书牋。

8月17日 星期一 晴

午前至党史会办事。午后邓孟硕、孙德中先后来。补日记。

8月18日 星期二 热90°余（华氏）

午前奚度青来谈选举事。赵子懋来谈求职。午后泰水来。补日记毕。

8月19日 星期三 晴94°（华氏）

午前、后校阅俞大猷、戚继光诗文抄。晚办应酬文字多件。

8月20日 星期四 晴

午前至党史会办事。吴醒汉以辛亥武昌起义史料来，余告以修订时，当作参考。彼意必欲以其材料为完全根据，嗷嗷不已，殊为愤妄。归途至大华饭店观湘中寄售书籍，无难得之本，价亦不廉。午后复王子余函，论修订越中三不朽图赞事，以为宜扩其例至于三代，以逮民国建立诸贤。晚招宴泰水及诸亲属，9时后散。

闻颜惠庆决辞驻俄大使。介石拟派蒋廷黻任之。崇宵人而奖奔竞，虽获十西南，不偿枋政之失也。

8月21日 星期五 阴晴

午前至玄武湖放舟，赏荷并购新采莲实。午后阅通史。晚室

人相谪。

8月22日 星期六 阴晴晚雨

午前阅笔记。午后丁甥炜文来。3时赴党史会，举行编辑会议，关于总理全书及党史丛书出版事，拟以本月、10月10日先出数种，11月中出总理全书，其史料丛刊，计划另行规定。5时后散。晚阅书。

8月23日 星期日 阴晴 本日处暑

午前率炜文甥及森、能等，至陵园谒总理陵。归途至谭墓^①及游泳池一观。午后偕默至中央饭店答访李孟博夫妇。又贺于范亭子婚。3时半归。浙江文献展览会代表李楚狂来，商征求展览材料事。孙茂柏来陈时事。晚阅祁忠敏日记。

8月24日 星期日 晴

晨赴中央纪念周。午前汤公介等来。午后徐忍茹、贺壮予、袁同畴先后来。阅宋书载，宋太宗时，王小波起于蜀，以愤官吏苛敛，乃以均贫富为号召，人民靡往从之，亦共产运动之先河也。晚阅宋书。先考妣及先兄嫂生讳日：先考大昌公，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六月二十一日寅时，卒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五月十七日申时，享年54岁；先妣屠太夫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三月二十九日酉时，卒于民国9年（庚申）9月初7日戌时，享年72岁；先兄鹤松府君，生于清同治×年甲戌八月十六日未时，卒于民国2年（甲寅）12月初2日未时，享年47岁；先嫂李夫人，本县李种元公幼女，年20来归，鹤松府君，产子四、女二，皆不育，卒于清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享年38岁；先嫂俞夫人，为

^① 指前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之墓。谭墓位于紫金山麓的灵谷寺东北处。

本县俞惠甫公次女，鹤松府君继室，无出；嫂王夫人，鹤松公再继室，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己丑 廿四日申时，现年48岁。

诸姊诞日：归丁大姊，名珍，生于清光绪元年乙亥正月十二日寅时，现年62岁；归钱二姊，名彩，生于清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初八日寅时，现年60岁；归傅三姊，名玉瑛，生于清光绪六年庚辰十一月十七日辰时，现年57岁；三姊丈傅云笙，生于光绪九年癸未四月十四日辰时，现年54岁；归陆四姊，生于清光绪九年癸未正月初四日寅时，现年54岁。

此大元帅章，为民国六年孙公开府广州时铃用之小章。七年解职，归海上，余保存之。每一瞻对，感喟亡已。

二十五年秋初，元冲敬识。

8月25日 星期二 晴

晨偕默率炜文甥放舟玄武湖观荷。8时后炜文离京赴沪，转绍兴，拟伴大姊来沪，治目疾。大姊患失明已十余年，因近闻周医生能治，故邀其来沪试诊。如能复明，亦大快也。10时顷归。许师慎自日本调查归，有所报告。午后至棲霞山棲霞寺访刘允臣，渠居山已数周，正纂辑绥远一带之调查报告，谈2时许别。晚阅绎史、孔子学述。

8月26日 星期三 晴

午前阅绎史。10时后至党史会办事。湘中周厚持（志伊）来见，状殊潦倒。午许公武约在考试院午餐，同席为林云陔、陈树人、吴礼卿等，二时半散。贺壮予等来。晚阅绎史。

史记称：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而未济。子贡问之，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君子讳伤其类，故不济。近日苏联政府因检举托罗茨基反斯大林之运动而处死刑者，十六人，凡昔日与列宁建国之

齐诺维夫等均与焉，数十年共艰难缔造之老臣，一时锄而去之，如摧腐草，此与倭军今春屠杀诸枢相者，若出一辙，其事变未可测也。

8月27日 星期四 晴

本日为孔子诞辰纪念。午前8时应合作学院之约，前往讲《孔子之民生哲学》。绎仁恕之义，而归之于大同，为民生理想之极则。九时后讲毕，略参观而返。访汪辟疆一谈，渠方辑近代诗选，期以一年竣事。午后马耐园、姜毓彭等先后来。晚听中央广播电台播音肖韶九成古乐。晚阅书报。闻桂军将出高、雷、钦、廉^①，以通海口，前锋一部分已占廉江云。又成都人民日前以反抗倭伪领事^②，至省设馆及制止仇货，举行示威，倭记者二人死。倭京汹汹，欲借此造成大变。外交主政者颇棘手。然民愤已深，不因势利导，徒欲缓和其情感，庸有济乎。

8月28日 星期五 晴

午前捡书画。10时至中央党部参加章太炎国葬筹备委员会，拟请国民政府先拨款一万元，11时顷散。雨岩来一谈。午后章柳泉等来。王扶生来陈述党史会积弊。晚作复各函件，捡物。

8月29日 星期六 晴80°(华氏)

晨8时顷至下关，乘京沪车赴沪，默送之站话别。同车遇程沧波、狄君武谈。午后二时一刻抵沪站，返古神父路寓所，捡书籍。晚整书籍。车中阅茗斋集，明末彭孙贻（羿仁）著。父太仆公期生殉国于章江，故国变后，终身奉母不出，所为诗几达八千

① 高，指今广东省高州市；雷，指今广西大新县；钦，指今广西钦州市；廉，指今广西合浦县。

② 8月24日，成都公众为反对日本在蓉设领事馆，发生反日暴动，殴毙日人两名，史称成都事件。

首。又流寇志、彭氏旧闻录、太仆行略等书，皆足备明末史籍之未备。其诗渊懿治雄，而吐属自然，无丝毫斧凿之痕，而自然锤炼，实为遗民之雄，尤在翁门之上也。

8月30日 星期日 晴

午前临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以其廉劲有法。祝世康来谈。午后、晚阅中华通史。

8月31日 星期一 晴

午前至蝶隐庐等处购书物。午后阅通史。晚阅明末吴次尾著《庚辛壬癸录》，述崇禎十三年至十六年见闻，颇足与史乘参证云。

北伐军与五省联军之战

田韵清 潘振英

1926年7月间，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在出师之前提出，打倒吴佩孚，联合孙传芳，不管张作霖。孙传芳自以为有五省地盘，雄据东南半壁，大有可为。他一方面大喊其保境安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又标榜三爱主义，（即爱民、爱国与自爱）但是并不排斥三民主义。

蒋（介石）吴（佩孚）两军交战之后，孙则按兵不动，主要原因是吴佩孚一贯视孙为部下后起的人物，对他有些不客气。而今天的孙馨远，羽翼已成，不欲仰人鼻息，且对吴早怀不满。蒋吴交战，结果必然是一败一伤。一旦机会到来，大军一出尚不知鹿死谁手。

焉知唇亡齿寒。蒋介石打倒吴佩孚，岂容孙传芳酣睡乎？不久，北伐军乘势分路向江西进兵，孙传芳才不得不仓卒应战。战斗部署分为四个方面军团，除福建的周荫人为第四方面军团长外，其第一、二、三三个军团均在赣西境上分头迎击北伐军。两军接触后，南路军就把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王柏龄的教导师全部击溃于袁州附近，王柏龄只身潜逃，后来与李宗仁部再会战于修水、万寿宫一带时，孙军溃败，以致南浔铁路（南昌至九江）被冲为数段。孙急调段承泽、马葆珩等部增援，至牛行车站血战二昼夜，击退了李宗仁的大军，因之联军士气大振。是年9月间孙命令周荫人的第四方面军团由福建出兵，直捣广东。这一部分序列是以周荫人为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张毅（字仲刚河北省洵县人，

福建武备学校毕业，原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兼漳厦镇守使）任第一军军长左翼指挥官。其所属之第一旅旅长李芳池（字滇芬，河北省武强县人保定军校第二期毕业）为左纵队司令，率所部由诏安进出黄岗；第二旅旅长田宝奎（字韵清河北省深县人，福建武备学校毕业）率领所部并附两个补充团，为右纵队司令，由平和进出饶平向潮汕会师；周荫人自兼中路总指挥官，率领第十二师二十四旅旅长刘俊，福建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孙云峰，由永定进攻大浦；福建陆军第三师师长李凤翔（字鸣皋山东济宁人）率所部曹万顺、杜起云两旅长为右翼指挥官，由上杭进攻梅县，待潮梅占领后，由惠州进逼广州。部署就绪后，约于1926年8月下旬，左翼右纵队之李芳池部已占领黄岗。该地守军吴本张全部投降，并愿为先导，直扑潮汕。右纵队田宝奎部与敌军张贞部接触后激战于庙子前、水口附近一带地区，因得当地百姓之助（如引路压山等）将张贞部之杨逢年旅全部俘虏。杨只身逃走，张贞亦仓惶后退。是夜因北伐军桂永清率教导团约3000人，由永定、经风浪、白喉，暗袭我军后路，掐断我后方交通线，张毅军长自动后撤60华里。同时我们得悉周荫人在永定被何应钦包围，我们遂派吴松涛团回击桂永清军，派钱玉成团由正面攻击，将桂部打得溃不成军，桂永清狼狈而逃。此时田旅与军部取得联系，旅长田宝奎与军长张毅在电话中交谈。张说，现在中路全线全部溃败，督办周荫人又在永定被围，龙岩洲电报局另有人接管（可能是党人）不能发报，想系右翼军曹万顺、杜起云部已倒戈。田宝奎当时建议，应以联军全局为重。一是本着原定计划直趋潮汕，二是两路合兵转向大浦以解永定之围。

军长张毅坚不采纳其说，并谓周荫人待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决不为他作无谓的消耗。他令部队撤回漳州，保存实力，坐观大局变化，相机应付。右翼以曹万顺为首的军队倒戈后，北伐军随将曹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曹万顺原有部队扩编为一、二两师，曹自兼第一师师长，杜起云任第二师师长。该军倒戈相

向，转抄周荫人的后路。周部处于腹背受敌的环境下惨遭失败。周率残部突围而出，经闽北逾仙霞岭退入浙境。第一军张毅部撤至闽边不久，鉴于周荫人的主力已被消灭，初拟集结部队在漳州郊区，就原筑的三道防线工事，与当面之敌北伐军何应钦部作殊死战，以逸待劳。数日后，张毅接到了联帅孙传芳的电令，来电说：

“该军长少年有为，弃闽入浙乃是上策，虽经长途跋涉，必能成功，勿令臧（致平）杨（化昭）专美于前也。”因此其将所有军需物品，及军械厂的机器，和全军眷属并伤病官兵等一齐上轮船，准备运到上海。可是轮船尚未进吴淞口，就被杨树庄的海军没收了。全军退至泉州，张毅让省联军（周荫人部）之孔昭同旅、周荫轩旅、蒋启凤旅先走，而张毅的第一军则逗留原地10余日不动。经该部旅长李芳池、田宝奎向张询问，张毅这才露出真情说，已经派遣代表许静庵到何应钦处接洽改编的事宜去了。不久，何应钦即允给张毅为兴泉绥靖主任，仍兼军长，后又叫张率队随军北伐。张毅将此事征求部下的意见，各级军官均表示不同意，盖张毅平日待部下严峻而不讲理，不纳忠言，一意孤行，残暴不仁，因此部下对他是离心离德。所以他欲投降北伐军，部下均不同意。张正在踌躇期间，何应钦已带冯轶裴、谭曙卿两个师，由同安县经南安、仙游山路进取福州了。张至此只有一走别无良策。他下令全军沿海大道驰进，经过兴化直抵乌龙江岸，借省联军船只渡江。方渡过一团后，乃令军部及直属部队过江，正在半渡之际，海军向我开炮轰击，同时马尾的海军飞机亦飞来助战，海军陆战队也在北岸与已渡江的部队展开战斗。当时旅长田宝奎带领所部与两个补充团为后卫主张强渡，或将后卫改为前卫，转经瓜山，向永泰之戈岭滩徒涉过河，直抵省城，将福州留守司令李生春之叛军解决后再联合孔昭同、蒋启凤、周荫轩等部一同入浙。张毅对此表示赞成，但不赞成强渡和改变行军序列，仍由他率领军部及直属部队与第一纵队之李芳池旅，转向戈岭滩进发。因经半日的延误，直至次日的中午始到达瓜山，在永泰河北岸即发现北伐

军隔河射击，而张又无勇气冲过去，遂造成瓜山被围的局面。经过一日后，北伐军四面合围，又值秋雨连绵，官兵露宿，虽有轻便帐篷，也挡不住秋风袭击，所携带之三日粮，已经用完，先是杀宰骡马已果腹，继而采摘桔子以充饥，最后是吃树皮树叶，叫寒之声深夜尤甚。此时，海军派代表来说：“咱们都是友军，自家人，请暂时将枪械交出来。我们负责把人枪一齐运送到上海交给孙联帅”；同时，北伐军也派代表前来接洽改编。可是海军方面压迫甚急，是夜即派陆战队杨砥中旅并附唐岱钧团，向我们围攻。这种下井投石，打落水狗的作法，激起了官兵的忿恨，即由李、田两旅中各自抽调精锐一个营前去应战，约不足一小时的功夫，即将其全部击溃，除将唐岱钧当场击毙外，并生俘其官兵1500余人。当时，军长张毅因在是役中为流弹打伤足部，正在忿怒之下，一见俘虏到来，马上喝令全予杀掉。俘虏中有他们的参谋长唐浩清者，是保定速成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与田旅长相识。唐浩清等一齐向田叩头求情。张毅向来杀人，不准任何人求情的，田宝奎这次是积忿之下，与之据理力争，才把他说服，把这一批人释放了。在秋风秋雨时期，天气骤变，官兵尚在身着单衣，可说是饥寒交迫，大家都欲向乌龙江支流之永泰河冲出，与当面之敌决以死战，大家认为与其冻饿而死，不如战斗而死，因之决心甚固。说也凑巧，天气淫雨，河水暴涨，连瓜山几十里内一夜之间，尽成泽国，士气因之愈馁。

张此时已暗中接受了何应钦的改编，互派代表，往返商洽已毕。结果是以团为单位，将全部分拨出去，补充了北伐军各部队；张毅和李芳池，调为参议随军北伐；编余的军官，一律送到黄埔军校第三期受训，但是去否悉听自便。至此，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所部皖督陈调元倒戈，浙军将领周凤岐、张国威等投降党军；赣军岳思寅、唐福山，不听孙之命令，擅自出击灭亡，并破坏了五省联军的团结；而浙江之卢香亭、孟昭月等亦均失败，从此五省联军的威风一落千丈。

我参加孙传芳飞机队的经历

陈栖霞

1925年我在云南昆明唐继尧所办的航空学校毕业以后，校方委我充少尉飞行助教，月支滇币30元。这时候我的大哥陈树勋在浙江第一师陈仪部当少尉炮兵排长（驻杭州梅东高桥），写信说：浙江也有飞机，叫我回到本省工作。我就决心回浙江。当时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则在南京。我知道孙传芳的飞机是卢永祥从法国买来的，和云南航校所用的飞机一模一样，都是法国Bregnet（贝利盖）、Gandron（高德隆）两工厂的出品，这两种飞机，我都能飞，而且当时北方只有南苑航空学校，云南航校的教育长王季子、教官吴汝夔、庄以临等都是南苑二期毕业生，大家都有学派渊源关系，不会受排挤的。（当时北京办有《飞行杂志》，对全国各省有航空设备的如北京、保定、奉天、广东、云南等一般概况和毕业生名册都有登载。）

1926年春节后，我经人介绍跑到南京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去见参谋长刘宗纪。当时的孙传芳初定东南，非但占领富庶的地区，而且控制着上海的江浙财阀，扼长江咽喉之地，声势煊赫，其军队服式，带童子军式的宽沿帽，亦为当时的独特制式。南京的五省联总警卫森严，门庭若市，刘宗纪百忙中出来会我，我看见他不穿制服，而穿长袍背心，戴顶瓜皮小帽，约莫50岁上下，像个士绅打扮。他介绍我和飞机队顾韶甫队长会面，叫我们直接商量，报告给他就是。这样我就和顾队长到了上海。

顾韶甫是河北人，南苑三期毕业生，家住在上海徐家汇，飞机队部则在离徐家汇十多里的西虹桥飞机场。我虽然是得到刘参谋

长的允许，但未奉委令，是不便去队部的。顾队长当时和我说：

“公文送到南京，批下来得有一段时间，你最好且回青田家中去看看父母。我一奉命令，马上就会通知你的。而且你们云南航校的航空处长（也兼校长）刘沛泉先生就在杭州，你何不去看看他。”我归心如箭，只写一封信寄给杭州刘沛泉，便从上海搭轮船回青田家中去看母亲去了。

我在青田乡下住不上几天，接到刘沛泉从杭州打来一个电报，叫我去杭州去见他。

刘沛泉是云南航空处长又是航校的创办人，我们学生对他都十分敬佩。我接到电报后，便从家中动身再到上海。

到上海时，我只到徐家汇顾队长家打个招呼，就到杭州刘沛泉家去见他。那时候他在湖滨学士路租赁了一座花园式的房子，很阔气。他留我住在他家，当作自己家人子弟一般。他对于云南省内情形盘问得很详细，我这才知道他是唐继尧的代表，是唐继尧派他到东南来联络各省如浙江之卢永祥等，提倡联省自治的活动者。

我在杭州刘沛泉家约住一个星期后，即接到上海飞机队来电，说委令已发下，叫我去上海去报到。我遂面刘告辞，刘当时叫我去上海后好好地和他们相处，有机会约请全体孙军飞航员到杭州来游西湖。刘沛泉是想让我在孙传芳的飞机队内部先埋伏下，以便进一步运动全机队。因为1926年的春季正是广东蒋介石二次东征，占领潮汕，彻底解决陈炯明之时，当时广州国民党的势力，正在蓬勃发展，而赞成联省自治的卢永祥现已垮台；唐继尧亦暮气沉沉，一心只想做他的滇南王，有似一座冰山，不可久靠。刘沛泉是政客，他当然是看得清大势的则想寻一条出路，为个人作的计算。

当我回到上海去见顾队长时，他告诉我说，委令已经批下，委我为少校飞航员，月支薪水225元。我心中非常高兴，就搬到西虹桥飞机场队部去住。这时候我才清楚这一队飞机也不过五六

架贝利盖式的破旧飞机，的确和云南所买的一样，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残余旧东西，还有两架高德隆，是旧的教练机。至于人员呢，除顾队长外，有队副张责夫（湖北人），队员耿耀先（河北人），高孔安（湖北人），谢云鹤（湖南人），张书绅（河北人），都是南苑三期毕业的；此外有曹文炳（河北人）、纪佩江（河北人）、张国栋（河北人），是南苑四期和保定一期的；还有周铁鸣（宜兴人）、高山（平湖人）是法国留学归来的。机械人员，也只少数是南方人，其他士兵夫役大都是北方人居多数。我到队时，只有顾队长、张责夫、耿耀先、高礼安、谢云鹤、曹文炳几个人，其他的人都是以后陆续来奔的。并且还有米加禾、张画一两人名字早已公布，人则到将近北伐收编前才到的。他们平时很少飞行，更不练习，只是干拿薪水，过着花天酒地生活。如顾队长的鸦片烟瘾很大，身体衰弱，早已不会飞行，自从当队长后，在南京下关妓院中讨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姨太太，一天倒在徐家汇家中抽大烟、打牌。其余人中只有张副队长和我会飞这种贝利盖飞机，但他们不让我们飞，常说飞机就是饭碗，摔破了飞机，就等于打破了饭碗，而且消耗了汽油，也叫队长减少收入。因为他们所用的汽油，并非实报实销，而是按月包干的，每月一滴不用，也可以领那么多油费，平时都被队长贪污中饱了。当时有同事私下和我说，顾队长每月可有一万多元收入。我想到孙传芳占据东南这块最富庶的地盘，不费分文，接收了卢永祥的遗产，像个暴发户，每月多花两三万元，亦不算什么。军阀的部队中，哪个单位不是一样贪污舞弊？所以我也就和他们天天打牌喝酒。如此过了一两个月，刘沛泉来了几封信要邀请大家去游西湖，顾队长就给总司令部上个报告，以到杭州视察笕桥机场为理由，飞了一架飞机，带了全队的飞航人员到了杭州。这时候刘沛泉已移居西湖三台山许庄（即现在西山公园一带），住在一座广东人的别墅中，说是同乡朋友让他避暑的，雅致大方。他招待大家极其热诚，陪大家游山玩水，吃喝行乐。几天的湖上游览，把大家弄得心悦诚服，大家都觉得刘的为人既风雅又豪爽。

很够朋友。他们哪晓得刘沛泉之所以施展这种手腕，是有意拉拢他们，作为将来收买这一队飞机的张本。

1926年秋，国民党从广东出师北伐，攻下武汉后，又东向江西进攻南昌。孙传芳不得不亲自出马，前往九江，并令飞机队以夹板船运载两架飞机，用小火轮拖到九江，在江北岸小池口江边沙地上修一临时机场。当战事紧张时，也曾出动轰炸南浔路几次，未几，而北伐军已冲至九江。当时江面上停得有招商局“江”字号的巨轮四五只，都系被孙传芳封来作军用的。传说孙的总司令部即设在“江静”轮上。当九江失守之日，我在江北岸看见先有一只轮船起火，烧得烈焰冲天，烟蒙半江，旋即见有另一巨轮启碇下驶。大家都说，总司令已退走了，遂人心大乱。我们的队长下令退却，一直退到了上海。

这时候孙传芳虽失了江西，但在浙江方面解决了夏超，去了心腹大患，而用卢香亭镇守，同时听到国民党在武汉又起内讧，所以雄心未死，他又向法国购买来新的高德隆180匹马力的飞机五架，是派周铁鸣出国买来的。可这批飞机虽新，但孙传芳的参谋处却没有人知道如何使用空军，而顾队长又只晓得做官发财，所以士无斗志，毫无生气。可巧我这时候在上海病了几个月。这时北伐东路军已越福建，将至浙江。刘沛泉盼我早日出院，进行活动。他此时已移家住在上海前霞飞路法国花园附近，并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常开房间，从事联络接洽。我病愈后，他带我到霞飞路去见钮永建，以坚定我的信心。以后我就时常在队中去联络一班飞航员，特别是机械士，和他们去同刘沛泉接洽商量如何保留这一队飞机，不让孙传芳北撤，也不出动作战。刘答应收编成功之后，大家参加北伐，一律仍照原职原薪任用。东路军进到杭州时，刘沛泉向钮永建要了一封介绍信，叫我问道从宁波至杭州去见何应钦、白崇禧，向他们报告运动经过，并请示进行接收事宜。

至杭州后，我即到前敌总指挥部去，何、白二位没有见着，就和参谋处长张定璠、潘宜之接洽。当时张定璠的意思是最好将

全队飞机飞到杭州来，这样既可以壮声势而又取得安全的效果。但我以为全队飞来不易办到，只能做到保全飞机，不使退走，不受破坏，等军队一到即接收改编，并要求通知前敌指挥官，接近上海时，勿向虹桥机场攻击，以免误会损伤。张当即转报何、白，他们很高兴，答应收编之后，一律准照原职原薪任用。

回到上海，我即将情形报告刘沛泉，他也很高兴，遂将飞航员和重要的机械士轮流请到租界里玩，开房间，叫“条子”，喝酒打牌，使这批人乐不思蜀，弄得顾队长变成了孤家寡人。以后北伐军到达上海，不费一枪一弹，整个接收了孙传芳一队飞机和人员。

东路军接收了该飞机队后，当即组成东路军空军司令部，以刘沛泉为司令，委我为参谋长，下编两个飞机队，以张贻夫为第一队长，高礼安为第二队长。刘沛泉在编组人事中，觉得自己嫡系势力太孤了，只有我一人，因此和我商量赶快去电报，向云南调几个技术好的同学到上海来，我就把张汝汉、张有谷、晏玉琮等三个人的名字说给他。他就叫用东路军的名义打电报给云南省府调用张等三人到上海参加北伐，实际是刘沛泉想扩充己系实力，以便控制全部。可是我们这个司令部成立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就从南京派他的航空处长黄秉衡前来要归并改组。我是坚决反对的人，几次跑去见白崇禧，请他保留东路空军。记得白当时和我说过一句真心话，他说：“蒋总司令到了南京就被一班人包围了，连我的话也不大听得进。”当时白对我的印象很好。

东路空军司令部改组后，我和刘沛泉同时去职。黄秉衡恨我入骨，指名永不用我。

后黄秉衡调走，张静愚任航空处长，他们就叫我再到南京航空处任飞航员，这是我参加蒋介石集团的开始。

孙传芳“五省联军”被改编及覆灭

苏桂荣

孙传芳为首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曾割据五省，称雄一时。当1927年8月反攻江南在龙潭失败后，实力损失惨重，嗣即依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自存。1928年退至天津、保定之线时，一群饥兵败将已彷徨歧路无所适从。孙传芳虽在大城、杨村召开两次高级将领会议，企图将部队撤退关外，忍耐待机，然已无法挽回众叛亲离的颓势。这时在天津租界里除了阎锡山的代表以外，还有一些失意的军阀、政客，争以金钱禄位为饵收买残余部队，大作投机活动。联军中之第十三师（原为闽军之一部份）即单独行动。他们通过几个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和原在闽军当过参谋长的霍原璧与晋军挂上了钩。由旅长田宝奎、梁春浦等驱逐了师长陆殿臣，接受了晋军的改编条件。霍曾在保定军校任教官多年，与各期军校学生多相熟，由他与蛰居天津的晋军将领傅作义洽商结果，即以这部分军队换上晋军旗帜符号，首先占领天津由傅当了警备司令。最初编为一个军（第四军），军长霍原璧，第一师师长田宝奎，第二师师长梁春浦。过后缩编为一个旅（两个团），军长缩为旅长，师长缩为团长。嗣经一再压缩，人数愈少，终与晋军同化。

除了上述一小部分分化出去以外，联军尚有七个师五个混成旅。在军阀部队里来说，联军在训练方面是比较好的，虽然作战数年转徙几千里，人员枪械尚有六七成。由师长马葆珩、段承泽等与阎锡山代表南桂馨接洽改编事宜，议定先将部队撤到阎的防区内——平绥铁路沿线的宣化、涿鹿、怀来、新保安、下花园一

带驻扎。嗣即改编为第五军团，以原联军的前敌总指挥郑俊彦为军团总指挥，共编为三个军九个师：第一军军长马葆珩，第二军军长李宝章，第三军军长段承泽。以联军旧将领郭华宗、张汉全、张彬、梁洪恩、李耀先、唐庆珊、苏桂荣、李松山、赵国荫等分任第一至第九师师长。粮秣军费均由口北十县就地筹拨。是时转届冬令，士兵缺衣少食生活十分凄苦，军心惶惶不定。

1928年冬初，联军初步改编就绪。这时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各怀私见，同床异梦。蒋以北方粗定，对阎、冯犹存客气，阎、冯则各图争夺北方地盘扩充势力，勾心斗角各不相下，冯见阎突然增加了联军几万人的实力，显然于己不利，自然眼红。蒋、阎、冯在北平开会之际，冯提出联军是城下之盟，战败才投降的部队，意存反复，应予缴械遣散。阎以冯别有用心，乃谓该部实力尚强，未便轻视，如处理失当必至遗害地方，只宜缓图，不可过急。固之双方争执不下。蒋介石即乘机坐收渔人之利，商定将该部大加缩编后由蒋介石第一集团军指挥，遂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师（下辖三个旅共九个团），并以山东省主席陈调元兼任师长作为过渡。这样既减少冯之顾虑，抑止了阎的势力膨胀，增加了蒋的实力，又以陈调元原为五省联军的皖军总司令（北伐军到达江西、湖北后即首先投蒋）与联军旧将领有些渊源，可以安定该部军心，并将郑俊彦免职，任李宝章为副师长。陈事实不能兼顾，即由李实际负责。于是裁汰老弱，暗中增大编制，每班按20人组成，尚余兵员甚多，即将一大部分士兵拨归杨爱源（杨系阎锡山部下，时为察哈尔军政负责人）补充部队，一部分被遣散。于1929年1月缩编完竣，编为一个甲种师，实有两万人。

1929年4月间，闲住北平的王金钰（原五省联军总部总参议）和上官云相（原联军师长）借蒋介石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之力被派到四十七师掌握领导权。（王与何及孙传芳、杨建章、周荫人等均系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与杨、孙、周等又是结盟兄弟，王居第三，人多以王三爷呼之，王与何成濬私人交谊甚厚。）上官云相

素怀野心，以自己资历浅不足以服众，乃怂恿王同来四十七师借以自重。王任副师长，上官任第一四一旅旅长，刘绍先（原联军总部参谋处长，保定军校九期生）为师参谋长。又免去李宝章、马葆珩、段承泽的职务。是年五月间将该师调到苏北、徐州一带驻防。不久蒋介石到四十七师检阅，他见队伍精壮、枪械齐全，曾说你们这一师是甲种师中的甲种师了。

陈调元深知这一部分军队人数众多，实力充裕，乃向蒋介石请求从中抽出张彬、王乐善、李松山等三个团去济南扩编为第五十七师。四十七师将六个团扩编为九个团仍为甲种师。陈调元不再兼任师长，遂由王金钰继任，以郭华宗、梁洪恩、上官云相分任旅长。王过去在联军中系属客卿，与该部将领多不熟悉，对领导军队素无经验，有关指挥、训练、用人、行政一任上官云相操纵把持，王等于徒拥虚名。上官自始即阴图掌握这一部分实权作资本，以便向蒋介石献媚投机，所以处处对王掣肘，王亦无如之何。

1929年10月，冯玉祥部由孙良诚、刘郁芬、宋哲元等将领在豫西通电反蒋。四十七师奉蒋命令集结许昌待命。嗣经鲁山、嵩山向洛阳冯军进攻。四十七师以首先攻克洛阳深得蒋之嘉奖。该部继续西进到达陕州时，适唐生智部又在豫南发动反蒋，当时情势异常混乱，遂停止前进。在这一线上指挥作战的第九军军长杨杰，以四十七师王金钰、五十四师郝梦龄以及原直鲁联军的徐源泉等部均系杂牌部队，又逢唐生智反蒋战起，形势苍黄，深恐所部乘乱生变，乃逃往黄河以北。各杂牌部队一时陷于群龙无首状态，各自为谋。王金钰遂率部回郑州。这里居平汉、陇海两路之要冲，在此伺机观变，自属举足轻重。

唐生智反蒋失败之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复跃跃欲试。阎锡山亲到郑州拉拢杂牌部队，阴图引为己助。王金钰等以阎阴险鄙吝不足恃为缓急，仍倾向于蒋。蒋亦于此时大施其收买手段：先任命王金钰为第九军军长，复给王20万元犒赏，以安其

心，继又任命王为安徽省主席。王恐失去实力辞职不就，于1930年初该部被调到郾城（漯河）、西平一带，对阎、冯等军取监视态势。

上官云相以王金钰适逢其会遽尔擢居高位，心怀嫉妒，阴图篡夺实权以遂个人野心。预先从外部招致其保定军校六期同学吕济、谭子钧、杜默庵、李锡庆等分别任为参谋长、副官长、团长等职，倚为心腹；一方面利用其娼妓出身的小老婆易××交欢权要分子内眷，向蒋介石左右曲意奉承，百般献媚，上官本人更施展其吹拍手段对蒋承颜顺旨表示忠诚。因之大得蒋之青睐，日渐骄恣跋扈。王金钰感到上官难于驾驭，乃将四十七师师长一职让给他以缓和两人之间的矛盾。上官既任师长益加独断专行，肆无忌惮，更在蒋面前与王争宠，表示死心踏地为蒋作鹰犬。蒋亦对之表示倚重，更助长了他的骄纵。

1930年5月，蒋、阎、冯混战爆发。蒋令王金钰部参加第一线作战，王感到上官难于指挥；又独吞了蒋给的20万元，私囊渐饱；复以两军交锋，胜败不知谁属，即托病离开部队休养去了。蒋即以上官云相代理第九军军长，旋即开赴陇海前线作战。上官即乘蒋在陇海路商丘附近朱集车站铁甲车上指挥作战之际与蒋多所接触。蒋亦乘美国特制的军用汽车到四十七师战线上去视察，因此勾搭益紧。上官在这次战役中以士兵们的惨重牺牲，获得了个人的信誉。是年8月其以首先攻克郑州向蒋报捷，又以接洽冯玉祥部梁冠英军倒戈成功，大为蒋介石所赞赏，曾得到犒赏数十万元，上官本人即明得十万元，旅长、团长各得一万、五千不等。上官从此更加上谄下骄，排除异己，视部队为其个人私产。以原联军将领郭华宗不附合他个人，便借故将郭旅长职务撤销。郭亦不甘示弱，乘旅团长中多数对上官不满之际，纠合他们用实际行动驱逐上官云相。在一个深夜里秘密将四十七师部队撤到郑州郊外，并在沿途张贴标语，宣布上官云相倒行逆施，任用私人……等等罪状。这对上官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当时驻在郑州代蒋指挥部

队的何应钦，深恐战争方停，人心未定，致酿巨变，劝上官离开部队以避其锋。上官虽然多方设法疏通，愿将撤郭命令收回，表示道歉。旅团长等多以其阴狠、不守信义，表示非常坚决。他看到无所转圜，才快快去汉口。郭华宗及各旅团长遂联名电请王金钰回来复职。王以上官既去，战局已定，遂到郑州重任军长。蒋介石为了安抚这部分力量继续为之利用，遂亦听之。

王金钰权变奸诈，外示淡泊，内实贪鄙，只是利用军队作为升官发财的工具，并无远见。二次复职后即利用郭华宗联络旧日军官，利用参谋长刘绍先联络该部中保定军校九期生刘广济、孔令恂等自成派系，以与上官系的九期生对抗。一时虽显得平安无事，实际内部矛盾仍在日益发展。

在王金钰复职以前，中央苏区红军发展颇为迅速，在湘赣等省声势日益浩大。这时蒋介石正陷在中原地区与阎、冯军鏖战，只急得象热锅上蚂蚁一般。比及阎、冯战败，蒋才抽调部队南去与红军作战。王金钰明知也要调到江西战场上去，乃以战胜有功，乘机向蒋要求扩编军队。蒋亦认为该部尚有战斗力，遂允由四十七师中再扩编一个四十三师。该部即开往新乡、焦作等地着手扩编。改编后，王金钰兼四十七师师长，唐庆珊为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朱锡璜为第二旅旅长；郭华宗任四十三师师长，苏桂荣为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刘芝洲为第二旅旅长，每旅下辖三个团。

1931年1月，蒋任命王金钰为第五路总指挥，将郝梦龄之第五十四师拨归其指挥，旋即调到江西驻扎萍乡、宜春（袁州）一带。3月间又调到吉安，不久又将四十三师调吉水，五十四师调永丰。4月间何应钦命令王金钰准备向东固地区红军进攻。遂以四十三师郭华宗部居中间，五十四师郝梦龄部为左翼，四十七师为右翼。左边友邻部队为刘和鼎师，右边为公秉藩师。到达富田附近水南、白沙地区时，迤南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觉悟很高，组织严密。白军少数部队根本无法活动，派遣侦探均如泥牛入海

有去无归。虽派遣一连以上兵力实行威力搜索，红军的情况还是一点摸不着，地理也不清楚。只弄得指挥官终日提心吊胆，不敢轻于举步，每天都得和友邻部队联络妥贴齐头并进，才敢推进三五里路。一直到5月中旬，才探头缩脚地到达东固岭（在东固以北）之线，不料还没站稳脚，即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各军均一触即溃。第一天右翼公秉藩师首先被粉碎；第二天夜间，四十七师复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师部亦被包围，副师长唐庆珊只身逃跑，残部即向吉水溃窜。这时四十三师也从东固方面溃退下来蜂拥到白沙附近。四十七师以退吉水后路被红军切断，又折返白沙。于是风声鹤唳，望影逃窜，乱成一团。郭师遂下令退永丰。这时红军已到白沙，对白军形成南北夹击。由于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溃兵漫山遍野落荒而走。四十三师本来所受损失不太严重，因与四十七师搅在一起被冲得到处乱窜，也损失了三个团。到达永丰之后，五十四师也狼狈地退到那里，收容溃兵，四十七师残部也随着来了，到处喊着番号收集散兵，毫无秩序。几天以后始稍有一点头绪，初步检查四十三、四十七两师的兵力以及辎重弹药行李行军锅灶等等均损失过半，士气沮丧，已毫无战斗能力。何应钦命令四十三、四十七两师退吉水，五十四师在永丰从事整顿补充。在一个月以后一部分被释放回来的俘虏兵才绕道回到本部。他们都说红军优待俘虏，不搜腰包，不受侮辱，负伤的给医治……虽然军官们制止他们作这样宣传，还是很快地传遍了全军。红军优待俘虏政策已深入人心了。

王金钰部在第二次围攻红军中，就这样开始被打垮了。以后蒋介石曾亲到南昌重新部署也没有扭转这次失败的定局。王部失败是蒋军二次围攻中一个关键性的惨败。

王金钰二次复职后，曾找来他的留日士官学校同学冯象鼎。冯系河北盐山人，与王及何成濬关系很密切。起初王派他在武汉办事处负责与蒋介石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联络。王部到江西后，复任冯为第九军副军长。当该部向东固前进之际，王委冯代理

军长职务，他借开会之名到南京去了。比及王部全军溃败，王即一去不返，最后逃离了部队作寓公去了。此时风传冯将代主任军长。四十七师第二旅旅长朱锡璜是一个热衷名利之徒，即派人张贴“打倒冯家鼎”的标语，冯遂星夜逃走。四十七师驻吉水时，上官云相的心腹谭子钧、杜默庵（均任团长）乘部队失败混乱之际，驱逐了副师长兼旅长唐庆珊，报复唐在郑州参加驱逐上官之仇。唐虽到南昌见何应钦去诉苦，结果将唐调为军事参议院参议了事。谭子钧、杜默庵等见时机已至，密派营长耿瑞生去见上官云相（时上官在蒋嫡系部队里当师长），要他乘机回到原部队来，上官固未尝一日忘情于第九军，即去南昌见蒋活动。四十三师第二旅旅长刘芝洲因在郑州积极参加驱逐上官活动，恐怕上官得势施行报复，就吓得弃职潜逃了。

郭华宗是前次驱逐上官的主角，对于上官回任有很大顾虑，又以东固战败后怕蒋追究责任，自己不便去见蒋，遂派副师长苏桂荣到南昌见蒋，述说对上官回任的意见。蒋允将四十三师由南昌行营直接指挥，与上官不相隶属。此后四十三师便与四十七师分割了原建制。是年10月，陈诚的部队到了吉安，蒋又令四十三师归陈诚指挥。

上官云相复任第九军军长后，四十七师及郝梦龄之五十四师归他指挥。他以整顿部队为名，将四十七师仅存的一个旧将领朱锡璜编余了。蒋又将郭华宗对调到嫡系部队中去当师长，郭明知这是一个阴谋，未到职即离去。副师长兼旅长苏桂荣调军政部另候任用，苏亦未报到即他去。至此原五省联军的高级军官被撤换一光。原来士兵已伤亡逃散殆尽。或谓：在联军初改编之际尚属名虽全亡、实存一半，到这时已是烟消火灭名实俱亡了。

台儿庄战役亲历记

王仲廉

台儿庄战役，为整个鲁南战场敌我形势优劣转变之枢纽，台儿庄胜利之花，亦即是鲁南战役之果。此胜利之果，不仅击溃日寇主力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亦鼓舞了全国民心士气，也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此次胜利，得之并非偶然，乃是我参加此次会战的全体将士冒险犯难、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余今日回忆当时情景，犹感热血沸腾，怒发冲冠。

余所统率之第八十五军，辖有第四、第八十九两个师，隶属汤恩伯将军之第二十军团。当时该军团为大本营之战略机动兵团，以担任情势紧急方面之作战为主。此次鲁南战役，我军团由台枣以东地区，攻击敌之侧背，任务颇为重大，因之，达成亦极为不易。以顽强凌厉之日寇第十师团为对手，其战斗之惨烈，牺牲之重大，可想而知。

八十五军于民国27年3月上旬，虽尚留在河南之归德与安徽之亳县，从事于整训补充；实际上，已担任津浦南北两段我抗日大军之总预备队任务，无时不在枕戈待旦准备出动中。

当时，我友军孙连仲将军所部正向台儿庄输送中。在津浦路临枣支线以北之敌后者，有孙桐萱、曹福林二将军所部。在津浦路正面，有第二十二集团军，其中王铭章一个师，曾在滕县作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抵抗。在临沂地区对抗敌板垣第五师团之包围行动的，有张自忠、庞炳勋两将军所部。

3月14日午，余奉汤军团长转颁下因滕县告急，令本军（八十五军）驰援，限于3月16日向滕县以南之临城地区集中完毕。

此时敌人在津浦路南北同时对我大举进攻，以重兵迅速从南北夹击，会师徐州，企图一举歼灭我鲁南徐州附近地区之部队，同时打通南北交通之干线。当时我在津浦路北段，本可凭黄河天堑，以阻遏来犯之敌，不意在黄河南岸的韩复榘部队，竟不战而放弃济南、泰安，几陷津浦战局于不堪收拾的局面。幸经我友军第二十二集团军之奋战，阻遏强敌于两下店。敌南犯之势，稍现迟滞。

当津浦南北正面吃紧之际，敌复以一部进出临沂，企图间道绕袭徐州东北，以合围我津浦陇海两路交点之徐州，而瓦解我津浦路作战的神经中枢。我庞炳勋、张自忠两将军予以重创，于是敌向徐州进犯的阴谋，再度遭受顿挫。

敌既于津浦北正面的两下店受阻，复被创于东外翼的临沂，不得已而转其锋锐，进攻济宁，一则声东击西，一则企图西犯归德，再行由西向东，以抄袭徐州。敌寇虽狡计百出，四窜犯扰，但又为我孙桐萱、曹福林两将军之部队所击溃。于是敌感于我抵抗坚强，遂陆续增加兵力，又急犯雨下店，同时沿津浦铁路两侧南进，仍企图达成其进犯徐州之目的。战局如此演变至3月初旬，在津浦路北正面之敌，进逼益猛，邹县遂陷，滕县告急。

韩复榘一再擅自撤退，放弃要地大汶口。于是，敌人迅速深入，于民国27年2、3月间窜过曲阜与邹县。我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代总司令所辖王铭章将军的全师，在滕县不惜牺牲，作壮烈抵抗。敌人受顿挫后，改变战略，加强北线兵力，实行由北而南的两翼包围。除了在津浦正面以第十师团为基干主力外，又以强有力的坂垣第五师团，从青岛登陆，取道诸城、沂水，直趋临沂，以拊我右侧背，企图包围歼灭我鲁南及徐州以东地区之部队。然后以箝形攻势打通津浦县，再行内侵。

3月15日上午8时，汤军团长电令本军着即由归德（商丘）乘车开往临城集中，相机策应第二十二集团军作战。

11时，汤军团长奉到第五战区李长官9时电报，令八十五军第四师，以先头之一部，开往滕县附近。

本军遵令，先令第四师于当晚乘火车向临城输送，余率第八十九师，次第乘车跟进。

又奉汤军团长由亳州打来电话，获悉军团长即将乘汽车经萧永公路前往徐州，并嘱余由归德乘火车赶赴徐州会晤。晚间余抵徐州，谒汤公于中国银行楼上。时汤军团长抵徐不久，尚未用晚饭。当时所得情况如下：

1. 津浦北正面敌万余人，其主力围攻滕县，其一部已迂回至滕县东南之南沙河附近，与我第4师先头接触中。

2. 我守滕县之友军二十二集团军，虽尚有残部四五营困守滕县，牵制敌寇的若干兵力，但滕县城以外的各阵地，都已被敌突破，其被敌各个击破之部队，我方未及收容。

3. 沿铁路正面南下之敌三四千人，其先头已到达滕县以南之南沙河，向临城急进，与我第四师在党山西王庄发生战斗。另有敌主力五六千人，仍在滕县以东桑村附近，有窥枣庄，以袭击我侧背之企图。

根据以上情况判断，我军所期望在滕、邹间与敌决战的计划，必须变更，因为我第八十九师尚未集中完毕。余当时决心：令第八十九师先头部队之二六七旅舒荣旅长所部，占领官桥，扼守铁路正面，掩护主力，迅速集中，以求在临城附近与敌决战。

当晚与军团长汤公共进晚餐，席间军团长谓余曰：“本日道经贵萧县之王寨，离府（王庄）上只有数里，向村民询问府上状况，据云只有茅屋数间，薄田数十亩。你为何未置一点家产呢？”余笑无以对。汤公继曰：“足以证明你真正是为革命而不顾家的人。”晚饭后，余即赶赴车站，北上临城，指挥作战。

3月16日我八十九师舒荣所部之二六七旅，与敌苦战于铁道正面之官庄与南沙河之间。另一路敌五六千人，与我第四师陈大庆将军所部，恶战于虎山、龙山、党山、三山、落凤山一带，形

成争夺拉锯的错杂局面。该师之左方，亦有敌军，为第四师第十旅倪祖耀部以全力击退。

3月17日上午，军部及直属部队到达临城卸车，将至宿营地临城东北之河北村附近之际，敌步骑兵5000余人，炮约30门，战车数十辆，重点指向官桥，蜂拥进犯。我二六七旅五三三团第三营营长侯克，身先士卒，浴血死守官桥，壮烈殉国。激战迄晚，官桥失陷。正激战时，我八十九师之二六五旅，正由铁道逐次输送至临城下车。该旅五三零团尚未集结，仓卒抵抗。在激战中该团第二营营长严以重，冲锋阵亡。苦战至下午6时后，该旅之五二九团陆续赶到，抢救前线，我军始得控制临城。

当时，余正往前方侦察地形，据报敌主力再度进犯我官桥守军，余随即在临城东北之匡山头上设指挥所，一面指挥八十九师作战。一面与第四师联络，同时电报军团长汤公。

3月18日，本军八十九师张雪中将军全部到达战场，士气益振。军团长为适应战况，于17日晚，将第四师移向峰县附近，集结备战。余率八十九师，奋力阻遏敌人前进，以待友军之充分准备。本日在山田、固堆、互临城之线，仍全日对敌苦战。敌虽迭次猛攻，但均被击退，我阵地屹然不动。惟当时敌之飞机及炮火轰击，过于猛烈，在此往还冲杀之下，我五三〇团第一营营长宋志文，于午后五时，又于临城东北约五公里东西柏曲之拉锯战中负伤，日渐入暮，敌亦遭受重大伤亡，遂再成对峙之局。

汤公派第四师副师长王毓文将军于18日中午，来本军匡上头指挥所，传达甲乙两案命令，嘱选一实施。余与八十九师师长张雪中将军，及军部参谋处长吕公良将军，决定遵照甲案实施。余并将甲案之命令转电第四师，命本军张参谋长公达，陪同王副师长返军团部及第四师师部复命。

是晚余率第八十九师向目的地转进集中。次（19日）晨，到达佛山、石狮子山、和尚寺附近，突闻峰县方向炮声激烈，即令电台与第四师联络，并问及该师情况。据报，峰县城郊附近与敌战

斗正酣，该师遵令占领艾山、九山、马山、上山等地区，并向军部及八十九师的位置。余疑第四师与敌胶着，不能脱离战场，闻此情形，极为诧异，即令电务员将发出第四师电稿拿来一看，始知所发第四师电令是乙案，并不是余所批发之甲案电令，而甲案电令尚在张参谋长衣袋中。张知道闯了大祸，立即拿出手枪自戕。余迅即予以制止，并谓：自杀于事无补。在此情况下，只有将错就错，决心改为实施乙案。立传令军部及八十九师，即刻出发，向峰县东之傅山前进，与第四师会合，以挽救当时一重大之危机。是日天气晴朗，敌机4架轮番侦察，幸我八十九师行军队形疏散，伪装得宜，未为敌机发觉。午后4时许，到达目的地，余即往马山第四师之指挥所，与第四师师长陈大庆将军会晤，研讨今后行动，始悉守峰县之第十二旅第二十三团团团长陈纯一将军，已在峰县殉职。县城虽陷敌手，我第四师仍在城郊激战中。

3月21日，枣台支路方面，峰县城外之土山、双山、马山、九山等重要据点，仍在我军之手；又有傅山、石城岗、青山，可资为纵深根据。

本军奉汤公命，迅速与敌脱离，秘密进出于峰县、枣庄东北约20公里之神山、响水泉一带，准备反攻枣峰之任务。遂于23日晚，移至台儿庄以北，及傅山口一带山地，以一部对临城、滕县方面警戒，主力于24日拂晓前，攻击枣庄附近之敌，并确实占领之。俟友军（第五十二军）关麟征将军所部攻略峰县后，再以有力之一部，挺进于龙山、虎山、牵制滕县之敌，掩护我五十二军进出凤凰山、黑山、青山头之线，使其便于攻击临城。是时，本军（第八十五军）主力向谷山、东集、马头地区集结，为我军团（二十军团）预备队。

本军第四师陈大庆将军所部，于本（24）日16时，已进入科拉岗、云谷山一连，准备攻略枣庄。第八十九师张雪中将军所部，到达青鳧山、井庄一带，占领阵地，掩护第四师之攻击。

3月25日，敌寇企图由枣峰急犯台儿庄，我方则控制枣峰东

北山地，反攻枣峰。当时，本军第四师陈大庆将军所部，对枣庄攻击甚猛，该师第十旅倪祖耀将军所部，尤为勇敢，以卓山、马山、黄山为根据，从东西北三面，包围枣庄。自24日午后，经6小时夜战，战至25日上午8时，该旅十九团终于攻克中兴煤矿公司之水塔，并协同该旅第二十团，攻克东西北三面之三座碉楼。残存于敌手者，仅南面一个碉楼而已。

3月26日，我友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已到达台儿庄附近。今日之战斗，均为小接触。

3月27日，敌以战车20余辆，步兵三四千人，在其飞机掩护下，猛烈反攻枣庄，与我第四师混战。

本军奉命分攻枣庄，并钻袭临城，以减轻台儿庄友军之负担，并藉以测知敌主力所在。如果敌已集攻台儿庄，则以全力南下，直捣敌后，与孙集团紧密协同，消灭进犯台儿庄之敌。

我汤军团长，于27日21时令五十二军即晚以主力由傅山、青山一带南下。本军奉命以侧背攻击的方式，一方面拊枣峰一带的敌背，另一方面担任掩护五十二军的攻击行动。是晚，本军在黑夜中冒雨向指定方向进发。

3月28日至29日，本军占领平山、傅山、石城岗、女峰山一带高地，一面对临沂方面搜索警戒，一面向峰县佯攻，以掩护我五十二军之两侧背。

3月30日，本军（八十五）一个师（第四师）展开于水湖、王庄、甘露寺一带，与五十二军同时向台儿庄之敌后总攻，3月31日午后2时，本军第八十九师大部，已越过了峰县东北的马山、九山，正向双山进展，迫近峰县东部。

又本军位置于女峰山、平山、傅山、石城岗一带主力，自本晨，应十三军独立骑兵团的通报请求，派八十九师张雪中将军的部队出击，迄午后二时许，击溃了窜到向城东郊之敌寇700人。旋又直扑向城以东之玉楼、梧桐村一带，将各该队近千敌人击退。惟节节进展至邵家庄以后，即遭遇该地两千余顽敌强烈抵

抗，汤军团长调本军第四师前往支援。

4月1日，本军第四师，先占领爱曲，秋湖，拒止向台儿庄分进之敌，并掩护我第五十二军自由安全地向右旋回，余率第八十九师乘夜穿越作字沟、邵家庄间敌人的侧背，向南乔、凤落之间集结，当时汤公要求各部于4月1日7时以前，分别展开对凤落、作字沟攻击态势，急速向北攻击，与第四师协同击破作字沟、凤落、邵家庄一带之敌后，再旋转面对西南攻击，以与在台儿庄友军孙集团，夹击当面之敌而歼灭之，以争取台儿庄会战的最后胜利。此一攻势发动之后，我军以破竹之势，击溃凤落、作字沟、及接近爱曲、秋湖一带的敌人，并于四日将其残部与矾谷师团一起席卷于我方的新包围圈内。敌已陷于由主动转为被动，处于不利。

4月3日，我军团各部，完成爱曲与兰陵间的扫荡战，也肃清了向城与秋湖之间的残敌。

4月4日，总攻开始，本军遇顽敌，血战于大顾珊。自即日起，我军团长急调前一日赶到战场之七十五军周暮将军所部第十三师，至南乔鲁坊，向北警戒，并搜索敌坂垣第五师团续由临沂到来之后续部队，而将军团部的五十二军、第八十五军、第七十五军，以由右至左之顺序，全力向台枣支路，开始总攻。

本军附炮七团张广原所部，在大良壁、小良壁之线，向朱滩、大顾珊地区守该地敌人进攻。张雪中将军在大顾珊亲自督战。五二九团团长罗芳珪上校及中校团附李右于均不幸阵亡。大顾珊终被我军克复。

4月5日，敌复倾全力，由鸾墩、郁庄、潭庄三方面反扑，战斗之烈，前所未有。我五二九团第三营营长叶支荣重伤，该营士兵伤亡及2/3，张雪中将军急派五三〇团增援抢救，我争回上风，并在大顾珊以南，向潭庄实行中央突破。友军第七十五军第六师，在大良壁、马甸地区所发动攻势，受敌炮封锁，与敌对峙于耿庄与东范墩间。在大顾珊的争夺战中，炮兵第七团团张广原，功不在小。黄家楼三河口间有敌炮兵部队500余人，炮12门，

进击贺庄，以包围我八十九师之侧背，炮七团之第四连与第八连即在陈家瓦房、耿庄间阵地对该敌作歼灭性的射击。这不仅有助于台儿庄会战的胜利，且造成世界战史上劣势炮兵消灭优势炮兵之空前奇迹。

当时有过于谨慎之人员向余建议：军部略向后移，使第一线得到纵深配备。余坚决反对，理由是：在此敌我胜利未分之一刻，惟有继续猛攻，不能容许任何单位后移，以影响军心士气。

4月6日，台儿庄歼灭战之全面胜利揭晓！

本军之八十九师五三〇团，一面扫荡大顾珊间残余之敌，一面向郁庄当面之敌猛攻。该团第二营营长童亚及第三营营长黄鼎，均壮烈牺牲于此次争夺战中。张雪中将军对该团增援，终将敌人击溃。

时我友军（关、周两军）亦均与本军并肩作战，向当面之敌攻击，获有进展。午后，敌、我战斗正酣之际，余为鼓励士气，并切实明瞭战地实况，便于尔后处置，遂亲往第一线督战。午后3时许，抵达八十九师第二六七旅潭庄旅指挥所，与旅长舒荣将军登碉楼，用望远镜向台儿庄北之张楼、潘坠、刘家湖方面搜索，发觉敌人三三五五，断续向南洛北洛疏散移动。当时与舒旅长研判，敌在我不断猛攻痛击之下，似有退却模样，当立即用电话通知炮七团团长张广原上校，将所部四、八两连炮兵，向后移之敌猛烈轰击。余并亲自在碉楼观察，我炮弹着点，击中敌之疏散部队。敌遂散开隐蔽，既而又退。我五三四团在我炮火掩护之下分向敌攻击。敌后卫强烈抵抗，其余在我炮火压制之下向北溃退。此时余判明敌人退却无疑，即用电话报告军团长汤公，凶残无比之顽敌，已开始总崩溃。余除令炮七团集中炮火猛轰外，并令八十九师二六七旅舒荣将军所部，向掩护退却之顽敌，乘机猛攻。

总计我方战果，共歼敌3万余人。我方各部队以无数头颅与鲜血换来台儿庄会战胜利之花，呈献于全国军民之前，并纠正国际上谓中国军队不能与日本军队争胜之错误舆论。其时余看手

上之表，为下午4点正。所以我时常对友人讲：“台儿庄胜利之花，开在4月6日午后4点。”我八十五军何幸得与各友军，在我民族史上留下为维护国家生存而抗战的光荣一页！

追击为在作战过程中之最重要阶段。惟追击始能歼灭敌人、收获战胜之成果。余发觉敌人开始崩溃之时，立即令本军第一线第八十九师跟踪追击，使敌无喘息余地，予以歼灭。嗣因该师伤亡惨重，奉上峰命改由第四师作有计划的跟踪敌主力，作强烈的追击战。

4月7日下午2时，汤公令本军迅即向岔路扫荡挺进，到达后，即向北旋转，沿枣台支路（不含以东地区），向马山、双山、潭山追击前进，以抵石桥—林园—出头林—高庄—土山之线，上属为本军与五十二军分别作战之界线，线上属本军。

汤公又对本军以电话指示，第八十九师伤亡过大，改由第四师（军预备队）追击。

余遵照命令以第四师陈大庆将军率所部为追击部队，由现地即时出发，向岔路口扫荡后，即向北旋转，沿枣台支路（不含以东地区）经马山、双山、潭山追击前进，并与右翼关军切实取联系。余率第八十九师在指定第四师行军路线后跟进。

4月7日、8日、9日，本军与第五十二军并肩前进，进克红瓦屯、米店一带，正向官庄、苏水埠之敌攻击中。我右翼关军亦进占泗流井，并克马山、土山，向九山攻击前进。惟以正面孙集团方面之先头部队，尚在泥沟。而獐山、乱沟、天柱山亦尚在敌手。该处敌之炮火，对我左侧背猛烈射击，进展颇感困难。兼以双山、潭山之敌，用火交叉反击，妨害本军攻击甚大。

余即与两翼友军，设法围攻该敌，旋获我炮兵协助，于4月10日午刻，将官庄、苏家埠完全攻下。但獐山、天柱山之敌，依然居高临下，阻住孙集团正面进攻。

汤军团长令增加九十二军于五十二军右翼以迅使包围敌之左翼。

12日午时，克复北大寨，税廓在望。黄昏时，桃园陷敌。

13日至14日：我友军（五十二军与九十二军）续攻当面之敌。敌我在税廓、王家屯间均有增援，双方皆发挥高度火力，激战竟日，未获进展。

15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令二十军团撤去税廓之围。于是，追击作战结束。

此次鲁南之战，为抗战初期战绩辉煌而极关重要之一役，不但符合长期抗战、消耗敌人、迟滞敌人之旨趣，抑且发挥鼓舞民心士气，坚定必胜信念之影响。举世瞩目，海内欢腾。

抗战时期西南区的军邮

张人权

前 言

我是学习军事交通的，1935年秋，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交通研究所第一期邮政系毕业前，先后在南京、上海两地邮政管理局实习一段时间。同年秋，又集体参加了参谋本部主持的京、杭国道线上军事秋操演习，随军作了军邮的正式演习。1936年夏，“两广事件”的军事动员，才正式试办了军邮，虽为期不长，但经过这两次军邮的试办，已取得了一些实际经验，为抗战期间军邮的正式创办，奠定了基础。

1937年秋，“七·七”事变起，抗日战争爆发，全国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号召下，全民奋起，结成了钢铁长城，一致对外。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抗日战争，由是兴起。为了适应战时的军事需要，各种军事后勤工作，如邮、电机构的配设，均急不容缓。因此，军邮乃随着军事的动员，相继于各战区次第建立。

1938年秋，时我在长沙湖南邮政管理局工作，奉总局令，调办军邮。初在广东韶关行营第七军邮总视察段，为时未久，1939年春，广西第八军邮总视察段，成立于玉林，人手不敷，急待补充，于是又奉令改调广西第八军邮总视察段。时第四战区总部，设在柳州，军邮总段驻地应随战区总部驻地为转移，继乃由玉林迁移柳州。1944年秋，桂林、柳州失陷前，又由柳州迁移贵阳。我在军邮八总段，工作时间较长，直至抗战胜利。先后历任过军

邮局长，军邮视察，对抗战时期西南区军邮的概况，略知一、二。

西南区军邮机构的建立

1938年秋至1939年春，武汉失守后，战事相继失利，战区不断向后方延展。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成立于广西柳州后，配设于该战区第八军邮总视察段，随之而成立。初驻玉林，继迁柳州。

在此应加以说明：广西虽不属西南区，但在桂林、柳州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相继失守后，总段由柳州迁驻贵阳。时黔南、黔东一带成为战区，总段于黔境又成立了三个分段，一个分段驻安顺，一个分段驻独山，一个分段驻镇远。

贵阳为当时西南区交通运输的中心。南通广西柳州，西通云南昆明，接滇、缅公路而直达缅甸仰光；北通重庆，接成渝线，直通成都；东通湖南晃县、芷江，而达常德、长沙。一时邮运，亦以贵阳为中心，任务相当繁重。为适应并加强各路邮政班车的管理，提高邮运效率，于是总局乃于贵阳成立了车务总视察段，总视察王成樑。

1941年夏，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寇南进，战事扩大到中南半岛，印、缅及我国云南接近缅甸、越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战区。战区统帅，时为我国军事统帅蒋介石，副统帅为美国史迪威将军。为适应军事上的需要，总局于云南昆明成立了第十三军邮总视察段，总视察郑廷杰。我国派赴缅甸、印度的远征军，全部配设了军邮局，并于云南境内，成立了几个视察分段，因该总段初成立，大部人手，悉由外段调拨。当时八总段调拨了曹忠礼、王司孔、胡毅等数人，均军交二期。曹任文山分段视察，王司孔任远征军军邮局长，随军出国，这是我国军邮随军出国的开端。

西南区军邮的人事

西南区军邮机构的成立，迟早不一。广西四战区八总段成立于1939年春，初在玉林，继迁柳州。总视察初为林维钦，福建人，甲等邮务员，普邮调训。抗战胜利复员后，调台北，任台湾邮电管理局局长。继为张锡扬，浙江人，甲等邮务员，普邮调训。1944年秋，桂林、柳州失守后，总段迁贵阳，张因案另调，改由贵州邮政管理局局长葛飞兼任。

全段军邮人员，约百余人。一期的有张振乐、蒋定三、顾觉民、陆谷樵、严树洋、石道琪、李惠、张人权等，二期有潘明纪、宋定远、何可人、胡毅、王司孔、窦增仁、贺开甲等，均先后在过八总段，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其余邮递员、勤杂员、邮路班差，均不在此数。以军交一、二两期为骨干。

昆明军邮第十三总段，全段约80余人，领导层多半都是受过军训的，以军交二期为骨干。总视察郑廷杰，办公室主任何东升，文山分段视察曹忠礼，随远征军出国的有王司孔、叶茂等，其余随军进入滇境未受训的军邮人员，则有张宝诚等。且多年富力强，精神饱满，凡配设于远征军部队里的军邮局长，都能操点英语，便于和外国人联络。其待遇较国内为优。

贵阳军邮车务视察总段，成立于八总段之后，总视察王成樑，甲等邮务员，普邮调训的。全段军邮人员，约40余人，专任视察职务的，都是受过军训的。军交一期有向宝德、杨致千、李维扬等，二期的有叶茂、陈国光等，普邮调受训的，有牟光厚、车仲良、马家麟等。

上面只是谈及西南区军邮的人事，至当时全国军邮总枢驻重庆的军邮督察处，其人事虽不属于西南区，但驻在西南区的重庆，这里不妨顺便提一下。

军邮督察处，初成立于1936年夏，“两广事件”试办军邮时。

当时处长是龙达夫（原军交邮政系主任教官），抗战初，军邮督察处，仍照旧，唯内部人事有变动，有增加。初时处长，还是龙达夫，1941年，龙病住昆明，未久，即逝世。龙死后，由总局视察室副视察长葛飞代理。继后，军邮督察处撤销，只于后勤部设一办公室，成立一个军邮科，范围缩小，只办例行公事，实权完全掌握在视察室。科长，初时葛飞，仍握有实权，后来葛不兼科长；但军邮的实权，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时科长，另调原在总局视察室工作的，军交一期陆胜揆专任。国防部成立，配设于国防部副官局。

抗战期间，各战区军邮总视察段的筹设，总视察的委任，各总段分段视察及专职视察的委任，军邮人员的调迁，悉操诸视察室视察长余翔麟及葛飞两人手里，局长不得过问。等于傀儡。

西南区军邮的分区任务

第八军邮总视察段的分区任务：由于其辖区面积广，首先是分段的划分和筹设；其次，是军邮分段视察和专职视察的选择和培养；战区内军、普邮局、所的加强管理，按期的巡查；邮路的调整和秘密邮路的开辟；区内各线邮运车务的管理；水运路线邮运的管理。这后一条任务，是当时八总段的主要任务。因为要抢运由海外、上海、香港、海防等地早期先后进口，积压在各条水路线上，如西江的梧州，浔江的桂平，再上来象县的石龙，直至柳州。柳州西向，接融县的长安镇，直至贵州东南的榕江。南宁通龙州的左江线上，准备接运由越南海防进口的大批邮包，和西南区邮运使用的大批汽油，该批汽油是总局由广州湾向英商订购，及总局由香港向英国订购的道琪牌邮用汽车一百部。任务是繁重的，除海防准备进口的大宗邮包，由于进口的口岸、和绕道南宁、柳州的时间，及长途的运费问题，拖延停顿。继后建议总局改由云南河口进口。其余各线水运，都胜利完成了任务。

昆明第十三军邮总视察段的分区任务：一是远征军军邮人员的选择和培养；二是远征军军邮局、所的配设；三是视察分段的划分和筹设；四是国内、外军邮视察的调配；五是出国军邮与驻地军、普邮的联系；六是加强辖区内军、普邮的管理和巡查；七是调整旧邮路，开辟新邮路；八是提高远征军军邮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以适应对外联系和远征军军事上的需要。

贵阳军邮车务总视察段的分区任务：一是调配、培养和选择适于管理车务的人员；二是路线的划分和视察的安排；三是驾驶员的短期集训；四是加强车务管理，扭转过去松弛、拖沓，严禁途中带客、带私货及各种违禁品；五是提高邮运效率，不准途中随便耽延；六是防止驾驶员和压车员于执行任务中酗酒闹事，影响邮运；七是防止偷窃、盗卖汽油等事宜，以保持驾驶员的良好作风和对外的良好信誉。

西南区军邮在全国军邮中所处的地位

后勤部军邮督察处，是全国军邮最高机构；总局视察室，又是全国军邮直接领导机构；而这两个军邮领导最高机构，均驻地重庆。重庆是当时全国的陪都，其地位和重要性，可以概见。

而局部性的西南区的军邮，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又是怎样呢？就前面西南区军邮的分区任务来看，三个区的任务，在全国比重，都占着首要地位。考其原因，有如下五点：一是西南区是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是抗战的陪都，是当时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军邮及普邮业务繁盛；二是西南地区由于交通不发达，几条仅有的交通干线的邮运，全靠自备邮车来运输，因此邮运紧张；三是当时我国通海外的滇缅、滇越两条路线都在西南区；四是我国远征军出国远征，额外增加了对外军邮的运输和频繁的联络事务；五是由海外进口的大批积压邮包的抢运，汽油的抢运，邮运汽车的抢运。从以上五点，说明了抗战期间，西南区军邮所处地

位，和其所担负的任务。

西南区的交通邮网

抗战期间，西南区的交通，由于山路多，平路少，邮运相当困难。铁路，黔桂线由广西柳州只通到贵州都匀，湘黔线只修了一小段，尚未通车，广西境内的来宾线，湘桂线，其中只湘桂线邮运比较畅通，但大宗邮包，仍受着军运的限制，由于有军邮的协助，运输还是比较顺利。其次是公路，跨区的有滇缅公路、滇黔公路、成渝公路、川黔公路、湘黔公路、黔桂公路、宝成公路等七条主要干线。各区内，除少数县份不通公路外，绝大部份的县镇都通了公路。再其次是水路，有航路可以通邮的，四川有嘉陵江、金沙江及重庆通湖北宜昌的，一段长江上游。贵州通邮的水路较少，只有通广西融县长安镇的榕江，北部通四川綦江的乌江。云南境内的怒江、金沙江、澜沧江、红水河、大渡河、泸水河，均有部份可以通航，但能通邮的还是较少。桂区由榕州至桂平的西江上游，桂平至南宁的邕江，南宁至龙州的左江，南宁至百色的右江，由桂平至柳州的浔江，至阳朔、桂林的漓江，这几条水线，均可通邮。旱路，三区的边远县份和乡、镇，全部通邮，邮路的线路，密如蛛网，布满了全区。有的逐日班，有的间日班，有的墟日班，有的昼夜兼程班。这些邮路的邮运，都靠邮递员肩挑背负，来往传递，炎夏寒冬，风雪无阻。

战时部队移动频繁，一旦部队进驻，军邮事务转重，一些旱路邮班，为了适应军事上邮递的需要，就要及时改为逐日班，或昼夜兼程班，部队转移，恢复正常。

西南区初期阶段军邮任务的完成情况

以贵阳为中心的西南区各条主要交通线邮政班车的巡查和车

务的加强管理，基本上完成了应负的使命，提高了邮运效率。

过去驾驶员、压车员及行车管理员的纪律松弛，个别的坏作风和习惯，已予以及时的纠正和扭转。

班车行驶正常，半路带客及私货和违禁品，基本禁止了。

广西柳州军邮八总段，这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抢运各水路线上各局积压的大宗邮包，和总局由香港购进的一百部邮用汽车，及由广州湾购进的邮用汽油。这在当时运输紧张，船只少而又难觅的情况下，任务是艰巨的，但终于胜利地完成了。

西南区军邮的后期阶段

这一阶段的初期，云南区军邮第十三总段在昆明成立了。其任务：重点在配设远征军的军邮局、所，出国军邮的管理，和对外军邮事务的联系。各区军邮的一般设施，大部仍旧，无何新的增设和大的变动。

这一阶段的后期，1944年夏，由于日寇最后挣扎，在进占我广西桂林、柳州后，竟孤军深入，沿着黔桂公路线，急不及待地迅速向贵州独山一线推进。在我军压迫，及其后勤供应接济不上的情况下，迫而撤退。退时竟疯狂、惨无人道地将独山付之一炬，致使一部份未抢运完的邮包，和独山军邮档案处各总段寄存的军邮档案，全部被焚，这是难以补偿的损失。

云南方面，日寇由缅甸向我滇西进攻，侵占了我滇西重镇腾冲。惠通桥一役，日寇的锋芒被顶住了，此后敌军的进攻，由于战局的急转直下，即接近尾声。

这一阶段，虽时间未久，但军邮遭受的损失最重。尤其是八总段，非仅物资损失重，还有一位军邮视察何可人，不肯擅离职守，最后迫而于梧州撤退时，途中遇害，尸骨无存。

1945年秋，当抗战接近胜利的时候，西南区军邮的整个形势，一方面由于胜利的接近，另一方面，大家盼望着的复员，快

要到来了。上级所赋与西南区军邮的整个使命，虽不能说完成最好，但已基本完成了。因此，大家既感到兴奋，而又获得了一定的安慰。

溪口大轰炸

夏明曦

本文作者系1940年初日寇轰炸溪口时的目击者。他在文中详细地介绍了日寇轰炸溪口的前后经过及当时溪口被炸时的凄惨景象。

1940年的2月间，蒋经国为亡母做“满七”而来溪口，住于上街头武岭公园的中国旅行社内。因为时在旧历岁末，急于要赶回赣州处理政务，故来去匆匆，不为外人所知。这时，有个日本间谍甲飞，打扮成中国客商模样，潜入溪口，住于车站隔壁的“武胜饭店”，专事刺探我军政情报。他打听到蒋经国来溪口，并住在武岭公园，却不知道蒋已离去。为此，就向日本军部发报。军部遂于春节后第三天，亦即是1940年的农历正月初3日，派机轰炸溪口。那次受毁物资之多及死伤之众，远远超越前次，人民至今还谈虎色变，被喻为溪口最大一次的大轰炸！

是日，天气晴朗，中午时分，当丰镐房里宾客云集、进行午餐之际，防空站的空袭警报拉响了。原来，丰镐房自死了毛福梅和宋张生之后，蒋介石从重庆来电，要“吾姊扶理家务，为我负责春秋祭事”，因此，由大姑蒋瑞春及大姑丈宋周运接替了总管事宜。他们听到警报声，立即停止宴会，进入武岭学校防空洞躲避。镇上居民，携老带幼，纷纷向四处疏散，更多的人群涌向隔江上山村。这时的溪口，因东南物资都在此转运，已形成交通重镇，也有特地把汽车开到西郊上山隐藏的。大家都认为上山村的一片竹林丛是最可靠的躲避处，可以保险无忧。不久，紧急警报

拉响，只见有意大利造的日机9架，飞成“品”字队形，自西北方向飞入溪口上空。奇怪的是，这次日机并未像前次那样寻找目标，实行俯冲投弹，而是按地面发出的信号，在高空投掷大量爆破弹、燃烧弹。而目标集中一个，就是在武岭公园附近及对面的上山村和竹林丛。弹落处，顿时浓烟滚滚、火焰冲天。加之此处置放着的本来就是些待运的液体燃料，一着火花，更形成一片火海！人们受不住烟熏和弹片袭击，便四处乱跑，敌机即惨无人道地用机枪向我无辜群众密集扫射，一时被扫死、炸死、烧死的有140余人，尸横遍野、血肉横飞；肢腿、断臂到处有发现，脑浆迸出在路边的，一股腥气；更惨的是上山村蒋祥大之妻，人还活着，肚肠破裂外出、血流如注。房屋被毁、被烧的更多，整个上山村130多间房屋只留下一个凉亭完好，其余瓦砾一堆；溪口上街头25间的簇新楼屋，大多毁倒！街路洞裂！

当时，日机在溪口上空盘旋，如入无人之区，轰炸、扫射，任所欲为，长达40分钟。投弹后，从容飞去，旋又飞回来侦察一番，吓得人们魂不附体！这一轰炸，直到鬼子兵称心如意，才归去交差。

事后，人们才知道，这次日机轰炸溪口，主要是根据日谍甲飞提供情报：一炸蒋经国；二毁我上山村堆放的军用物资。

可笑的是：这个日谍甲飞，潜来溪口很久，溪口的军、警、宪都不曾察觉，直到溪口沦陷，日军进驻，而被任为派遣司令的，竟是住在武胜饭店一向被我当作正当客商的日谍甲飞……

祁零煤矿内迁亲历记

孙锡华

1940年6月，国民党新六军番号撤销，代理军长沈久成叫我随他去长沙，已面报薛岳长官，委任我为少校秘书。我考虑到长官部的秘书，都是薛岳的广东同乡，我与薛岳毫无关系，在那里肯定不好相处。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湖南大学法科老同学，当时任湖南省七区专员兼祁永警备司令的姚雪怀，请求他调我到零陵去工作。半个月后，接到他的信说：“我已报告长官，同意调你到零陵工作，盼速来！”我就于7月下旬离开长沙，到零陵去了。

1940年7月底，我到了零陵，任湖南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助理秘书兼祁永警备司令部驻祁零煤矿区中校督察长，常住矿区，负责维持治安秩序。煤矿局局长为资源委员会专家王翼臣。

1943年1月，我辞去七区专员公署和祁永警备区的职务，改任资源委员会祁零煤矿局专员。

祁零煤矿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供给湘桂铁路用煤新办的煤矿，原来只有一口竖井，后来为了满足路运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开凿了第二口竖井，都用机械生产，自动化程度不高，煤层不整齐，厚的不足二米，薄的只有50公分。因而煤的日产量也不稳定，最高日产量900多吨，平均日产量约700多吨。既要供应湘桂铁路全线用煤，又要供应黔桂铁路部分用煤，供应情况很紧张，没有储存。

1944年5月，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战争。在衡阳激战一个多月，衡阳终于失守，我矿区距衡阳只有109公

里，矿场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资委会指示我们：“为了保持军运畅通，必须坚持煤炭的继续生产。非到最后关头不能撤退。”同时，国民党在衡阳前线的总司令李玉堂和湘铁路局长石志红也派人员来矿慰问。为保证全矿职工的安全，即由湘桂路局派一列空车停放在易家桥站，供矿局紧急撤退时使用。全矿职工激于爱国热情，为了支援抗战，一个个斗志昂扬，坚持生产，煤的日产量有增无减。8月3日，战争转移到白地市附近，距矿区只有27公里，夜间可以听到枪炮声。八月四日李玉堂派来一营正规军，协助矿警，保护矿场。8月7日下午，祁零煤矿局局长王翼臣邀我到车站去探听前线战情，恰巧李玉堂前来视察。他对我们说：“现在我军奉令转移，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你们的撤退工作准备好了吗？”王局长说：“我们未得通知，还在生产，根本未作撤退准备。”李玉堂说：“你计划一下最多要几天才能撤走？”王局长说：“最少要三天，有些东西还撤不走。”李玉堂沉重地说：“我老实告诉你，你们如果迟到明天这个时候，就走不脱了！你们煤矿的东西，能够撤走的撤走，不能够撤走的就干脆丢掉。”我听完话，立即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紧急会议，当场决定如下：(1)全矿立即停工。工务课立即动员全部技术职工，拆卸电机等重要机械，搬运上车，今夜必须完成，两口大井明晨炸毁；(2)全部职工和家属，明晨8时以前全部登车；(3)全部临时工6000多人，一律发给三个月工资遣散回家，总务、会计、业务三课人员全体动员办理这项工作，遣散费分十个地点发放，每处派四名矿警守卫，维持秩序；(4)所余矿警协同护矿军队，加强戒备，彻夜梭巡，防止发生破坏活动。散会后，立即分头进行，到次日晨8时，人员和器材已全部登车，遣散费已发放完毕，临时工都纷纷挑着行李离矿场。9时我与王局长到全矿检查一遍，然后登车。10时，车站人员担着公文行李登上我们的列车，火车立即开行。这是湘桂铁路的最后一列车。

第一次撤退，湘南——桂北——黔南

1944年8月8日上午10时，我们的专车驶离易家桥站以后，每驶过一个桥梁或涵洞，这个桥梁或涵洞，就被事先埋好的炸药所炸断。不到一小时，专车开到了冷水滩站。在我们到站之前，站上已停有14列列车。前面的车没有开出，我们这个“最后一列车”只好停下来等候。下午4时许，我们远远望见矿场烈火冲天。不一会，从矿场附近逃来的难民，说是敌人已经到达矿场，大肆烧杀抢劫。王翼臣局长忙去找驻在冷水滩站的湘桂路丰线区司令，他答应把我们这一列车于明晨提前开出。9日清晨，列车离开冷水滩，不久到达一个中间小站。前面有两列车停着未走，后面又有两列车接着开来，5个车头和110个车厢，连接在一起，首尾长达一公里左右，形成了“一字长蛇阵”。下午3时许，我们在列车旁的空地上，埋锅造饭，一个头戴伪装的军官走来问我：“你是这一列车的负责人吗？铁路有被截断的危险。我特来通知你们，希望你们赶快开走！”我回到车上告诉王局长，他立即到车站去请求开车。车站用电话与东安站联系。到下午4时，我们这个“一字长蛇阵”才缓缓地向东安爬行。

列车进入东安站时已傍晚，站上列车比冷水滩站还拥挤得多。王局长听说李玉堂还在东安，就去找他。李玉堂用电话通知东安站长，限令他明日清晨把我们这一列车首先开出去。10日天刚明，我们这列车就开走了。上午十时左右，列车到黄沙河早餐。黄沙河位于湘桂两省的交界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历来都是军事上必争之地。我们看到国民党军正在这里掘壕布防。据说守军共有三个军的兵力，都是新增援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我认为，在这里总可以多守住几天了，不禁舒了一口气。车还未开，从后面驶来了一辆空头火车，司机说：“今晨9时左右，东安城已陷入混乱状态，车站发生了枪声，我们才丢掉列车急忙驶来。”我们

那一列车，闻信立即开行。下午，到全州过夜。11日，平安到达桂林。

专车停在湘桂路的北站，等候过轨到黔桂路的西站。王局长接到资源委员会的急电，要他搭飞机赶到重庆去。他把撤退工作交给我全权处理，就坐飞机到重庆去了。12日听到黄沙河失守，13日又听到全州失守，桂林失去屏障，人心惶惶，纷纷准备逃难。我到湘桂路局会见石志仁局长，请求他帮助，尽快把专车过轨的事办妥，以便我们早日撤离桂林。他答应“马上就办！”14日上午，一个佩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伤兵慰问组少将组长符号的军官，到我们车上说：这一列车，桂林车站已拨给他们，要我们立即下车。我说：“这列车是湘桂铁路局拨给我矿局的撤退专车，即将过轨到黔桂路去，车站根本无权调拨。你们人数不多，上车来挤一挤是可以的，绝对不能让车！”他气冲冲地走了。不一会，他又带来了五个兵，大声吆喝说：“你们还不快让车！我们的部队要上车了！”我说：“我刚才已经对你说清楚了，绝对不能让车！”他命令随来的一个士兵：“快叫我们的部队来，把他们的东西丢下车去！”我就叫矿警队长：“我们部队立刻全副武装下车集合！”我发表简短的讲话说：“我们为了支援军运，九死一生，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撤到桂林，距目的地还很远，我们有责任保护全体职工和国家财产的安全，如果有人蛮不讲理，武力来抢车，我们就用武力来还击！对于这种帮助敌人来压迫中国人民的人，我们就把他当作汉奸卖国贼来对待，揍死他们几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部队立即持枪实弹在列车附近实行警戒。那个家伙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好收场，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来？我自己去看看去。”就夹着尾巴走了。我们守候两个钟头，还不见他们的影子，才收兵回车。

15日晨，黔桂铁路的桂林车站得了湘桂路局石局长“犒赏”的15万元法币，才让我们那一列专车过轨开到柳州。国民党在柳州设有飞机场，驻有十多架飞机。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白日不敢

来，夜夜都来偷袭，进行狂轰滥炸，与中国空军曾发生多次空战。柳州车站后面是国民党军的高射炮阵地，也是日寇飞机袭击的重要目标。每夜发放警报，我们必须下车躲避，等到解除警报才敢回来。有时回到车厢里还未坐稳，第二次警报又吼叫起来，必须再次躲避。这样跑来跑去，整夜不能合眼，那时湘桂铁路已全线沦陷，火车都撤到黔桂铁路来，路短车多，调度困难。黔桂铁路各车站趁此机会，放肆勒索，列车不向他们行使贿赂，就借故为难，迟迟不肯放行。王翼臣局长是一个死硬的煤矿专家，平日对于经济一丝不苟，要向车站行贿，根本无法报销。因此我们在柳州车站停留了十五天，天天去交涉，都毫无结果，后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根据资源委员会的请求，电令黔桂路局限期放行，我们才于8月30日离开柳州到宜山。

宜山是黔桂铁路局的临时所在地，但宜山车站的马站长却比柳州车站的站长更贪污，更恶劣。他得不到我们的钱，索性把我们的专车，调到边远的叉道上停下来，准备长期卡住我们。那时，桂林和柳州相继失守，许多商车都先后离站，我于9月20日晨去黔桂铁路局会见肖卫国副局长，我说明情况后，他写了一张便条给马站长，要他提前把我们的列车开出。我回来把这个便条交给这个马站长，他看后板着脸说：“前面没有路，我有什么办法！你去叫肖副局长自己来调度吧！”说完话，掉头而去，不再理睬我。我气极了，又回头找肖副局长，如实地反映了情况。他叫我等一会，立即拿起电话筒对马站长说：“祁零煤矿的专车在车站停放了二十多天，你为什么不放它去？现在我命令你，把停在站上的空军排在第一列，运兵车排在第二、三列，祁零煤矿局专车排在第四列，明晨以前必须开出去。如果那时还不能开出去，我要严厉惩办你！这是命令，你知道吗？”他放下电话筒，对我说：“真对不起，把你们耽搁得太久了！你回去准备一下，你们那一列车下午可能开出去，如果明朝还不开，你再来找我。”9月20日下午四时我们的专车就离开宜山开往金城江。

黔桂铁路在金城江以下，道路比较平直，每个机车可以拖带二十多节车厢。在金城江以上，铁路进入山区，由于设计不当，坡度太大，每一列车用两个机车前拉后推，也只能推带八节车厢。因此，所有列车都以金城江为终点，再向北进，就必须换车。我们到金城江以后，资委会派30辆汽车前来接运。我们卸下人员器材，改乘汽车，但汽车过少，容纳不下。于是命一部分青年职工，步行前进，到贵州省都匀集合。

9月22日晨，我们乘汽车离开金城江。那时所有列车都在金城江卸载，多数乘客是向贵阳逃难的难民，他们再也找不到其他交通工具，只好扶老携幼，蹒跚步行。不停的汽车喇叭声，使他们让出路中央的一条缝隙，我们的车队才能在人缝中缓慢前进。汽车走了两天，才到达都匀。我们第一阶段的撤退，到此结束。

第二次撤退，都匀——贵阳——遵义

我们到都匀时，王翼臣已先到了20多天。资源委员会任命他为资源委员会黔南煤矿筹备处处长，在黔南的都匀设立机构，开矿采煤，供应黔桂铁路。任务紧迫，我们下车后立即开展工作，我已被调任这个筹备处的总务课长，工作相当繁重。好在各部门都是原班人马，业务熟悉，办事并不困难。

为了满足黔桂铁路的迫切需要，我们第一步计划是挖掘斜井，开采上层煤，一个月后即可投入生产，开始供应；第二步计划挖掘竖井，开采下层大煤，费时较多，产量较大。第一步是治标，第二步才能治本。计划进展得很顺利，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出煤，日产量达50多吨。以后逐日增长，一个月后已达到80吨。不料正在这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入了贵州，逼近都匀，我们又仓惶作第二次撤退。

10月24日，我们接到资委会电报，命令我们紧急撤退，并说：“运输紧张，只派卡车15辆前来接应，年轻力壮的职工一律步行

到贵阳集合，器材不能运走的，概行抛弃。”25日晨，汽车由贵阳赶到，我因部署撤退工作，到早饭后，才带着爱人和两个幼女，由二个工人挑运行李，赶到离城3里外的停车地点登上资委会派来的最后一辆汽车。但挑行李的工人只有一人赶到，另一人迄未见到。后来我到北京，他探听得我的地址，从国民党驻东北部队写给我的一封信说：“出城后，他落后了，遇着一队国民党军，把他抓去当兵，所挑的行李都被他们抢光了。他现在还在国民党的部队当兵。”

我们刚上车，见都匀城内已经起火，据说是国民党部队为了进行“焦土抗战”所放的火。汽车司机看到情况紧急，立即开车，行到离马厂坪以南四公里的地方，前面停放着几百辆汽车，把路完全塞断了。我们汽车在路旁下来等候。直到深夜，毫无动静，我们和司机都靠在车上沉沉入睡。不久，无数的人声和车声把我们闹醒，我睁开眼睛，见三个美国兵拿着枪对准我们那辆汽车司机的胸膛，打着手式威逼汽车立刻开走。原来后面开来了几辆美国的十轮大卡，他们看到公路被车辆塞断，不能通行，就跳下车来，把前面的汽车一辆一辆地赶走。我们汽车司机沉沉睡觉，神志还未清醒，见前面已没有汽车，就糊糊涂涂地把车开走。走不多远，把车翻入路旁一口水塘里，我恍恍惚惚地像从悬崖上跌落下来一样，稍一定神，才发觉已泡在水里，身边还压着一包行李。我意识到已经翻车了。我拖开我的爱人，但原来睡在我们身旁一个四岁和一个半岁的小女孩却遍寻无着。后来推行李，才发现她们被压在行李下面。我把她们拖在路旁一块空地上，呼喊不醒，已气绝身死了。我爱人抱着她们泣不成声，我亦感心碎神伤！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我们的矿警队已从后面步行赶来。他们问清情况以后，有的跳下水塘捞行李，有的挖坑给我掩埋已死的小女孩。人多心齐，一会儿都办妥了。他们替我挑着湿淋淋的行李，保护着我徒步前进。走到马丁坪，已经是子夜了。那时马丁坪的居民已逃避一空。矿警给我们找来干草，把我们的

衣服被褥烘干，他们才躺在地上睡了一会。我们夫妻二人则悲伤万分，整夜未曾合眼。

26日晨，矿警队派出几个人为我找寻资委会的汽车，已经杳如黄鹤，无影无踪。搭车已完全无望，我决定在矿警的保护下，徒步向贵阳进发。在漫长的公路上，两旁的居民都已逃入深山躲避，见不到一个当地的老百姓，到处是成群结队的难民。我们晓行夜宿，宿则没有问题，可以在人民遗留的空屋里草堆上过夜，食却成了大问题，有钱无处买，怎么办呢？那时，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军队，有的脱离组织，单独行动，成营成连地夹在难民中间向后方逃窜。这些残兵败将，畏敌如鼠，但压迫中国人民异常勇敢。他们荷枪实弹，整队入山搜索，见粮盐就抢，见猪牛就宰，把抢来的米盐肉弄到山下来高价出卖。我们和难民在饥饿的驱使下，只好付出高昂代价向他们购买，聊以充饥。我们在这样的苦难生活中，度过了四个日日夜夜，于29日到达龙里县城。

这个小县城，居民并未逃散，商店和旅馆照常营业。我们投宿在一家旅馆里，在店里遇着一个过去相识的新闻记者，“他乡遇故知”，十分亲热。我问他：“你是消息灵通的新闻记者，这一线的战局究竟如何发展？”他说：“我昨天在这里会见新来这一线担任总司令的汤恩伯，我问他对这一线的防守有什么把握？他不住摇头，连说几声‘没有把握’，并说：‘最近我从河南调到此地来，交给我指挥的部队，只空运来一个师的生力军，其余都是从湘桂前线退败下来的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谈得上有把握？不过，敌军这一次大举进攻的主要目的，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向东南亚扩大侵略。它进攻黔南，是为了保护侧翼，以免我军切断他们的后路。因此进攻黔南的敌军，据报只有一个联队，而且进到独山和都匀之间的黑冲，即止步不前。根据这种情况判断，事态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这一线就不会有问题。’我认为汤恩伯的判断，很有道理，你说是吗？”我点点头，就惴惴不安地回房休息。又经过三天的奔波，我们终于平

安到达贵阳。

我们寄住在贵阳一个学校里，收容逃散的职工。但结果只收容半数的人，其余都不知去向。根据资源委员会的安排，我们又乘车前往遵义，在那里休整待命。

11月14日，我们到达遵义，在车站附近租了一个大旅馆住了下来，进行长期休整。王翼臣又被召到重庆去了。过了几天，接到资源委员会发给我的嘉奖金说：“孙锡华在两次紧急撤退中，认真负责，不避危难，不顾牺牲，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特明令嘉奖，并晋升二级，发给特别补助金50万元。”我得到这笔钱，用来添制寒衣，度过严冬。

我们在遵义休整，工作很清闲，过去三个多月流亡生活中，身体所受的创伤，经过休养，逐渐康复过来。但念及两个幼女的惨死，心里十分难过，这是永远也医治不好的！

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

1945年2月初，我接到王翼臣电报，调我即日去重庆工作。我于2月5日大雪纷飞的早晨，搭新中公司的眷属车从遵义出发。车轮套着防滑链条，缓缓爬上娄山关。我在车上约略地数一数，公路两旁翻倒的汽车，竟达30多辆，令人触目惊心。娄山关顶上，公路上雪厚一尺左右，两旁积雪厚达二尺，纵目远望，我们好像置身在“琼楼玉宇”的琉璃世界。车过娄山关约三公里，汽车发生故障，修理了四个小时才继续开行。时间渐渐入夜，汽车前面的探照灯又全坏了，怎么办？汽车司机叫助手把乘客的手电筒借来，由他双手持着两只手电筒步行在车前照路，汽车随在他的身后缓缓行进。山高路险，夜色漆黑，万一不慎汽车滑倒山沟里，我们都会粉身碎骨。新中公司的经理不断招呼司机“注意”！汽车这样滑行了七个小时，才到山下一家小店前停下。整天未进餐，饥肠雷鸣。我们下车后把店里所有熟食抢购一空。等到

吃完饭，已经听到鸡叫了。稍稍休息一会，天已大明，汽车继续向桐梓驶进，就在那里停留住宿。七日晨，汽车离开桐梓继续开行，走了四天，才到重庆江南岸。这里距我们目的地化龙桥还有20多华里，天色已晚，在旅馆住宿一宵。次晨渡江，雇一辆马车把我们送到化龙新村炼钢厂内我们矿的办事处。我在重庆的任务是主持祁零黔南工矿驻渝办事处的工作。因为王翼臣已兼任重庆市燃料管理处处长，我也代他兼办一些内部的事务。

1945年5月，侵入黔南的日本侵略军已经退去，黔桂铁路恢复通车。资源委员会又命令迅速恢复黔南煤矿，供给黔桂铁路的用煤。5月6日晨，王翼臣和我二人由重庆乘专车出发，在遵义办事处住了一天，指示驻在那里的职工整装待命。9日继续南下，经过贵阳，次日到了都匀。

我们去年10月从都匀撤退时，国民党守军在城内纵火焚烧，整个县城变成一片焦土。我们到达这里，见黔南煤矿原有的房子，已夷为平地，片瓦无存。因为敌军并未来到都匀，居民陆续在大街两旁，修建了一些商店、旅馆、饭店。我们就在一家旅馆住宿，并常在附近一家饭店用餐。一天下午，我们二人正在饭店吃晚饭，见一个50多岁的老妇携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在我们饭桌前讨饭。我看她很像祁零煤矿附近一个私营永和煤矿李经理的爱人，问她是不是？她说是。我又问：“你为什么变成这种模样？李经理到哪里去了？”她咽呜着断断续续地说：“我们一家四口人在易家桥搭你们的专车，一直逃到金城江，你们从那里改乘汽车走了，我们找不到车，只好步行逃难。我们走得很慢，还未到六寨，日本鬼子就追上来了。鬼子把李经理抓去挑担子，他年老体弱，挑不动，鬼子戳了他几刺刀，把他活活杀死。我们的钱大都在他身上，我们带的不多，那时只顾逃命，哪敢专取？我们想逃到都匀，向你们求救，不料逃到那里，你们又撤走了。钱已用尽，举目无亲，无处借贷。他的小老婆人还年轻，跟着一个军官走了。我们母女无法可想，只得沿门乞食，勉强活到现在。”说罢

大哭不止。我们二人都很怜悯她的不幸遭遇。王翼臣说：“我们找得办公房屋以后，你来替我守屋和打扫卫生。等遵义人来了，我再叫他们给你安排工作。”随手给了她一点钱，叫她暂时维持生活，不要再讨饭。她千恩万谢地走了。过了两天我们在城外找到了一栋房屋作临时办公处，就叫这个老妇人来看守房屋和打扫卫生。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铁蹄所至，中国人民遭受惨绝人寰的蹂躏。这里所举的不过是我亲身接触到的事例之一罢了。

5月下旬，我们矿在遵义休整待命的职工，全部回到都匀，立即修复原有煤井，开工生产复矿工作，到6月初全部完成。王翼臣和我于6月8日回到重庆，处理积压的事务。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王翼臣调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我同时被调任为这个特派员办公处的专员。奉令即日飞往北京，办理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四省和北平、天津二市所有敌伪企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王翼臣于9月11日飞往北平，我因等候飞机，到9月18日才离开重庆。

华北的经济复员工作

在飞机上，遇到了永利化学公司经理李烛尘。他说他是永顺人，在外面很少遇见永保小同乡，十分亲热。当天下午到达南京，因等候飞机，住了两天。

9月21日晨，我由南京乘飞机北航，下午2时到北平，王翼臣到机场迎接。次日，我们在北京东交民巷日本“华北开发公司”原址设立特派员办公处，开始办公。处内人员都是在北京新组成的班子。王翼臣终日在外面奔走接洽，没有时间过问内部事务。新委任的主任秘书孙子铁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因此，整个办公处管理内务的责任，都落在我一人肩上。既要处理内部日常事务，又要接见宾客，处理对外问题。由

于工作开展迅速，全部内外勤人员很快增至2400名以上，我的工作就更忙得不可开交。每天从上午8时到下午5时，几乎没有一点休息。但念胜利得来不易，经济复员攸关国家的百年大计，所以仍然心情愉快地进行工作。

日本“华北开发公司”是日本侵略者开发和管理华北五省工矿企业的总机构，下面管辖49个公司，从钢铁、机械、电力、化工等重工业直到纺织、食品等轻工业，都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我国华北丰富的资源和以战养战的重要工具，规模十分庞大，设备也很完善。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首先进入北平，对这个机构进行第一次抢劫。除了一个保险库用炸药也未轰开以外，所有贵重器材都被抢去了。接着，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进入北平，又对这个机构进行第二次洗劫，又抢去了很多财物。等到我们接收这个机构，设立办公处时，看见设备和文件随地抛散，零乱不堪，我走进“资料室”查看，却未被国民党军和美国兵“光顾”，完整无恙。原来这里面收藏的全是图书档案，不能满足他们“发横财”的贪欲，因而未遭到他们的毒手。我走进去随手翻阅一下，里面的图书档案都是日本侵略者对华北五省的地上和地下资源进行调查和探勘的资料，以及对那些资源设计和开发的图纸。这些都是国民党政府所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是日本侵略者遗留给我国的宝贵财富，也是我国今后从事经济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我指示工作人员把这个资料室封闭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去翻动，等待以后研究处理。后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监察院和国民参政会共同组织检查团到北京检查接收工作，发现其他接收单位对于这些资料都未注意保存，大部已经散失。只有我们这个单位所接受的资料，全部完整无缺。他们认为这是对国家今后建设的一个深谋远虑的措施，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冀热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范围内，按规定应由经济部接收复员的敌伪工矿企业，在平津两市有700多个单位，在冀热察绥四

省有300多个单位，合计1100多个单位。首先由国民党军十一战区长官部接收了一批，以后又被当地省市政府接收了一批，其余未被吸收去的单位，已寥寥无几。他们把这些企业接收过去以后，拚命搜括财物，并不准备复工生产。后来经国民党政府三令五申，并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亲自驻北京严厉督促，他们才将所有非法接收的敌伪企业交给我们再接收。我们所派出的接收人员，按照日本人的原始移交清册进行点收，发现其中重要资材设备，多已名存实亡，只好要那些非法接收人员另行造具清册，再逐一核实点收。有的非法接受单位或个人，因为侵蚀过多，害怕追究责任，甚至纵火烧毁厂房，企图灭迹。这样的事件，前后发生过六次。在我们的办公处所派出的接收人员中，也因为份子复杂，良莠不齐，贪污中饱的事件也不断发生。记得有一次，我们派出两个人去接收北平制药厂，其中一个姓李的，偷了几盒珍贵的针药，放在衣袋里，被另一个姓赵的看见了，回来告诉我。我转报王翼臣，把这个姓李的立即清洗出去。

经济部在华北四省两市所接收的1000多个企业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充实后，绝大多数都重新开工生产。但有一小部分，由于遭受严重破坏，竟无法利用而永久关闭。这对我们国家来说，当然是一个损失。同时，日本人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是有着一套比较先进方式方法的，日本的华北开发公司，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它下面管辖49个子公司。各个子公司又在各省市设有分支公司，它们用纵横交错的高压输电线路把各省市所生产的电力联系起来。它们可以互相调剂，互通有无。其他各公司相互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如华北钢铁公司与华北电力公司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联系。它们的产品和资财，经常互相调拨，互相调剂。这样做的优越性，是使各生产单位的产品和资财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既避免了积压和浪费，也避免了短缺和不足。但是，通过国民党政府接收以后，各接收单位各自为政，互不相顾，把这种制度彻底破坏了。如北平石景山电厂虽有2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

但满足不了北京全市的需要，常常要分区停电，而山西省的电力有余，却任其浪费和减产。当时稍有一点爱国心的中国人，对国民党统治下的这种黑暗和混乱情况，是十分不满和痛心的。记得有一次，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来我们办公处，召集经济部在北平的高级干部开会，我也在座，他在讲话中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们这般人，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也！为什么这样说？所有今天在座的都是学有专长的人。如果是太平时代国家搞经济建设，你们都能够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在这兵慌马乱的时期，一切都是军事第一，谁来注意什么国家建设？你们这班人就变成无所作为的大饭桶了！”这虽是他在当时情况下的愤激之词，也确实说出了在那个时代的一般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尴尬处境。

马华抗日运动回忆录

王炎之

作者曾系马来亚华侨抗日运动负责人之一。马来亚华侨抗日运动始于1931年“九·一八”之后。此文详细叙述的是1934年至1938年间马华抗日运动的兴起、斗争、发展；以及作者在斗争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和被捕、遣送回国的经过。

抗日运动的过程

提起马华抗日运动，首先要谈当时华侨的一般情况和抗日运动的过程。概括说，当时华侨的情绪是十分激昂的。他们看出日寇吞并中国的野心，感到亡国惨祸已迫在眉睫，从而奔走呼号，互相警告，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共同口号。以往华侨社会散漫，整体观念不强，分疆划界，派别林立。这时却忽然靠拢着，几乎不分阶级，不问帮派，同仇敌忾地愿为抗日救亡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当时他们还无所作为。因为国内无抵抗，敌人得寸进尺，国外受着当局压迫，爱国不能自由，他们只有愤怒、慨叹、悲观、失望。直至“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们才蓬蓬勃勃地掀起了爱国热潮。其汹涌澎湃，几欲冲破一切，淹没了整个马来亚，使当局为之侧目，最后促使它改变政策——放宽了控制抗日运动的尺度。

从表面上看，英殖民统治者不让华侨抗日，原因是怕当地两民族发生纠纷（当地华侨和日侨混处杂居），再则，英日同盟，英国有义务维护盟国的利益，这些都是理由的一部分，更主要的则是它不愿看到华侨的统一。

正如上面所说，华侨社会涣散，只有小集团没有大团结，这也是殖民政策造成的。倘为了抗日，华侨团结起来，和当局那“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政策是不相容的。然而华侨已经发动起来——几乎是空前自动地发动起来了。殖民当局不得已，只好网开一面，留给华侨一些活动余地。这就是它放宽尺度的由来。但是它的放宽，不等于放任。而且在放宽后面还有一套阴谋：它想因势利导，通过它的代理人来控制这个运动。

因为英日矛盾尖锐化，殖民当局，想利用华侨抗日来为它自身利益服务，才有了较大幅度的转变。

世界二次大战揭幕前夕，日、德、意已构成轴心国。它们遥相呼应，企图东西两面进攻，来达到他们瓜分殖民地的目的。因此，日本于侵略中国同时，还怀有北进，进攻苏联，或南进席卷东南亚各殖民地的野心。当时日本提出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已把英属殖民地如马来亚、缅甸和印度都圈在里面了。英殖民主义者对此不免惴惴不安，转而希望中国抗日来拖住日本后腿。在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关于华侨抗日的组织。本来华侨团体，不论什么性质的，首先必须立案注册，得到殖民当局批准才能成立，否则就是非法的。“新加坡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是抗日团体，是“非法”的，但它半公开或准公开活动了相当时期。

其次，新加坡曾成立一筹赈总会，全称是“华侨筹款赈济祖国难民总会”。从表面看，像是慈善机关，实际上是筹款支援祖国抗战的。

第三，关于抵制日货。华侨为了全面抗战，实行对日寇经济抵制，组织经济锄奸团，专门对付贩卖日货的奸商。华侨直接抵制

日货，等子间接推销英货，对宗主国也是有利的。

综上所述，可见英殖民统治者的政策，是故意留给华侨一个方便之门。按说这时候华侨的抗日运动，应该更加蓬勃发展起来，但是，华侨的民气低沉了，华侨的抗日运动，几乎无声无息。

因为当时华侨内部起了分化。对于抗日问题意见分歧，抗与不抗，成为争论焦点，因此形成了两派：一方面——无产者和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团结内部，抗战到底；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则主张妥协，采取无抵抗主义。它们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无形中构成两个对立的壁垒。自从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推销到海外以来，华侨资产阶级跟着他走，听从他的指挥，充当他的辩护士或代言人。蒋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或“不安内无以攘外”；他们也大嚷大叫要“勘乱”，要“剿匪”；蒋介石说敌不能抗，亦不许抗，他们就危言耸听地说，敌太强大了，一抗就会亡国（所谓三天亡国论）。使一般华侨为之迷惑彷徨。因此抗日运动处于低潮。

但话说回来，华侨中还有主张抗战的另一派，他们潜伏着，正在酝酿。不过，他们不若资产阶级的喧嚷，原因是他们的言论权被剥夺，他们的喉舌被堵住了。当时的言论界——所有马来亚的华字大报如胡文虎办的《星洲日报》、国民党办的《新国民日报》（新加坡），《益群日报》（吉隆坡）、《光华日报》（檳榔屿），以至尊孔的《总汇新报》（新加坡）和旧买办阶级办的《叻报》（新加坡）等，都操纵在资产阶级手里。它们为所欲为地包办一切，肆意为蒋介石吹嘘，一若有蒋介石在，一切国家民族的利益都可以不顾似的。

当东北沦陷，人们责备南京政府不抵抗，他们有个代言人——《星洲日报》的主编这样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臂”，意思就是把日寇入侵比之为毒蛇螫手，把断丧国土，比之为壮士断臂。

凡此种种，虽属一鳞半爪，但从正面和侧面都可以看到当时

华侨上层分子的拥蒋，他们在华侨中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为了救国，为了统一，这责任已无旁贷地落在主张抗战的无产阶级的肩上。他们觉得必须展开言论思想的斗争，扫清迷雾，扑灭妖气，然后才能把广大华侨组织起来。因此，掌握当地的公开言论机构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可是当时一切操纵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又和当局勾结，动不动给你扣上一顶红帽子，加以迫害。所以，开展思想言论斗争是很困难的。

展开了言论思想的斗争

直至一九三五年，怡保出现一家《中华晨报》，这时方由它出面提倡抗日救国运动。

怡保是个小埠。它是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屿以下霹靂洲的首府。《中华晨报》的规模很小，创办人李西浪原来是个办小报的文化人，他和黄天石——一个在香港专门写黄色小说的合办，每日出版一大张，报份不多，经济基础薄弱。它的政治背景，似乎和广西派有关。

因为有以下条件：1.它不是大资本家投资的，言论上不受控制；2.它在小埠出版，减少了人们的注意，减少了资本家的压力；3.它的创办者是个黄色文化人，可以躲过当局的视线。适逢其会，黄天石去职，王炎之因和李西浪有旧，去承其乏，担任了该报总编辑，所以该报能以新的姿态出现。

刚开始，怡保的大小资本家都哗起来。他们认为这是异端邪教，公然反对“国策”，违背了蒋介石意旨，是大逆不道的。他们中如广帮巨头梁燊南，建帮巨头王振相以至一些中小资本家如白仰峰、白成根、陈能显、陈同福……等都很恼火。特别是王振相，他是国民党的死硬派，怡保一带的把头。他觉得国民党在怡保的防线给我们突破，是他的奇耻大辱，他想弥补，堵住这个缺口。他首先通过白仰峰，陈能显来和我们（我和李西浪）谈判，

劝我们“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和他们展开舌辩，他们失败了。接着他们旁敲侧击地，讽示我们“明哲保身”“知难而退”，也就是说，要我们提防戴上红帽子，受当局迫害。我们在报上发表一篇告爱国者书，大意说，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比当亡国奴更坏的，为了救国，我们不怕牺牲，也不受任何威胁。

这么一来，他们觉得我们不吃这一套，从而改变了方式，开始散播谣言说，怡保将成立一家新报馆来挤垮我们，或者说要和我们唱对台戏，我们都一笑置之。最后他们干脆地采取利诱的方法。他们通过梁燊南找李西浪谈话，要《中华晨报》扩充业务，巩固经济基础，对我们亦可提高待遇。这一层比较有诱惑力，我们坚持要编辑部独立，无论谁来投资，我们要继续提倡抗日，继续批评蒋政权的卖国政策，否则我们不干，结果这谈判又告吹。

经过这种种斗争之后，《中华晨报》依然屹立，而且日益壮大起来。它的读者群已由偏僻的怡保，扩大到几个大埠，而为一般青年教职员、学生、店员和工人们所欢迎。他们纷纷投稿，充实了它的内容。这时《中华晨报》乃起而发动肃清汉奸理论运动。尤其驳斥新加坡几家大报的谬论，收到了相当效果。其例子如下：

(一) 关于驳斥《星洲日报》的谬论。该报记者胡戊女写了一篇题为“论甘南赤祸”的社论，大意说，中国原来已经统一了，只因甘南“赤匪”尚在“跳踉”，致有分裂现象。它说敌人压境，“国人应该一致抗敌”、“匪”中也有深明事理的，为什么“顽抗中央”？“此国人所以对‘匪’深恶而痛疾也”。虽然，“匪”的战斗亦不弱，不如赦免它，让它开赴前线杀敌，将功赎罪，……可惜“匪”尚不知悔过，尚负隅顽抗，其蠢如鹿豕也可知……反之如果“匪”能向中央投诚，则国人就会原谅它……

我们说胡戊女不懂得逻辑，净说瞎话，究竟谁在抗日，谁不愿统一？

我们要正告胡戊女并《星洲日报》几句：当此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之际，凡我黄胄，应该联合起来，不分阶级，不问党派，一致对外。身居言论界的亦应本此旨，大声疾呼，督促抗战，而不是党同伐异，盲目拥护，以助长一些特权者的孤行独是，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据说《星洲日报》同人怕胡戊女没有看到，特地用红笔圈了几圈，放在他的桌上，胡戊女一见，哑然无语。从此《星洲日报》上再也看不到胡戊女署名的文章，而且“赤匪”、“共匪”这些字眼也少见了。

(二) 驳斥《南洋商报》主编丘子心的谬论。当一九三六年，正当爱国理论和汉奸“理论”斗争很剧烈的时候，汉奸“理论”者自觉嘴脸难看，于是化装一下，回过头来大谈统一，大骂汉奸。《南洋商报》丘子心就是扮演这类角色的。他在该报上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论统一救国运动”，大意说，中央政府得以铲除大江南北各地“匪患”，收复了不少形同割据的地方军政权，尤其是去年平定西南半壁，收获最大。但为什么还要提倡统一救国呢？因为这是对付那些残余军阀和“共匪”、汉奸分别或联合进攻的一种手段。他说近来“反统一”的势力，正在死灰复燃，他们把持地方、提倡所谓人民阵线，标榜联合各党各派，国共合作以便抗日，其宗旨似极冠冕堂皇，致一小部分不明真相的青年受其蒙蔽，而同情他们。“须知南京政府是牺牲多少生命，流多少血，才达到今日的稳固地位。蒋委员长十年埋头苦干才成为‘多数人’心目中的最高领袖。今日有领导抗日资格的政府和最高领袖，只有南京政府和蒋委员长，若代以其他领袖是不行的。”

这就是丘大主编的妙论。

我们问他：争取领导权是为什么？为了保护国土主权完整，还是为保护一小撮人的地位和利益？倘属前者，那末，国土已被丢掉三分之一了，他们应该自杀以谢天下，最少也要退让贤能，还有什么领导权可争呢？倘属后者，那就是说，他们视自己的利

益，超过国家民族的利益，或者说他们到底要骑在老百姓头上。依我们说，最好还是枪口朝外，一致对敌，先把敌人打倒了，然后再谈国是……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照样得不到回答，丘子心和他的一伙都噤若寒蝉。

(三) 关于人民阵线问题。在同一时期，《新国民日报》主编郑绍崖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什么叫做人民阵线？”大意说，人民阵线这个“怪时髦”名词，现在被提上日程，一班自命为左倾分子的正在大嚷大叫，作为爱国运动的口号。人民阵线和“国家阵线”相对立，前者以第三国际为背景，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后者站在国家立场，实行法西斯统治……。为了分清是非，我们写了一篇长文驳斥他。

我们说，人民阵线是法西斯促成的。因为法西斯的残暴，对内镇压人民反饥饿的斗争是杀；对外强盗之间火拼。驱人民去当炮灰也是杀。杀，是它解决问题的办法。人民为了自卫，于是有人民阵线的组织，不消说，它是包括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不只是共产党人而已。……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郑绍崖缄口结舌，没有下文。我们这小报虽小，影响却大。新加坡有一家小学（校名忘了）曾把这篇文章和郑绍崖的社论并列，印成专刊，广为传播，使新加坡许多读者都能看到。他们中有些青年，因为痛恨汉奸，竟跑到《新国民日报》要打郑绍崖，吓得郑绍崖连忙逃到槟榔屿《光华日报》去躲起来。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华晨报》是唯一起了这作用的（当时有巴黎救国时报起了很大作用），但《中华晨报》是唯一最早的抗日日报。它好像漫漫黑夜里的一道闪电划破了长空，使人看到一些东西。有些人讨厌它，千方百计想掐死它；有许多人喜欢它，给予它很大帮助，从而使它干得更起劲。为了发动各阶层群众，它创办了“妇女”，“学生”，“戏剧”、“电影”及“文化工作者”等等专刊，同时搞地下抗日

组织，筹办鲁迅图书馆——一种小型的流动读书社，直至1937年，王炎之离开怡保不久，它才停止活动，宣布休刊。

抗日运动发动起来

1937年，为了组织《南国日报》——我们预备在新加坡出版大型日报，王炎之离开怡保，回到新加坡来筹备。这时抗日运动已有了相当发展，原来的“抗援”，现在改为“马抗”（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由王炎之主持，并议定当前的几项任务：

- （一）扩大群众组织；
- （二）争取活动公开；
- （三）加强统战工作；
- （四）推动普遍募捐。

“抗援”组织开始叫“救国会”，人数不多，后来逐渐发展，才改为“抗援”和“马抗”。它是无产阶级的抗日组织，当华侨内部分裂时，无产者以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到学生、店员、“合法”工会以至一些封建组织如一姓会、同乡会去组织群众，则以读书小组、时事座谈会或互助会之类的名目出现。它们各自独立，仍以“抗援”为主体，在马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分工合作的。我和它的关系是从马共来的。

由于爱国运动的发展，这时“抗援”——包括整个马来亚的分会，已有二十万左右人（盛时达到五十万左右人），华侨踊跃参加，甚至连一些私会党（一种讲义气、打抱不平、后来演变成为以保镖为业，以打架为生，当地称它为“三星党”的）也要求参加。这使我们颇为难。一方面，他们的意识落后，“桀骜不驯”，生怕他们违法乱纪；另一方面，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不能拒之于爱国门外。最后，我们还是接纳他们，加强领导他们。这么一来，我们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里，这对我们后来发动普遍募捐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广泛地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了。但我们的组织是“非法”的。英殖民主义者随时可给予我们以打击，因此，我们要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

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强统战工作。过去“抗援”有些过左，违背了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力量的宗旨，今后必须端正它，搞好和各阶层的关系，尤其是和“民先”的关系。

“民先”也是个抗日团体，它的全称叫“民族解放先锋队”。据说它的发起人有一两个是从“抗援”分化出去的。它开始叫“爱国十人团”。后来逐渐发展到几百人。它的工作表现有如下几项：(1)出版不定期刊物，宣传抗日；(2)组织经济锄奸团，惩罚奸商，割掉奸商的耳朵；(3)动员华侨司机回国服务；(4)协助一日本铁矿的矿工罢工；(5)在马路上卖花筹款。

但它的立场有几项和“抗援”不同：第一，它主张劳资合作，但强调工人忍让，不支持或反对工人为改善生活的罢工；其次，它主张统筹统汇，也就是说，筹款要统一交筹赈会，统一由该会汇交南京政府；第三，它动员司机回国到蒋管区服务，不到八路军或新四军方面服务。因此有人说它是“正统派”(指拥蒋)，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也有人说它是当地政府所物色的，将通过它来和“抗援”对立，分化抗日运动。我们觉得不管它是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只要是抗日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但它时常和“抗援”闹别扭，锄奸工作也有些问题，因此我们想和它谈谈，找出一条合作的道路。同时想通过它和资产阶级联系，但我们这番诚意，不被他们接受，最后以无结论而告终。

这时，我们才想到直接找资产阶级谈判，在新加坡真能代表资产集团的，恐怕是怡和轩俱乐部了。

自从王炎之和怡和轩俱乐部负责人接触之后，认识了林茂盛颇有来往。有一天王在林茂盛处碰到一个陌生人，林把王介绍给他。原来他是“华人政务司”政治部的一个助手，当时王颇吃惊。

华人政务司，原名叫“华人保护司”(Chinese protectorate)是“保护”华人的。它的任务是统治华人，尤其注意华人的政治活动，最近它设立一政治部，目的在对付华人的地下组织和一些左倾分子。林把王的身份暴露给他，简直是公开告密，因此王很气愤，指责他，林则嘻皮笑脸地说：“你别像鸵鸟罢，政治部对你们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想和你们合作哩。”王问他什么意思。林说：“政治部愿提供你们经费，给你们几个领导人的高薪待遇；如果你们肯和它合作的话。”我们的条件是：争取公开，合法存在。至于什么经费，什么待遇，我们统统不要。我把这意见告诉林，过了几天，忽然政治部传王去谈话，原以为这是“合作”谈判的开始，于是欣然赴约。

这一天，接见王的是该政治部主任，一个英国人。他不谈“合作”问题，只是谈些时事。

不过，这次谈话虽然没有提到“合作”问题，但是气氛还是融洽的，因此我们有种错觉，以为这不过是序幕，后面还有文章，从而我们更加放胆地干，到处开会，甚至发动群众作示威游行。

有一天晚上，为了布置群众大会，我们在“业余话剧社”召开座谈会，邀请怡和轩俱乐部的林茂盛、庄惠泉和施方平等参加。正在讨论时候，突然来了一大批警察，可是警察呆了不久又驱着囚车回去了。原来警察是要来抓人的，只因几个“民先”的领导人在场。恐怕抓起来有伤他们的面子，故而放过我们。

经过这次的警告，我们还是泰然处之，继续扩大宣传，继续发动募捐。关于这一层，我想更具体地说明如下。

所谓募捐，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有一次捐献几千几万的；也有一次报效几角几分的。前者来自中上阶级，其数目大，笔数少，后者来自一般劳动者，其数目小，但笔数多。当时，在新加坡有种夜市，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时候，它们星罗棋布地排列在大坡如戏园街、小坡如铁巴杀一带，出售着各种各样的食

物：从香烟凉茶到酒肉鱼鲜，应有尽有，价廉物美。它们是劳动大众的露天食场，又是一些口厌珍馐的头家们来这里换换胃口的场所。

自从发动普遍募捐以来，这里的食物摊更番地挂上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为赈济祖国难民，本摊报效一天”等字，顾客们一看，心里明白。他们有的以十倍、八倍的代价购买他的东西；有的零头不找，把整张钞票塞进一个小木箱里。这个小木箱是从筹赈总会领来的，上面封固，钞票放进去，不能拿出来。到了第二天，摊主把它送到筹赈会启封，不管卖得多少，扫数捐献出来。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普遍募捐，固然是为了筹款，但同时也为了普遍宣传。我们把那些“讲故事”的都发动起来。他们以讲故事为职业，讲的人大多是老枪、瘾君子，白天无事可做，到了夜里，他们分布在各条静僻的马路上，大讲特讲其《封神榜》、《西游记》之类的小说。他们的听众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当工余饭后，十个、八个或几十个，聚拢来听他们演讲。这时《封神榜》、《西游记》他们不讲了，代替的是东北义勇军抗日，或者八路军大战平型关的故事。他们的语言通俗易懂，而且他们绘影绘声地描述了八路军如何英勇杀敌，如何歼灭日寇精锐板垣师团的经过，使听的人大受感动，从而唤起了一般华侨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这对于普遍募捐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但是，当时募捐的款为什么要交给资产阶级的筹赈总会，而且听任它交给南京政府？这问题一提出，群众纷纷抗议，反对统筹统汇，要自筹自汇——把自己捐到的，直接寄给真正抗日的八路军或新四军。但有如下几个问题：(1)筹赈总会负责人是英政府提定的，别人恐怕不行；(2)如果另立筹赈会，势必破坏刚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3)马共中央领导人之一莱彻(此人后来叛变，出卖同志，被马共的打狗团打死了)刚从中国回来，据说王明告诉他，统战工作要紧，不在筹款方面。因此，最后还是维持现状。

不过，到了后期，我们还是自筹一笔款，购买一些药品和救伤车送给八路军。

总而言之，“抗援”（或马抗）在这时期的工作还算顺利。

“抗援”遭受了打击

一九三八年间新加坡发生电车罢工风潮，僵持甚久。电车工人中有许多华工和“抗援”分子。为预防当局藉口来打击我们，我们想居间调解。就托怡和轩的人出面调解。他们满口答应，可一直没有回音。我们等来的却是政治部传王炎之谈话。

这一天，一个满脸横肉，立眉竖眼，两只胳膊毛茸茸的英国人接见了王。他在王曾与政治部主任会面时，露过一面，算是认识的，因此他很客气地对王说，主任不在，请王到他办公室坐坐。结果，王从八时等到九时，连催他几次，他总是说，再等等。王只好等着，听任他摆布。

直至十一时许，他才拿出“花连”（拘捕票）来给王看，说：“你被捕了。”说着，他又拿出张表格，要王填写，并给他拍照。然后由两个侦探挟着王登上汽车，把王送进监狱。

监狱里面阴森森、黑魑魑的，白天要开电灯。一个狱吏正坐在小方桌旁边写字，他一见，把王的姓名、籍贯、职业等等登记完毕，然后拿出一套囚服给王调换。这囚服是赫赤色的，非常结实，但没有钮扣，也没有裤头带，据说是防备囚徒自杀——吞下钮扣，或撕破衣服吊颈自杀而特制的。

换了囚服之后，王被驱进一间黑房，里面有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约二三丈高，屋盖穹然，俨若窀窞那样。它的周围都是厚厚实实的砖墙，房门也是封铁的。只有靠外一个小窗，门下一个小洞，是用来通空气透阳光的。此外有一只便桶，一条线毯，再没有其他长物了。

它的天花板上虽然也安上了电灯，但经常不开，因此，白天

像黑夜，黑夜又像白天。只有早晨四时，铃声一响，才把监房门打开，让各个囚徒拎着便桶，排列成行，像谒祖进香似的，到外面去倒潦便溺。王入狱第二天，曾参加过这样的行列，但第三天就被豁免，是怕他和一些难兄难弟们接触，透露了什么消息。除此而外，每天还有一次“冲凉”(洗澡)，是集体的，但为了隔离王和群众关系，特地把王安排在一个小水塘边，自个儿洗。想把王孤立起来。但有些难友听说王是什么“爱国党”的领袖，他们自动地设法和王联系。他们有的在狱中服役，往往藉此机会，扫到王的监房前，偷偷地把消息告诉王——从门下通风洞传递进去，或者藉外边一条水管的传音，和王打起“电话”来。他们虽然不自由，但外间有人来访，从而王可通过他们把里面的消息传递出去。这么一来，我们建立了地下通讯网，而且建立得很好，始终未被破坏过。

一夜，王对面监房有个杀妻嫌疑犯告诉王说，他白天去过堂，沿途静悄悄的，商店关门，菜市歇业，马路上连一辆黄包车也没有。他很奇怪，后来问一个“财富”(书记生)才知道当局抓了一个“爱国党”的领袖，新加坡全罢工、罢市了。

过了几天，“抗援”的粘文华同志、辜俊英、苏棠影同志亦被抓起来。这时我们四个人仍被分别关在黑房里，只有“冲凉”时候才能见面，王问他们关于外间的情况，他们所谈的大抵如下：

当王被捕之后，有数千群众去包围伪总领事馆，要求伪总领事高凌百向当局交涉释放。这家伙是个蓝衣社头子，平时和我们作对，他怎肯为我们办什么交涉呢？群众见他不起作用，又以“马抗”名义打电报给英国殖民大臣要求释放，还是无效，最后才发动新加坡罢市、罢工、罢课。接着槟榔屿和怡保，亦举行群众示威游行，使当局颇为恐慌。它连忙通知中华总商会，勒令各商店复市。它说政府抓的不是什么“爱国党”领袖，而是共产党。谁同情他，谁就要受与共产党同一论处。这么一来，商店老板被吓坏了，他们纷纷复市。可是他们一面开门，店员一面关

闭。如此反复几次。有一度外间谣传，说我们已经被害了，当局怕引起骚动，准许来人访问，但只是见见面而已，不许交谈。为此，我们曾向监狱总监 (Superintendent) 提出抗议，但没有结果。于是决定罢食来表示抗议。

罢了一天，他们紧张起来，他们害怕群众，赶快和我们谈条件。首先要我们复食，保证一两天内解决问题。我们答应他，结束了第一次罢食。果然，第三天就有华人政务司的“大人”和政治部主任来问我们的口供。问来问去，问不出什么名堂，结果只好说我们是不受欢迎的人，将遣送我们回国。

我们一直被关了五六十天。按照过去规律，对待像我们这样的“不驯分子”，总是要多关几天，多折磨一番，然后遣送回国交给反动政府处治，我们有些同志就是这样牺牲的。然而对待我们不同，也许他们感到麻烦了。于是通知我们准备出境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被遣送回国

我们接到出境的通知书，但没有说明船名和日期，其用意是怕群众知道了，也许要举行欢送会什么的。

到了那天，我们四个人被装上一辆囚车，悄悄地送到码头，不料在这里碰到几个工人。他们说等了几天了。同志们热情，使我们感动。我们依依难舍地和新加坡告别。

我们虽然被通知为“终生驱逐出境”(Banish for life)，但在马来亚的这段战斗的日子，却使我终生难忘。

上海票据交换所十八年

朱博泉

作者早年留学美国专攻银行及工商管理系，回国后在银行工作多年并亲创上海票据交换所。

中国金融业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束缚，发展缓慢。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银行业已经很发达，而我国还没有一家自己创办的新式银行，金融市场被外国银行所垄断。到1857年才办起了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此后，新式银行逐渐出现。1904年设立了沪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1912年改组为中国银行），1907年设立了浙江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等，银行才雨后春笋般地大批涌现，到1932年底上海共有大中型银行五十六家。上海虽然拥有这么多银行，可是在金融界中，旧式钱庄的势力依然很大。银行同业间的票据清算被钱庄所操纵，而清算方法则很落后。

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

1933年前票据清算状况：

1933年前，银行的资力比钱庄已占显著优势。以资本额而言：28家会员银行的资本为9814万元，28家非会员银行的资本为1892万元，合计11706万元，而62家汇划钱庄的资本为1793万元，大大少于银行。以存款而言，56家银行存款共85081万元。而钱

庄只有16251万元。银行放款共62882万元，钱庄只有15790万元。存放款都是大大低于银行的。然而在当时，金融界中的传统势力，钱庄仍占有优势。如洋厘银拆行市的升降、掌握在钱业公会手里，每天两次行市都在钱业公会开市，头寸多缺，都要到那里去拆进或拆出。至于同业间的票据清算，完全集中在汇划总会。汇划总会是钱业公会的隶属机构，是专门为同业间票据清算而设的。清算方法，在1900年经过改革，采用了公单清算制，虽比过去有很大改进，然而手续仍相当繁琐。如：

钱庄同业间的清算，必须经过“送银票”，“轧公单”两道手续。第一道“送银票”，即持有应收票据的钱庄，于每日2时后，3时前，由栈司或学徒持票据分别到应付钱庄照票，换取公单，即出票钱庄出公单，收票钱庄进公单。这种公单实质上等于出给应收钱庄的凭证，备集中轧帐之用。公单上的银数以500元为最低额，500元以下称“尾银数”，由两庄自行清算，定期结清。这种“送银票”的办法，每到期头，即逢五、逢十、月中、月底，票据大增加，分送面广，栈司你来我往，繁忙不堪，浪费大量人力与时间。第二道“轧公单”，每晚7时，各汇划钱庄将收入的公单登帐计算完毕，集中送交汇划总会，由总会汇总，相互轧抵、结出差额，然后发出划条给各汇划钱庄。差额轧多的钱庄，凭划条向应付钱庄收款；轧缺的钱庄，凭划条照解。缺单的钱庄可事先在钱业市场上向多单钱庄拆进，借以平衡。这种清算方式仍不脱离旧传统遗留下来的手工业式清算方法。如果遇到错帐，汇划总会人员轧得满头大汗，苦煞！汇划钱庄人员等到深更半夜，急煞！

银行同业间的清算，由于自己没有清算机构，要依赖汇划钱庄代办。即银行先要在汇划钱庄开设往来户，把每天客户存入的各式票据，全部解入钱庄，钱庄将这些票据进行整理，应付单位属于钱庄的，按照上述“送银票”的办法，换取公单。如果应付单位也是银行，还要到银行换取钱庄抬头的划条，再到钱庄照票，换取公单。然后，到晚上一并解交汇划总会。

这种清算方法，给银行带来许多不便，银行资金的命运，操纵在钱庄手里。万一市场银根突紧，或遇到金融风潮，钱庄拆不到头寸，银行便有被累倒的危险。这种清算方法不仅落后，而且对银行不利。

为筹办票据交换所创造条件：

根据银行公会章程规定，票据交换所是银行联合准备会兼办机构，两者不可分割，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是一个机构。但当时联合准备会还没有成立，所以要表述票据交换所的创建过程，还得先从联合准备会谈起。因为建立了联合准备会，才为筹建票据交换所创造条件。

1921年我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银行及工商管理系为研究生。毕业后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因此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银行管理及票据清算有所了解。回国后，感到国内政局很不稳定，民族金融资本的商业银行基础也不扎实。它没有资金储备机构，没有调节资金来源，遇到金融风潮，容易遭受打击。特别是同业间票据清算制度落后，银行与银行之间的票据，自己没有清算机构，要依赖钱庄办理，在国外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按理，银行是一种新兴的金融机构，资力比钱庄雄厚，管理比钱庄科学，反处处受钱庄掣肘，似更不甚合理。为此在遇到金融界前辈李馥荪、陈光甫、钱新之、徐寄庾等人时，彼此也常谈到此事，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建立自己的资金储备和票据交换所。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剧烈地冲击着世界各地。1930年逐渐波及上海，对外贸易，输入激增，出口锐减。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入我国东北三省后，上海银根渐紧，洋拆提高。这种态势，引起了银行界的震动、忧虑和恐慌，感到迫切地需要建立一个联合准备会，以便调剂银行头寸，抵御危机袭击。

在资本主义国家，商业银行遇到资金困难，可以向中央银行贴现或抵押借款。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系1928年11月1日成立，资力薄弱，羽毛未丰，号称资本2000万元，资本来源，

全部以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预约券抵充。它在外滩15号的房子，产权原来是华俄道胜银行所有。中央银行为了买这幢房子作为行址，用去预约券200万元。那时李馥荪担任该行清理处清理员，我担任副清理员，知道此事底细。所以商业银行要想依靠中央银行调剂资金，它是无力解决的。唯一办法，只有自己筹办联合准备会，筹集资金，才能有备无患。经银行公会召集会员银行讨论，决定由南三行（浙实、浙兴、上海），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着手筹备，并取得中国、交通两行支持，终于在1932年3月16日正式成立。它的全称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由28家会员银行推派代表11人，组成委员会，公推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中国银行经理贝淞孙、交通银行总经理胡孟嘉、四行储蓄会经理钱新之及浙江兴业银行常驻董事徐寄庠为常务董事，李馥荪为主任委员。经理一职，公推我担任。

联合准备会成立后，由会员银行提供不动产和有价证券，交给准备会作准备金。准备会聘请中外专家估定价值，以7折发行“公单”给会员银行，各行如遇头寸短缺，可按“公单”票面金额向联合准备会申请贷款。同时联合准备会本身转向中国、交通两行提供担保品，作为透支担保。透支金额为法币2000万元，中国银行担负六成，交通银行担负4成，以当时黄金市价每两90元计算，约合黄金22万两，可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于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联合准备会成为支持商业银行的有力机构，不仅为各行资金短缺时，解决燃眉之急，并为筹办票据交换所创造了有利条件。

筹备期间的小波折：

关于设立票据交换所，早在1918年已经列入上海银行公会章程，1922年银行公会以上海地区银行业务日益发展，同业收付日益繁忙，提出组织票据交换所筹备委员会，拟订章程草案的动议，由于各行习惯不同，意见不一，没有行动。以后在1923、1925、1926三年中重提旧议三次，由于没有一个机构具体负责，仍然搁浅。

这次联合准备会成立，解决了同业间资金调剂问题。但是市

场银根渐紧，银行票据通过钱庄清算，感到风险太大，很不放心，对于由银行自己独立成立票据清算机构的要求，产生了迫切感。同时票据交换所是准备会隶属机构。大家又知道我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票据交换工作，是一个筹备的理想人物。有了机构（指准备会）有了人，筹备票据交换所的时机和条件完全成熟。所以在联合准备会成立后不久，即受同业公会委托，决定由中国银行副经理程慕灏、交通银行副经理陈慕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杨介眉组成三人小组，责成我具体负责筹备票据交换所事宜。

我是联合准备会经理。当然责无旁贷。另外，我在纽约花旗银行曾一度参加过票据交换工作，对于交换所机构组织，清算方法，已有所了解。因此，对这一机构很感兴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早已设立了票据交换所。如伦敦票据交换所成立于1773年，它是世界票据交换所的鼻祖，纽约交换所成立于1853年，巴黎交换所成立于1872年，大陆交换所成立于1878年，柏林交换所成立于1883年，东京交换所成立于1886年，唯独我国，独付缺如。所以筹办上海票据交换所，改变上海清算的落后面貌，是我多年所盼望的。现在筹备工作交给我负责，我便欣然从命，全力以赴。

筹备工作，按说并不困难。然而却遇到了意外阻力，以致一时难以进展。

所谓阻力，先要从票力谈起。什么叫票力？这是银钱业中早已存在的一种传统惯例。凡是同业间往来，每天票据收付，现银收解，都要付给栈司力钱，这种力钱。就叫票力。票力分两种：同业付单力，外行付双力。单力每千元小洋七角，双力十四角，（那时一元银币可兑小洋十二角左右）。那时栈司的工资少得可怜，而每月票力收入却为数可观，有的超过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银行票据交换所成立，实行集中清算，收付差额，都通过转帐处理，那时，栈司便失去了票力收入，这对栈司来说是个很大打击。栈司为了维护票力的既得利益，推派代表，出场反对，以

致影响筹备工作的正常进行。

为了解决问题，首先针对票力问题与代表进行磋商。经过半年的反复谈判，最后达成一致协议，即以过去十年的票力为根据，查核票力的总金额，统计栈司总人数，得出每人每月的平均数，作为栈司每月的工资标准，由各单位按此标准自行调整。这样，一场小波折才迎刃而解，筹备工作就迅速进行。

崭新的清算方法：

上海票据交换所于1933年1月10日正式开幕成立，它以崭新的交换方法，完备的清算制度，成为中国金融史上完全以商业银行自己的力量创办的新型清算机关。新址设在香港路59号，这是一幢新建的银行公会大楼，交换场设在楼底层的大厅里，中间悬有“金融枢纽”匾额。每一家交换银行有一只交换台，铃声一响，票据交换开始，行动整齐迅速，清算有条不紊。开幕后，引起各地金融界重视，纷纷来沪参观，旋即南京、杭州仿照成立，以后北京、重庆、成都、西安等各大城市也相继成立。

参加上海票据交换所的交换银行仅限于银行公会的会员银行，开始时只有32家。交换票据有本票、支票、汇票、汇款收据等四种。交换时间每日两次，第一次交换下午1时起，第二次下午3时半起。参加交换的银行，应预先在银行联合准备会开立交换存款往来户，为应付交换差额的准备。准备会将交换银行存入的存款，转存中国、交通两行。1936年1月28日中央银行加入交换，交换存款以四、四、二的比例，分别存入中、中、交三行，由三行分担代理交换所收解事宜。交换银行支用存款时，由准备会开具“转帐申请书”，此种“转帐申请书”只限于交换银行之间相互划拨之用。如果某一交换银行当日发生头寸短缺，可以提出担保品向票据承兑所拆借。

票据交换所由于它集中清算，手续简捷，方法科学，不仅减少了原来通过汇划钱庄的环节，而且节约了人力时间，减少了大量票力清算费用的支出，深受各银行的欢迎，申请参加交换的银

行逐渐增多，因此又增办了委托代理交换及代收外行票据业务。到抗战前夕，上海参加交换的银行共73家，其中交换银行42家，委托代理交换银行31家。

上海票据交换所的成立，虽然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换所落后许多年，在国内毕竟是最早的一家。它对票据清算制度的改革，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二、维护金融矢志不渝

安定“孤岛”金融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11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四周被日军占领，租界犹如悬浮的“孤岛”。不久，中央、中国、交通三家总行奉国民党财政部命，西迁汉口，后迁重庆。三家分行留沪继续营业，然而业务范围已大大缩小，不再担负交换存款的收解事宜。但上海是一个大城市，一天中，成千上万张票据，千千万万元的巨额资金，不断地在社会上、金融界中流转，反映着上海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脉搏。这种运转形成了这样的机制：商品市场离不开金融业，金融业离不开票据交换所，交换所清算一旦停止，整个商品市场和金融业将会发生严重影响。在这种形势下，联合准备会和票据交换所为了维持上海“孤岛”金融，保证商品市场和货币信用渠道的畅通，毅然担负起过去中、中、交三行所担负的责任，独立承担交换存款，办理同业拆放，调剂交换银行头寸，努力维护上海金融界。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片土地后，千方百计掠夺中国物资。当时上海大量流通着二角一角五分镍辅币。镍是军用物资，日本侵略者岂肯放过。它们利用奸商代日寇军部收购，扰乱上海金融。1939年初，上海市场流通的镍币，突然稀少，市民开始还以为是由于法币贬值，人民收藏镍币不肯使用所致。后来镍币被日寇搜刮殆尽，市场流通绝迹，零找没有着落，有的用邮票代

替，有的擅自印发代替纸券，小小辅币，激起了大大波浪。票据交换所为了维持金融市场，保证辅币流通，接受中国、交通两分行的委托，及时发行铝制辅币，恢复了市场辅币的正常流通。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使用的铝辅币。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中地区对法币采取利用战术，把华北华中的法币大量集中，运到上海，按官价夺取外汇，于是上海外汇黑市突起波动。国民党财政部于6月22日再度限制提存，于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银钱两业为应付局面，加强准备起见，通过决议，委托票据交换所对各行庄订定“同业汇划领用办法”，供给同业资金总额定为旧法币5000万元，原来通行的汇划隔日可提现，此项汇划，只用于同业间转帐，不能兑现，金融市场才得以稳定。每天票据保持正常交换，尽到了调剂金融、安定市场的作用。

忍辱负重，留沪支撑：

1940年3月日本抬出了国民党副总裁大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府。5月颁布了伪中央储备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积极着手筹备。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为了罗致商界名流，特派岑德广邀我参加，被我一口拒绝，这是敌伪第一次对我的挑战。当时有几位朋友劝我暂时回避，谨防暗算。我认为拒绝是理所当然的，在租界上他们还不致于胡作非为，所以处之泰然，并不介意。哪里晓得果然不出朋友所料，在11月29日我乘车经过定盘路（今江苏路）华山路口，突然一伙手持手枪的家伙，拦住去路，不由分说把我绑架而去（见1940年11月30日《新闻报》报道），幽禁在不知何处的房子里，看守严密，失去自由。经金融界人士努力营救，十天后，才获释放。这件事，社会上有各种传说，有的说我是被流氓绑架去了，有的说被日本人抓去了，渲染得有声有色，煞有其事。其实都不是，事后才知道因为我拒绝参加伪中储行，周佛海密令“七十六号”特务干的。

上海金融界名流对我被绑一事，反应灵敏，预感到前途不

妙。不久，汪伪果然发出“通缉令”，被通缉的有十余人，第一个便是李馥荪。当时李馥荪隐居在上海，受到英国人士的保护。在这种形势下，他不敢再留在上海，于1941年3月秘密离沪。行前，一再嘱咐我要尽力维护上海金融同业的利益，保全联合准备会及票据交换所，遇到困难，多和徐寄庾、周作民、叶扶霄、陈朵如等人商量。钱新之也从重庆写信给我，要我留在上海维持联合准备会和票据交换所，不要被敌伪攫取。他们两人的嘱托，使我感到责任突然重起来了。不久，徐寄庾、周作民也相继离去，我可商量的只有陈朵如、叶扶霄两人了。

当时我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亲戚朋友劝我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他们说：“知名人士都跑了，你留着干什么，上海是虎口，不宜久留。”可是如果走了，有负李馥荪等人的嘱托，如果留下，日后日子一定难过，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我便和陈朵如、叶扶霄两人商量。他们还是劝我留在上海，说：“联合准备会和票据交换所这两个机构很重要，别人撑不住，只有你才支撑得住。”他们两人都是金融界前辈。陈朵如为人谨慎，叶扶霄稳健老练，我是很尊重他们的。既然有这么多金融界先辈要我留下，我素来重信义，忠职守，为了维持上海金融，也就决心留下来了。

规避延宕周旋渡难关。

我决定留下来了，我的处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前后左右，都是陷阱。形势又变得突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事变发生，日寇侵占上海租界，接管了已停业的中国、交通两行，并强行改组。1942年9月，中、交复业。伪中储行指定吴震修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叶扶霄为董事；唐寿民为交通银行董事长，我为董事。1943年4月，汪伪行政院强行指定唐寿民、吴震修、叶扶霄、裴云卿和我为中储行参事。以上两职是接受，还是拒绝？如果拒绝，敌伪特务可能再下毒手，那时就没有人来营救我了；如果接受了，难免要受各界非议。但考虑到我受到金融界领袖的重托，负有维持上海金融市场的重责，迫不得已，姑且虚与委蛇，接受伪

方指定的名义。

再说1941年1月伪中储分行在上海成立。它几次向我要求在票据交换所开立往来户，都被我拒绝了。这样拖了几个月，到1941年9月，伪中储行态度强硬起来，正式要求直接参加交换。当时“七十六号”特务更加猖獗，枪杀中国银行职员，制造“中行惨案”，环境十分险恶，白色恐怖弥漫全市。但我还是坚决抵制，没有同意。当时又有亲友好心地劝告我，要审时度势，“孤岛”形势在恶化，当心再来第二次毒手，恐怕没有第一次那样好过了。同时伪中储行的压力越来越重，不祥的恐吓、威胁接踵而来，大有乌云压顶之势，再要公然拒绝，已势所不能。我急中生智，召开票据交换所委员会商讨应付办法，大家想出了一个敷衍的方法。

原来票据交换所有两种交换办法：属于会员银行，可以参加直接交换，非会员银行只能参加委托代理交换。伪中储行要求参加直接交换，为了不与它同流合污，取消直接交换，决议以交换银行增加，场址不敷应用为借口，停办集中交换，一律改为代收票据，分散收解，以示与伪中储行隔离，因彼此一视同仁，伪中储行也就无话可说。这种交换办法，从理论上讲是倒退，因为分散收解在清算方法和人力上都是不经济的。但迫不得已，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这样坚持了三年多，到一九四五年初，敌伪压力加重，要求恢复直接交换。同时原来参加直接交换的会员银行，也感到这种分散收解的办法，对他们很不方便。于是通过票据交换所委员会讨论决定，恢复集中交换，接受伪中储行为直接交换银行。但不到六个月，抗战胜利了，日伪垮台了，伪中储行也寿终正寝。

在太平洋事变后，到抗日战争胜利前，这段日子我很不好过。所幸金融界前辈和同业职工对我的信赖，给我精神上和具体工作上很大支持。我与敌伪采取能拒绝则拒绝，能规避则规避，能延宕则延宕的办法，与之周旋应付。同时票据交换所在当时金融

界中具有重要地位，敌伪不敢贸然吞并，深恐引起社会反响。因此联合准备会和票据交换所始终保持独立完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总算熬过难关，不负金融界人士的重托。

三、接收声中幸存

我是学习企业管理的，记得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要有事业感，对他所管理的企业要倾注着爱。”在那时我根本没有领会这句话中“爱”字的意思。后来在创办票据交换所时，在指导思想上要倾注全力，办出一点成绩来，但对它也无所谓爱或不爱。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我熬过了敌伪对我困扰的难关；一方面又被迫离开了票据交换所。这时我对票据交换所油然而生了爱，有点依依不舍。我才领会过去老师所讲爱字的感染力。说实在话，它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我对那里的人和物实在太亲切了。14年朝夕相处，一旦离开，就惦念着它，我真想经常去看看它，抚摸它，拥抱它。幸亏与我一起创办的伙伴，经常来看我，安慰我，告诉我票据交换所的变化。我以能经常知道它的一些动态而自慰，因此我也了解它在胜利后四年中的基本演变状况。

中央银行为了扩大它垄断金融的势力，在重庆时已经策划好，一旦抗战胜利回到上海，立即着手接收票据交换所，连人选也已基本内定，并觅定新址，准备建造新交换场，另开新帐。日本投降后，中央银行立即迁回上海。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兼任财政金融特派员，他向财政部长俞鸿钧汇报关于接收票据交换所的意见。俞对于是否要接收票据交换所，没有定见，既然陈行表示要接收，他也表示基本赞同。旋即贝淞荪受任中央银行总裁，兼管接收票据交换所事宜。贝原来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他与商业银行渊源较深，因此他的主张与陈行不同，认为不宜过多地干预商业银行组织创办起来的票据交换所，最好仍由民

间办理。张公权也支持这一主张，因此迟迟未动。

贝淞荪与李馥荪交谊素深，过从甚密，过去贝有事与李商量，李的意见贝是很尊重的。因此，他写信给尚在美国的李馥荪征求意见。李馥荪不久回国，仍担任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及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是当时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贝也是江浙财阀系统中人士。关于是否接收票据交换所一事，两人意见完全一致，都不赞成接收，后来与宋子文交换意见，宋也同意。在他们共同意见影响下，陈行改变了计划，只改组票据交换所委员会。原来票据交换所职工，听到要接收，大家惊恐异常，害怕失业降临。后来获悉不接收了，机构人员保持原状，一场虚惊，烟消云散，额手称幸。

不接收票据交换所，除上述主要原因外，还有以下一些情况值得一提：

第一、贝、李两人都是交换所创办人，交换所在经营中取得了许多成绩，对它已有一定感情，当然要维护自己亲手创办起来的事业。如果当时的财政部长仍是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也是孔系人物，那么，交换所的处境，又是另一种局面，肯定被接收无疑。

第二、中央银行在抗战期间极力扩展垄断金融势力，它已经控制了中、交两行和小四行，因此商业银行对它颇具戒心。李馥荪是银行公会理事长，代表商业银行利益。如果中央银行从接收票据交换所打开缺口，将来进一步干预商业银行，对商业银行威胁殊大，此着不可不防。所以李馥荪维护了交换所，也是维护了商业银行，有识之士，不难窥测其中奥秘。

第三、接收票据交换所，同时也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孔祥熙与宋子文本来存在着矛盾，而CC系与孔宋两派存在着另一种矛盾。潘公展是CC系人物，胜利后，担任了上海《新闻报》馆理事长。中央银行没有接收票据交换所，给CC系以可乘之机。在交换所委员会被改组后不久，《新闻报》抛出了一篇指责中央银

行没有对金融业加强管理的文章。表面上是借大亚银行倒闭作借口，暗地里影射不接收票据交换所，名义上是批评中央银行，骨子里是攻击宋子文和贝淞荪。当时中央银行发言人李立侠为了澄清事实，邀请全市有关新闻记者，举行招待会，强调了国家银行应当鼓励商业银行发展的立场，不宜过多地干预商业银行的金融政策，并且举出了改组票据交换所的理由与事实。经李立侠一阐明真相，CC系便无话可说了。

畸形发展下扩充：

票据交换所改组后，规定四行二局、华商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外商银行全部集中交换。原来票据清算，各自为政：华商银行有上海票据交换所，钱庄先有汇划总会，后来也创办了钱庄票据交换所，外商银行在汇丰银行集中交换，这种三足鼎立，互不沟通的局面，至此完全统一，可说是一大进步。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又悍然发动内战，通货继续膨胀，一片投机狂热，行庄畸形发展。

日本投降之前，上海有193家华商银行。其中在沦陷时期没有登记注册的，被中央银行视作“敌伪”银行勒令停业的有120家。继续营业的，锐减至73家。这些停业银行经过各种途径，重新开业，又复上升到217家，其中列为直接交换的行庄为50家，其余167家为委托代理交换行庄。那时的行庄很多是搞投机活动的，对于头寸的掌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些代理交换行庄由于不能预先掌握交换头寸，纷纷向交换所委员会要求参加直接交换，气势汹汹，大有不参加直接交换决不罢休之势。

当时交换所只有一所交换场，要217家银行全部参加直接交换，实在是个难题，形势又逼迫交换所不得不想方设法。后来想出另外增辟三所新交换场，共四所交换场，采取分组直接交换办法。1946年11月取消委托代理交换行庄名称，一律改称交换行庄，与原来的直接交换行庄一视同仁，无分轩轻，这一改进，确是打破常规的创举，满足了代理交换行庄的要求。这种规模宏大

的交换，在资本主义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可是这不是正常的现象，是这些行庄从事投机畸形发展的结果。到解放前夕，全市共有交换行庄238家，其中“私营行庄203家，官僚资本银行21家，外商银行14家。”加上交换所本身，合计238家，是上海金融史上史无前例的高峰。

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军费支出浩大，全靠滥发钞票支撑其摇摇欲坠的局面。通货膨胀如野马脱缰，一日数涨，通货膨胀也造成信用膨胀，各种票据满天飞，交换票据的张数与金额品随之激增，给交换带来巨大困难。解放前夕，1949年1至5月交换票据共达4140万张，交换金额达4,145,013万亿元的天文数字，真是令人咋舌。4月14日那天，中国银行收到的交换票据有21万数千张，派大卡车到交换所接运。办理交换的人员，一看就吓昏，一个通宵也整理不完。交换员工作繁重，连月不得休息，精神疲惫不堪，票据根本来不及复核。于是误解、误退、头寸误轧、错帐百出，退票成堆，弊端丛生，一片混乱现象，预示着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到来。

四、完整无损，还给人民

上海解放后，华东军管会金融处宣布接管上海票据交换所，并改组了票据交换所委员会，推选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为主任委员。1951年2月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接办，成立专业科办理交换业务，成为全市统一的清算中心。至此，成立了十八年的票据交换所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原中央银行总行迎接解放经过

李立侠

本文作者系解放前原中央银行总行行务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本文着重介绍原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解放前夕，如何摆脱国民党特务、军警的监视，投向人民的详细经过。

一、解放前夕的行务委员会

原中央银行总行于1928年11月在上海成立，第一任总裁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1933年宋子文辞职，继任的为孔祥熙，孔任职至1945年。孔以后依次担任过总裁的有俞鸿钧、贝祖贻、张嘉璈、俞鸿钧、刘攻芸等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央银行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胜利后，又复员回到上海。前后历时21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央银行总行的所有人员、帐册、资财等，全部完整地交由上海军管会金融处接管。由原行务委员会组织清理处负责移交，由金融处指定军代表派专人接管，全部移交、清理过程历时约10个月，进行得极为顺利。我是当时行务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对经过情况比较了解。

我于1945年11月从重庆飞回南京，在南京开过行务会议后，乘火车回到上海，当时我担任金融业务检查处长。1948年贝祖贻接任总裁，金融检查处并入稽核处，我调任稽核处长，一直到解放。在稽核处任内，我兼任过多种职务，如上海金融管理局长、

物资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棉花联购委员会主任委员、《金融日报》董事长、联合征信所主任委员等等，但主要职务，都是围绕金融管理和物资管理两个方面。

行务委员会的成立，是在1949年1月，蒋介石退居幕后，李宗仁代理总统，俞鸿钧辞去总裁兼财政部长职务，刘攻芸以副总裁提升为总裁，并兼任财政部长之后。当时和谈正在开始，刘攻芸接任中央行总裁，大量调动了人员，将原秘书处副处长范鹤言调任经济研究处长，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林崇墉调任业务局长，稽核处副处长高方调任发行局长，国库局副局长陈延祚调任秘书处。这次人事方面的大规模调动，说明刘攻芸对当时和谈形势是抱有成功希望的。

但由于蒋介石的反对，和谈终于失败，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渡江，23日南京解放。刘攻芸接到消息后，立即逃往广州。行前与我商量，要我以副总裁名义留在上海主持行务，我坚决不同意。于是他改变了主张，临时组成一个行务委员会，由中央行5个处3个局的负责人担任行务委员，并指定我与国库局长夏晋熊、业务局长林崇墉三人为负责人，主持会议。

当时，蒋介石还打算在上海负隅顽抗，因此希望中央银行总行留在上海，稳定军心和民心。在这期间，蒋介石在复兴岛曾召见行务委员会3个负责人，连同发行局长高方共4人。见面后，他对我们慰勉有加，希望我们坚持留在上海，不要离开。他还告诉我们，已通知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特别保护，如有变化，保证我们安全离境。接见时有蒋经国在座。

在蒋介石接见后隔了两天，汤恩伯就邀请我们在他家吃饭，由蒋经国作陪，并有警察局长毛森在座。此后经常由民政局长陶一珊与我们联系。当时陶一珊怕的是我们弃职先逃，因此经常打电话到银行问我们是否在行。其实我个人早已和地下党有长时期联系，并与夏晋熊、林崇墉每天碰头，约定在沪迎接解放。其他局处负责人高方、陈延祚、金国宝、张大同均一一征求过意见，

约定不走。中层干部也通过集体和个人谈话方式，作了安排，因此一切业务照常进行。我个人晚间化名住在八仙桥青年会宿舍，白天坐在总裁室办公，秘书长陈延祚坐在隔壁房间，经常通报情况。

5月24日上午，陶一珊通知我们，当天下午必须住到苏州河以北。我们知道情况危急，已下了全线撤退令。表面上我们还照常维持行务，并由秘书处通知苏州河北海宁路国库局收税处安排住处，一方面通知各局处负责人分散隐蔽。当晚我住在孙耀华（现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家中，安全渡过了最后一晚。6月25日解放军进入苏州河以南地区，第二日我们冒险回到外滩15号中央银行总裁室集中，与金融处负责人陈穆同志见面。陈穆同志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诸位都在，那就好极了。”事后知道25日下午江湾机场的确留有一架飞机，准备护送央行负责人飞往台湾和广州。

二、我与地下党的联系

解放前我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系人，主要是上海地下党负责人马纯古同志。纯古同志是我幼年时期的朋友。1926年大革命时期我在北平工业大学读书，当时北伐革命浪潮激励着我，抛弃了学业，回到武汉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我在武昌都府堤20号高师附小，和纯古同志一道参加革命工作。我原在武昌高师附小及高师附中毕业，这两个学校有长期的革命传统，当时武汉党的骨干，大部份是由这个学校培育出来的。如陈潭秋、钱亦石和刘季良，都是这两个学校的老师。1927年我在高师附小以会计和英语教师为掩护，和纯古同志一道朝夕相处，在白色恐怖下，为革命做了一些工作。这年年底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我在纯古同志掩护下，仓惶逃出武汉，经江西、南京而至上海，在南京和上海与纯古同志都见了面。后来我和胡风、王善继、朱企霞一起从上海到日本东京读书，纯古一直留在上海为党继续工作。中间虽然没有通

讯，但彼此都是很怀念的。

1946年我回到上海，纯古同志在报上看到我的消息，马上来看我，从此我们又取得了联系。他经常来银行找我，有时到山阴路千爱里我的家中，我知道他当时还继续在为党工作。关于他的真实情况我和任何人均未谈过，包括对我的爱人，我也只说他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只有胡以平同志知道此情。因1927年我在武昌时，他和我们是在一起的，有时我们三人聚在一起，畅叙过去的友情，感到十分兴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我在东京筹组“中华留日同学会”，是负责人之一。该会在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并募集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1932年又与方瀚、胡风、王达夫、杨玉清等，组织“留日学生读书会”，并接受日本共产党领导。1933年我被日本警视厅逮捕，以抗日分子罪名驱逐回国。1949年解放前夕，胡风因被国民党上海警备总司令部搜捕，避藏我家一个多月，由我送往香港转道解放区。

我在解放前夕所保存的物资中，主要有“国棉联购委员会”所收购留存的棉花约25万担，还有中央银行物资委员会所保存的全部美援剩余物资。当时我任物资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述曾同志为业务局副局长兼任副主任委员，我们配合密切。解放前夕我把全部物资帐册及所存仓库地点交由孙耀华同志转送地下党审阅，并注意保护。

孙耀华同志是我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好友，我们在历史和思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抗日胜利后，他在“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工作，经常见面。1948年起，由于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盼望早日迎接解放。孙与地下党一些同志经常接触。我将中央银行高级负责人夏晋熊、林崇墉、高方等介绍与孙熟识，以便进行工作。并在1948年下半年，通过他去香港与许涤新同志建立联系。在此期间，我先后在“上海青年会”及工商界和爱国人士中，作过多次讲演，要求本着爱国精神，留在上海，不要逃亡，为今后祖国的

建设贡献力量。我还特别邀请过当时金融界主要负责人徐国懋、王志莘、项叔翔等商谈，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特别是徐国懋同志，他在当时及以后许多工作中，都给予了我很大帮助。

以上这些活动，均在事前和马纯古同志研究过。

三、解放初期的一些情况

解放初期，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山，在召集旧金融业从业人员讲话中，表扬中央银行主要负责人坚决拒绝乘国民党留下的飞机逃亡。1949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同志来电，通知我去北京总行。南汉宸曾于1931年左右到日本游历参观，由于孟宪章的介绍，我在东京曾为他做过向导。在会见南汉宸同志时，我详细汇报了上海中央银行总行移交和接管情况，并送给他一份书面汇报，深得他的赞赏。

接着董老（董必武）请我到他家吃饭。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还未成立，董老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管中央人民政府筹建工作。在他家吃饭时，有邓初民、谭平山、孟宪章等人在座。董老和我在重庆熟识，他在吃饭时称我为有功人员。实际上我到北平，是由董老指示南汉宸同志拍的电报。我和南汉宸同志见面时，他告诉了我这个情况，留我在北平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并明确说明要我担任计划处长，这时计划处长是由业务处长曾凌兼任。但我在沪已接受上海纺织业同业公会秘书长职务，因此很感踌躇。我说要先回上海看看，他以为我不愿意留在人民银行。次日董老叫他的秘书来招待所看我，留下一张条子，叫我到中财委担任组长工作。我立即去见董老，说明我不是不愿意去人民银行，而是想先回上海看看，并把家安顿一下。回上海不久，我在南汉宸同意下，在上海担任了金城银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金城公私合营后，我继续在北五行联合管理处担任业务部经理，迄后又回到上海人民银行担任会计处副处长等职务，先后又工作了

30年。

我本来在解放后是打算转入纺织工业的。解放不久，我和孙耀华就邀请刘靖基在汇中饭店与许涤新同志见面，谈了上海纺织业的详细情况。不久马纯古出任劳动局长，当时纺织业正苦于劳资纠纷难于应付，我又约请纺织业负责人刘靖基、郭棣活、荣毅仁等在我家里向纯古同志汇报了纺织业的困难。纯古解释了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鼓励纺织界领导人加强信心。我在纺织业同业公会期间，曾邀请马纯古和由京来沪的南汉宸到同业公会作过公开报告，讲述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起到一定的安定作用。

1950年初，上海纺织业同业公会改组，我趁机离开同业公会，转入金城、中南两行联合经营的新裕纺织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几个月后，我又应金城银行之约，兼任金城总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金城公私合营后，我即辞去新裕纺织公司职务，又专心一志回到金融业老本行。

戴笠与重庆豁庐

张 成 信

豁庐是军统在抗战期间设在重庆的绝密机构——密电研究组所在地。作者曾在该机构中工作多年，对该机构的创建、发展及组织情况，知之甚详。本文重点介绍了抗战期间，军统头子戴笠如何创办、发展该组织以及如何利用密电机构破译各方情报的种种内幕。

“豁庐”位于重庆市神仙洞街94号。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有亭台花园、地下室，与枇杷山相连，居高临下，俯瞰长江，环境清静幽雅，是军统的一个绝密机构——密电研究组。它是戴笠“事业”膨胀的发祥地，是军统工作重要组成部份。该组化名叫“徐图成”，对外佯称“徐公馆”。那里不通信，不会客，家信往来，通过检查获准，允许以林森路海关巷1号投转，军统内部的公务接洽，指定在枣子岚垭“漱庐”。官佐勤杂人员，使用特制的出入证。

抗战前军统第四处的电讯机构开始只有破译密码的萌芽组织，以竺烈民、邱沈钧、季直、王怀仁、刘宝岩、蔡锡燧等少数人员，从事对国内非蒋嫡系军政往来的简单密电侦抄检译，猎取情报。抗战开始后，戴笠密使驻美使馆的助理武官肖勃，在美周旋活动，重金聘请曾在美国防部工作过的黑室负责人雅德费少校

来华，协助军统培训密码破译人才，协议合同，为期一年；雅氏于1939年初，抵达重庆，对外以“国民政府顾问”身份作掩护，化名奥斯本（OSBERN）。“密电组”组长由魏大铭处长兼任，雅氏专管培训和破译业务。

密电组下设研究、侦察、总务、统计各股，股长分别是陈祖舜、陈舜齐、何智，（以后是吴灿英）、周行素，另有翻译官室（王震寰博士负责文字翻译），阎实、张笑湖担任语言翻译，还有专员室，延揽精通日文的人，充任专员，计有：关振铎、夏隆坚、张铭勋、张顺理等都是留学日本的，担任研译业务。设置侦收总台，开始配设在遗爱祠通讯总台内，因扩充需要，迁往汪山放牛坪原中苏情报台旧址；在上饶、洛阳、西安、桂林等地建立侦收支台，（当时对外诡称为军委会办公所电讯工作队），截抄日本及国内密码电报。研究、统计人员除竺烈民等外，军统有关的上层人物，如侍从室魏汉楚介绍中山大学毕业的魏林、魏缙宪；唐纵介绍其族人唐宣明等；并从武昌、长沙、金华三个电训班和临澧、黔阳、息烽三个特警班电讯系选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仪表端正、粗通外语的优秀生共40余人，共同组成这一“特种技术”研究机构的。笔者就是“长沙大火”后，由临澧迁到黔阳，被选进入的。

雅氏以他自编的密码分析课本《ANALYSIS OF CIPHER》，和世界各国密码演变沿革及其文字特性、频数规律等基础知识，为授课内容；总、支台侦获日本陆、海、空军密电的现实材料，作研究分析对象。雅氏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并不比他们白种人低，感到满意。同年夏秋间，发现日本海军密电，是使用50个密钥作指示（定为50指标），循环移位，以后日方突然更换新密本，未竟破译之功。从而掌握其通报格式和发展趋势。当时对日本陆军尤其是华中侵华军司令部对所属ヤマコカワ系统，往返电报能有大量的侦获，但全都是阿拉伯字母的四字一组，最后已是五字一组的乱数加码，虽从前线获得过这种密码本，长时间的统计分

析，求不出密钥的所在。当时中共重庆办事处，拍往延安，报道社会上、报刊上的进步言论，也是使用成语词汇作加码，现在还能回忆出来的如“密的乌云布满天空”、“敌机狂炸曾家岩”、“半夜吃黄瓜不知头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类密码，有其周期性，固定性，容易分析密钥的破绽，但日本陆军的乱数加码不回头，大大地增加了破译难度。

1939年春夏之交，在研究日本空军密码的同时，由绥远五原，解来俘虏飞机上电务员——野中正雄一名，连同使用的密表，为研究人员提供破译的重要资料，从野中的供述与侦获密电相对照，知道飞机上传递信息，时间性强，不像陆、海军那样复杂繁冗，摸索出它的变化规律，很快掌握其破译技术。曾假以航空委员会名义，设置“空军电信监察总队”。重点地派遣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监察分队，分别由陈一白、沈燕笙、冉一鹤、王惠民担任分队长，日寇空军的活动，都是受基地指挥部，临时用无线电下达命令，受令机群接到指示，空军电信监察队也同样收到，再转知有关防空监视哨所，施放空袭或解除警报，既迅速，又准确，从未失误或谎报过。

1941年是轴心侵略集团向东西战场疯狂进攻的一年。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前，东京、莫斯科与柏林之间的通讯，骤然打破常规，频繁紧张，显示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英国威尔士亲王号主力舰，自香港开出，正迅速地向东南海面的经纬线若干度方向行驶，日空军通知轰炸部队。我监察队侦获后，转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使馆情报官员们，竟一笑置之！珍珠港事变前，监察队同样截获其预谋布署，并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美方也是不相信，以后事实的证明，才为之折服，认为这些预告，是确有根据的。香港未陷敌前，英方主动邀请派遣香港监察队队长梁伯嵩，以后印缅战场上，协议派驻加尔各答队队长倪耐冰，仰光队队长希望继续合作，协同作战。

军统在侦译上的成就，在盟国方面，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继

英美之后，法国戴高乐政府，于1942年夏，遣派一个使者来华，住嘉陵新村半山腰的一幢两层楼房里，戴笠指派魏大铭前去接头谈判，我随魏去担任笔录，由军统海外区区长张家琪负责法语翻译，他提出要同我们搞技术合作，协助他们侦译维琪贝当方面的密电，魏提出维琪的密码编制与他们攻译情况，他支吾其词，看样子那人是个门外汉，谈了个把钟头，得不到任何要领。在返回途中，魏说：“法方是来对我们作试探，想在我们这里取经，我们在他们身上，是不会有大的收获，谈下去也是白费唇舌。”从此中断了接触。

戴笠自从有了雅德来为他培植这一支技术力量后，更是踌躇满志，一再向蒋介石表功邀宠。但他又担心，两个业务性质相同的机构：交通部密电检译所和机要室研究组。这两个机构分别由温毓庆和毛庆祥负责。这两人的来头，也不比他小多少，将来会出现什么结局，是难以预料的。这时他暗示唐纵，向蒋介石签报：把军统密电组、检译所、研究组这三个业务性质相同的机构，统一合并起来，达到力量集中的目的。此报告得到蒋的批准，于1940年4月1日，合并成立，命名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

合并后，“技术研究室”成为一个拥有官佐士兵300多人的一个庞大机构。最大的困难，就是住房问题，暂觅得学田湾“衡舍”一栋平房，抽调有关人员集中办理并后人员安排和事务性工作，各单位仍在原地待命。两个月后，迁往南岸黄桷垭、南山新村、大田湾、凉风垭等处民房，相距在一公里以内。

该室成立之初，表面上是按业务归口分工，实质上依然是自成体系，下设一室六组，一室即主任办公室，主任秘书王维钧，掌管人事、文书、印信和党务。党部特派员由毛庆祥兼；第一组组长霍实，负责对日文的翻译，有精通日文的张顺理、夏隆坚、关振铎、张铭勋、潘公舜等专员；第二组组长杨贻清，专门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第三组组长杨肆、副组长陈祖舜，研究日本陆军和

苏联密电；第四组组长方砚农，负责侦收国际、国内密电材料；第五组组长施家幹，管理总务及财经工作；第六组组长黄季弼、副组长黄绵民，研究以中共为主的国内密电。上述的分配布局，严重存在门户界限，从大体上来说：主办室和六组，属毛系掌握；一、二、五组属温系；三、四组属军统。名为合并，实则是各成体系。如杨肆“温系”，作了三组的挂名组长，依然蹲在二组办公，规定二组研究日本外交，而三组同样在研究，因侦收电报大权在军统，貌合神离，各自为政。

该室成立后，都想争领导权，论关系地位，势均力敌；温毓庆资深学优，有宋美龄、宋子文作后台；毛庆祥是蒋的机要大臣，又是姻亲；戴笠虽是蒋的心腹，但魏大铭资历浅，难孚众望。几经磋商，难以拍板定案，只好抬出资格较老的温毓庆出任主任，以毛、魏两人副之，缓和暂时矛盾。而温心中有数，深知论技术力量和人事关系，都是无法同毛、魏两方面作较量的，自己将是一个架空的挂名主任而已。命令发表后，佯装有病，得到“最高当局”的批准，去香港“治病”，从此一去不返，以后才又发表毛庆祥代理主任。

毛代主任后，军统的魏大铭不服，但又无可奈何？两人同床异梦，各怀阴谋，都想在蒋介石面前讨好立功，希特勒向苏联进攻前的预兆，毛庆祥就近抢先汇报，经证实后，深受蒋的嘉许，戴笠对此大为吃醋，无比愤慨，进一步施展特务伎俩，在人事上搞分化、闹对立，技术上严守秘密，封锁控制，乌云密布，势不两立。毛庆祥看清这一形势，认为先下手为强，偷偷向蒋介石打了一个小报告，指控军统人员，在该室捣乱不团结，¹¹得到蒋的批示：“凡属军统人员，限2月（1942）底前，全部撤离技术室”。戴笠奉令后，既承认斗不过国舅，又不敢违背领袖意志，乖乖地按期撤回。

戴笠对此突然被撵回，感到是莫大的耻辱，痛定思痛，将撤回的全部人员，另成立“特种技术研究室”，把室址分布在遗爱

祠、徐家坡一带，机构有主任办公室、技术审核指导委员会、国际研究组、国内研究组，设侦测总台于放牛坪，借“航空委员会技术人员训练班”名义，招收大专院校毕业或肄业的数理化学生，培训侦译人材，遣派黄淞、陈祖舜去英国学习雷达技术，朱耀龙去美国深造，凡此种种措施，目的是扩大范围，充实力量，企图与军委技术室相抗衡，挽回被排斥的声誉。上述分裂对峙局面，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

戴笠是一个大野心家，认为自己已有的成就，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印象，此时此刻，是投靠美帝的最好机会。他嗾使特务肖勃，在美大肆吹嘘宣传，果然得到海军情报署的赏识，指派前远东舰队舰长梅乐斯于1942年初来华，直接与戴笠接触谈判。美方对军统的侦译技术，早有所了解，他们的意图，想剽窃这一套秘密，特别是要为美海军第七舰队提供气象情报；戴笠的目的，要进行全面特务合作，帮助他训练特务，支援武器弹药，交通运输、医药……终于达成协议，签订所谓“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通称“中美所”，由戴笠、梅乐斯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其他组的人事业务情况不详，我知道第六组是侦译组，组长林国人。

1946年夏，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军统改称“保密局”，此时戴笠虽已坠机身死，但原军统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已窃居国防部二厅副厅长要职，由二厅厅长侯腾，签请把原“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与原军统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再度合并，归属二厅领导，成立一个“技术研究室”，获得批准。

二所技术室，由副所长魏大铭兼任主任，魏这时格外的高兴，把精力全部放在开拓与扩展上，首先对原军委技术室的人员贬职的贬职，轻视的轻视，促其自动地请假离开，独揽侦译大权于一身，实现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在业务上除原有的配套，予以调整加强外，增添编制密本和测向两个新的内容，下面将其组织、工作任务分别简述于后：

主任办公室——主任秘书金戈，含业务科科长张洛民、人事

科科长陆亚桓、总务科科长田德镛。

侦测总台——总台长于焯生，下属测向台有重庆台，青岛台，徐州台，西安台，武汉台，还有各地侦收支台。

侦测研判组——以日俘内川及中方人员共同组成，将随时截获解放军电台所属番号、驻地等，在精密的军用地图上，分析判断其动向，汇编为情报资料。

破译组——组长杨仕伦、方坦怀，研究以中共为主的密码电报。

“奸匪”电务研究组——组长张成信，组员是由战场上和被捕的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统一集中，另从南京卫戍总部电监科（科长肖茂如）抽调报务员4人，混杂在一起。利用他们离开原单位不久，情况熟悉，搜侦前线电台和地下组织。该组成立后，毫无收获，仍以这班人员为基础，改为“中央电监科”（原军统时代，没有主管电监业务的专教科，是由第四处第三科兼办的）。该科由笔者代理筹建后，1948年9月，调赵容德（又名刘醒吾）接充，同时发表我调西安。

密本科——专门编制部队使用的密码，每月更换一次，如被俘或发现泄密情事，密本作废，另行更换，每次由专人传送给剿总、行营转发使用。

各组、科、室除研译组为了保密并及时向蒋介石提供情报，迁往黄埔路官邸，其余都是驻在小营及附近地区，直到大陆解放。

有关军统兰训班的一段回忆

古 汉 民

作者曾为军统局兰州特训班第五期学员，后又参加了兰训班政训组。本文主要介绍了兰训班的成立、人员、组织、教授内容以及兰训班第五学期内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

军统局兰训班，公开名义是“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又名“军事委员会特训班”，1939年开办，地址设在兰州市黄河桥边的木塔寺和金天观，是军统局规模比较大、历史比较久的一个特务训练班，先后办了五期，总共训练了特务骨干约达8000人以上。各期学员的来源，除一部分是在沦陷区秘密招考，或由军统特务介绍外，大部分是以公开名义在甘肃、陕西、河南几省招考的。班主任是特务头子戴笠兼任，副主任先后有刘藩、王孔安、胡国振、廖华平、刘忠云等人，下设主任办公室（实际只有秘书一人）、政训组、教务组、总务组、总队部或大队部。学员入班后，前期为“入伍训练”，着重军事训练和思想考核，每个学员都要进行严格的思想审查，填表登记参加军统特务组织。这个时期一般要进行三个月，不准外出，不准与外界接触，过着军事法西斯生活，稍有违犯，随时都会遭到打骂、禁闭，甚至失踪。后期为技术训练和业务实习，课程很多，除照例的“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党派分析”、“中国近代史”等以外，主要的有“情报学”、“侦察学”、“行动术”、“爆破学”、“秘密通讯”、“内勤业务”、

“警政学”、“擒拿术”等。

我1943年参加兰训班第五期训练，这是最后的一期。这一期也是军统从“兴盛”到没落的时期，学员比任何一期都少，只有三四百人。副主任是刘忠云，秘书徐望宽，政训组长兼政治总教官是翁其法。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程一鸣为技术总教官，讲授“情报学”，路鹏（抗战胜利后任上海稽查处督察长）讲授“行动术”，兰州市警察局长讲“警政学”。另外还聘请当时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兰大前身）的不少教授来班代课或专题讲演。这些教授都是由于抗战期间，物价暴涨，生活艰苦，应聘而来，对兰训班的性质是不了解的。

我参加兰训班是在西安失业生活无着的情况下，铤而走险投考的。虽然失业，由于我在国民党军队政治部，已经爬上一个中校衔官职，对蒋介石还有一定的幻想，认为参加军统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又是“终身职业”，再不愁失业了。

军统为了培育大批特务，作为疯狂镇压人民的工具，先后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很多的训练班。据我所知道的，除兰训班外，还有临醴训练班、黔阳训练班、息峰训练班、中美合作所训练班、重庆训练班，后来在河南临汝也办了一个中美训练班，训练了大批特务骨干。这些训练班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每一个特务熏陶成为一个“为蒋介石而生”、“为蒋介石而死”，“做蒋介石最忠实的耳目”的奴才。在这些训练班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类的大型标语，当然，在所有的学员中，有些人是甘心情愿当特务，有些人进来后，知道上当受骗，但在威逼利诱下，只好干下去；也有坚持正义，不为邪恶所诱，公开表示不干，而结果不是禁闭就是失踪。我亲自目睹，有两个学员口出怨言，第二天就失踪了。

1944年戴笠到兰州，对兰州班学员“精神讲话”，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的工作特种工作，是一种非常工作”；一再强调“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要维护领袖的安全”；又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叫嚣。

兰训班学员的文化程度是参差不齐的。公开招生是高中以上程度，其实有大学的，也有高中的，还有初中的，而秘密招考和特务介绍的就更复杂了。有的是特务“外围”进来“渡金”的，有的是特务介绍的亲友。这些人不是“土匪”出身，也多半是鸡鸣狗盗之徒。由于戴笠对所谓“学生”特别重视，也助长了这些特务学员胡作非为，认为自己是戴笠的“学生”，“领袖的耳目”，自鸣得意，所以就为所欲为。国民党特务系统，各树一帜，军统、中统、宪兵，互相矛盾，互相倾轧上层如此，中下层争先效仿，寻衅闹事。例如兰州班学员每逢星期放假，遇着宪兵就找麻烦，打架斗殴，司空见惯。有一次在大街与宪兵争执，竟然围攻宪兵把手枪夺回，逼得宪兵营长来班要枪。还有一次，兰训班于七分校在兰州的一个总队在兰园比赛篮球，双方都整队观战，加上群众，人山人海。比赛中间由于裁判员处理不当，引起双方争吵，大打出手。有一个七分校学员，用皮带扣误打了兰训班的武术教官李国华。这个教官据说是少林寺的，有一定武功，一怒之下，把球篮拔掉作武器，竟打死七分校学员一人，打伤多人，连七分校的少将总队长也被打了。这一下双方真枪实弹严阵以待。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闻讯赶来也制止不下，一直到胡宗南由西安乘机赶来。由于胡宗南与戴笠关系密切，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戴笠这个人，是靠反共反人民起家的，他奢侈豪华与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是非常惊人的。抗战期间在蒋管区各大城市都有他的公馆，在重庆一地，就有十处以上的公馆和别墅，兰州市西关也建了一所豪华奇特的公馆，名曰“九间楼”，出兰州西门就看见耸立在小山坡上，一个半圆型的楼房，设计奇特，周围高出四面十几丈，只有一条柏油马路盘旋而上，里面苍松翠柏，奇花异草，应有尽有，耗费之大，在当时是绝无仅有了。1943年蒋介石、宋美龄来兰州就住在那里，平时由军统西北区派一排警卫常驻看守，居高临下，没有西北区批准，任何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1944年戴笠要来兰州，我被派打扫卫生去过一次。戴笠要来的头一天，班里要选派两名女学员到那里去当招待，谁都知道戴笠荒淫出名，见不得女人，女学员畏缩不前，纷纷装病，经副主任刘忠云再三动员，算是找了两个原来就是女特务的学员去了，结果戴笠在班里作了一个小时的“精神讲话”，又在九间楼听了西北军统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当晚就乘机走了，这两个女学员才免于遭难。

我在兰训班五期受训尚未结束，就提前留班在政训组工作，以汇编政工手册，得到副主任刘忠云的“赏识”。兰训班结束后，选调一批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接受美帝特务训练，其他都陆续分配到陕、甘两省军统各单位工作，少数的派往沦陷区去。接着新疆所谓“中央警官学校第三分校”迁来兰州，这个分校也是军统掌握，主任是朱绍良的女婿陈××，原来也在兰训班当过教务组长，是一个典型的不学无术的浪荡公子。三分校迁来学员不过200多人，而组织还是庞大的，我先后担任指导员、训育科长、政治教官。因平时没有什么工作，只讲授中国近代史，每周二节课，故想到继续完成大学课程。我经学校许可，又得到过去在兰训班代课教授的协助，先到西北师范学院，后又转到甘肃学院（离兰训班很近）插班就学，半工半读。

在兰训班结束，三分校迁来这个阶段中，军统局在兰州还办了一个边疆人员训练班。由姓林的老牌特务负责，在新疆招收了七八十名少数民族学生，年龄都在二十岁上下，有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民族。我也在那里任了课。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是由于过去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军统插手新疆，有一定阻力，张治中主持新疆事务后，军统大量伸入，大小特务涌进新疆，兰训班四期副主任胡国振任新疆警务处长，为了进一步把黑手伸入少数民族，才开办了这个边疆人员训练班。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是一个最反动、最凶恶、最庞大的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秘密组织，当一个人参加了特务组织后，只能是

“活着走进去”，“死了抬出来”，要想摆脱它的魔爪，是不容易的。今天，我感到万分庆幸，人民革命的巨流，冲刷了我丑恶的灵魂，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和解放全人类的宏伟事业，使我得到今天。

杨叔明反蒋倒王及策反 十五兵团起义经过

长 白 山

杨叔明解放前先后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检审委员、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兼内务部长及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顾问、国大代表、监察院监察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要职。本文着重介绍杨叔明解放前夕与刘文辉、邓锡侯、熊克武等人反蒋倒王（王陵基乃四川省主席）及策动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率部起义的经过。

1948年春夏，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展开反攻，蒋记政权摇摇欲坠。4月，蒋介石为了巩固他在西南的半壁江山，免去不执行他在四川调运十万石军粮任务的邓锡侯四川省主席的职务，而由他的忠实走狗王陵基继任。王陵基走马上任，暴戾恣睢，盛气凌人，制造了“四·九”血案，镇压学生。对四川军政人员及民选国大代表，多不理睬。他的征兵、征粮、在大巴山设防等多种方案，引起上下群怨。在四川上层社会，形成了一股反蒋倒王的势力。这原属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不同于人民革命斗争，但在客观上加速了蒋政权的土崩瓦解。加之，在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直捣华南，进军西北、西南的强大攻势震撼下，在我党地下组织策反工作的推动下，川康地方实力派也改变了自己的态

度，逐渐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向革命阵营靠拢。这又使反蒋倒王势力逐渐扩大，早被蒋介石视为“异己”的刘文辉，被免去省主席职务的邓锡侯，以及早被蒋介石排挤分割的潘文华等，都先后卷入了这反蒋倒王的阵线之中。

四川的这股反蒋倒王势力，从组织川康渝国大联谊会开始，利用合法机构作掩护，进行公开的活动。他们把国民党元老熊克武拥出来，利用他的声望，开展种种斗争。

杨叔明自回成都后，经几次和熊克武接触交谈，始知熊克武早已认定，无论道路如何曲折，解放军必胜利入川。他对杨叔明说：

“我所担心的是，恐怕那时王陵基与蒋介石布置的各部与解放军广泛作战，人民既遭涂炭，革命又受阻碍。我希望你能助我工作。你曾是国府部长级官员，又与众多军政界头目有广泛联系，还有国大代表等多种头衔，影响甚大。你若能助我缩短糜烂，为协助解放尽心尽力，乃功在国家，功在黎民。”

杨叔明说：“叔明前半生蹉跎歧路，为虎作伥。愿立功补过，以效犬马。”

当时，熊克武任川康渝国大联谊会主席，正在通过国大代表的力量，向蒋政权杀回马枪，为王陵基设拦路虎。他告诉杨叔明：

“我们现在要活动，尚欠凭借，心余力绌。我同我们民革的李蜀华下细谈过。我想，你同他都是国大代表，你俩尚属年富，还能热心奔走。以后望大家多努力，你约他随时到国大联谊会来，我们慢慢相机运用。”

自此以后，每周的国大联谊会，杨叔明和李蜀华必到会。他俩也随时到熊克武处去闲坐谈天，研讨时局，洽商行动。

1949年5月，熊克武鉴于西南解放形势渐入高潮，而蒋介石唆使王陵基压制川康，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便在国大联谊会上提名，公推杨叔明、李蜀华、黄瑾怀三人赴重庆，向西南长官公署

反映民意，以“治川无状，祸川有余”为由，请撤王陵基之职。与此同时，四川省参议会开会，亦同意此行此举，要他们三人亦代表参议会陈情。

杨叔明一行三人到了重庆，几经奋斗，仍为依附于蒋介石的西南长官张群（此时张群已改任西南长官）当面答复：

“王陵基的省长之职，是委员长所定，岂能轻去？唔？请诸君回蓉向联谊会及参议会解释解释。王芳舟确实有过，但人非圣贤，焉能无过！有过就撤，圣贤弗许！”

不得已，杨叔明同李蜀华、黄瑾怀便邀约重庆的吕超、罗承烈、冉仲虎等联名共同发起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省市参议员联席会，简称民联会，意为民意代表联席会议。他们三人与渝中人士联袂返蓉，开会数日，通过政治、经济、自卫等多起议案，推选熊克武、杨叔明、冉仲虎、向传义、黎可行、何宗杰、卿俊等20余人为常务委员，张惠昌为秘书长。并公推吕超、杨叔明、向传义、胡恭先四人携带省参议会弹劾王陵基案赴广州向国民政府提出控诉，请求务必撤换王陵基。

这是个秘密的决定，对外则宣称推定四个代表赴广州，是谋求安定后方、请拨金银稳定市场等事。四人中，杨叔明为国大代表，吕超为监察委员，向传义为四川省参议会议长，胡恭先为立法委员，他曾是西康省参议会议长，此时已辞议长职，但大家仍推他代表西康省参加广州之行。

经秘密商议，提出请撤王陵基后，建议就张群、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四人中择一任命，以维持四川局势。最初，胡恭先对推荐张群甚为疑虑，认为他是依附于蒋介石的。杨叔明向胡恭先解释说：

“我们不是真正推举张群兼任主席，不过是想利用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把王陵基推倒，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杨叔明四人来到行政院，先去会见何应钦。何应钦问明来意。吕超率先陈词：

“我们专程来粤反映四川民意。我们四人是川康渝民意代表联席会的代表。”他一一介绍说，“这位是四川参议会议长向传义。这位是西康省参议会议长胡恭先，又是立法委员。这位杨永浚你是认识的，当过监察委员和政务委员，现在是国大代表。我嘛，是监察委员。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省市参议员联席会公推我们来行政院控告王陵基，他措施乖张，荼毒川民，实在难容。……”

向传义插过话来：“他借设防大巴山为名，强迫额外征兵征粮；借维持治安为名，屠杀爱国学生和扣捕国大代表，故意向各方面挑衅，引起种种摩擦，川人恨若毒夫，视如寇仇，致使社会动荡，不安已极。若不早日更换，川局前途殊可危惧。当今之计，只有请张岳军（张群的字）长官兼任主席，才能挽回局面。”

杨叔明忙接过话头说：“如岳军长官中枢事繁，须时备咨询，不能兼顾川局，请由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中择一任命，秉承张长官的意旨办事，庶能安定川局，俾中枢无后顾之忧。”

何应钦只是听着，不断点头，待杨叔明说完，他向胡恭先问道：“胡先生的意见呢？”

胡恭先叹了一口气，说：“唉！川康唇齿相依，四川不安，就会危及康局。王陵基自任四川省主席以来，一意孤行，残杀无辜学生，扩大个人武力，增加百姓负担，以致萑苻满地，十室九空。现在，大难迫于燃眉，而王陵基还在挑拨生衅，实行其独裁政治。若不撤换王陵基，则川事不可问矣。我虽为西康人，但我省原为四川的一部分，两省人民休戚相关，不能缄默，我同意他们三人的意见，也是我西康人民的愿望。”

何应钦穿着笔挺的西服，夹着烟卷儿在地上踱着，半晌才说：“你们的意见，是忧国忧民的，我很同情。我当电呈总统核示，才能决定。不过见仁见智，当以总统之见为听。”

第二天，杨叔明一行又去拜见李宗仁。李宗仁以为他们是来为他捧场的，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还特意把白崇禧叫来同他们

四人一起笑谈、进餐。不料，席间杨叔明他们谈的都是反对王陵基主川的事。

“罢罢罢！”李宗仁一扬手，然后长叹了一口气，“唉，我是个无权的总统！爱莫能助啊，请诸位原谅。”言外颇有不平之意。

白崇禧则谈些他在前线的艰难困苦。李宗仁对他苦笑了一下：“算了吧，我的军事家，别叫娘了，我们都是被绑上战车的。”

四人宴毕回到旅舍，感到国民政府最高机关的两个首脑都无法解决四川提出的这个问题，要达目的，实在棘手。经反复商量，认为仍要继续向各方面揭发王陵基的祸川罪行，以造成对王的不利形势，然后再请张群去台湾面见蒋介石，或许还有希望。于是，他们先后去访问了阎锡山、陈立夫、居正等人，说明他们是代表川康渝人民之意，为请驱王任贤而来的。

广州之行未得结果，四人只得悻悻返川，向熊克武汇报了详细经过。

熊克武鉴于解放大军入川之势日益迫近，而不能驱逐王陵基，实为心腹之患。这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已有携手合作、协助解放之密商。于是，熊、刘、邓、潘诸人的目标已趋于一致。面对倒王不成，他们又另谋拒胡宗南入川，以使王陵基孤立无援。

不久前，省参议会也反对胡宗南入川扰民，并向胡宗南发电，请其部“不必入川”。熊克武趁此机会召集民联会常委会，公推杨叔明及李蜀华两人赴汉中，以慰劳胡宗南为名，实为阻止胡部入川，分化胡、王合作对抗解放的势力。而民联会中的国民党人，因怀疑杨叔明和李蜀华此行的用意，也推出沈重宇、任和平二人同往，实为暗中监视。

熊克武之所以选中杨叔明赴汉中，是因为此前杨叔明对此事就表示过明确的立场。那是两个月前，当省参议会反对胡部入川之电发出不久的一天，杨叔明接待了一位远方来客。此人姓林名树恩，新都人，是杨叔明的学生，曾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林树

恩不远千里，从陕西赶到成都，来托杨叔明代为疏通省议会中之青年党员同意胡部入川。杨叔明鉴于师生情谊，以礼相待，邀约了陶元甘等议员和他一起跟林树恩会谈，杨叔明在会谈中表示说：

“陕西胡部，我等不多了解，然先入川北之胡部风纪败坏，影响极大。我们仍望胡部自求改良，以免军民不协，发生变故。省议会中，我等青年党员议员人数太少，亦不能发生多大作用。至于胡部退入川省，实与民心及给养等情相逆。请转告胡帅勿作此图，以免不测，贻误军机。”

杨叔明有理有节、不亢不卑的谈话，使林树恩不便再有所求，只得沮丧而去。

正是由于有此前因，熊克武认为，这次派杨叔明赴汉中，必能成功归来。

熊克武又与邓锡侯商量，由邓出款，购糖万斤，以作慰劳之品。临行前，熊克武与杨叔明、李蜀华密谈，说：

“你俩此行，阻止胡部入川仅为手段，孤立王陵基之势方为目的。此谓孤其势以利驱其人。目下，唯孤王驱王，才利于解放。此行又有沈、任二人加楔作梗，望二位尽智尽勇，一切相机为动，谨慎而行。”

杨叔明与李蜀华、沈重宇、任和平四人组成的代表团启程了。沈重宇还带一新闻记者张善同行，以便随时发表消息。

到了汉中，数人各施周旋之巧，会谈、宴饮、参观，诸般表面应酬，应有尽有。胡宗南又要代表团对他的部队作一广播讲话，以鼓励士气。代表团推杨叔明去讲，杨叔明也不推却。按当时“国军”的立场应有的调子商量好稿子后，杨叔明到广播台，摆出反共老手的架子，大讲了一番慰劳致敬之辞，末了，他慷慨激昂地高喊：

“国是艰辛，匹夫不避！恳望各部将士奋勇向前，勿存后退之念。我们代表川人，再次向众将士敬致慰劳之忱！”

当时天气渐热，经几天慰劳，杨叔明和李蜀华都推说疲乏过度，累病了，要休息几天。沈、任二人没有耐心再等待了，又见杨、李二人反共立场未变，也就先行返川了。临别时，胡宗南送给他俩各手枪一支，盘缠200元。

沈重宇和任和平走了，杨叔明和李蜀华也没有病了，他们这才向胡宗南摊牌，自然又是以善于纵横捭阖的杨叔明为说客。杨叔明侃侃而谈：

“川省去今两年连年歉收，粮食难购，储运也难，征丁征夫皆极不易。前因胡司令先期到达川北之部属风纪不好，民众怨愤，反映到省参议会，故议会乃有‘不必入川’之请电。此种民心向背若未先行疏通，妥为处置，骤然开兵入川，势必发生冲突。那时，前后两方，若生牵制，至为不利。且王陵基言大而夸，贪婪成性，其所应允接济陕军之粮，至今毫无准备。若有急需，一时决难到手，岂非置人燃眉？何况王陵基又想提高川陕运价，实有增加陕军负担以图渔利之心，而无救国救民援助友军之意。凡此种种种，皆宜慎重考虑，切莫轻率发兵入川，以防给养不济，行动滞碍，自蹈水火，而生重大变故，悔无及矣！川省民联会诸公为司令计，深虑及此，情同手足，特委叔明及蜀华于慰劳之余，开诚相见，说明真相，以资参考。”

胡宗南听了杨叔明的一席话，又联系到王陵基对他的表现，确实至今还没有什么实际帮助，经反复寻思，踌躇良久，才不紧不慢地说：

“事实既已如此，我暂不派队入川。但请二位仁兄代为请托川中民联会及省参议会，替宗南疏通军民隔阂，并请督促方舟主席以党国兴亡为先，认真接济陕甘部队。”

“好，好！一定，一定！”杨叔明和李蜀华齐声点头相应。

几天的接触，胡宗南对杨叔明有突出的好感，认为他是个谋深虑远的干才，在临别的时候，送呈杨叔明一份“顾问”聘书。对同行而来的李蜀华，也送了同样的一份。回赠杨、李的礼

品，除手枪各一支、旅费各200元外，还特意托他们带回苏联叛徒克拉夫青科写的《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节印本二百本，转送给民联会、参议会诸人，以图继续宣传反苏反共。杨叔明和李蜀华皆作了应酬敷衍。

从汉中返回成都，杨叔明和李蜀华向熊克武、邓锡侯等汇报了经过情况，又在民联会上把可谈的都详细报告了一番。《我选择了自由》一书也当场分送了。

不久，蒋介石飞成都滞留数日。一天，他召见各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及省参议员，并向大家训话，反复强调：“团结一致御侮，不要与王芳舟为难！”

第二天，国大联谊会召开紧急会议，公推杨叔明、李蜀华、李炜如、李铁樵、常海清等10余人代表，赴北较场请见蒋介石，痛陈王陵基“颞顽贪污”、“行为荒谬”、“与省参议会及川康绅民将领不协”等等，一致要求“请立予撤换，不可拖延”。

蒋介石拖起他的浙江腔，缓缓地说：

“精诚团结，共济时艰嘛。望诸君冷静，切莫挟嫌。我再说一遍，要精诚团结，共济时艰，共济时艰！”

“王芳舟一日在位，川康一日不宁。民心所背，万不可久留！”杨叔明继续陈词。

请见者们一个接一个吁请：

“是呀，去王芳舟，川省之团结则能精诚，留王芳舟，中国之时艰难于共济。”

“去一王芳舟以利时势，精诚团结以拒共军。请总统明察，当断不断，悔无及矣！”

蒋介石见这些人死心塌地坚持倒王，颇为生气，拉长马脸提高了嗓门：

“你们简直是向我请愿嘛！什么请撤王陵基，什么利形势、拒共军，实则是给我拆台！好了好了，你们向行政院申诉去！”

此次集体倒王，又无终而终。

熊克武见倒王不仅未能实现，而且王陵基狗急跳墙，又有了种种反动部署，时局日趋紧迫，便亲自与邓锡侯、刘文辉、杨叔明等同行赴渝，找西南长官张群，以图再作一次驱王的努力。

熊克武因张群原系他的旧部，便同张群公开地说：“岳军，我的想法是，拥戴你出来以西南长官的身份兼主川政。舍此不能驱王，不能驱王则不能安川。此安川大计，舍你不能完成。望你以全局为重，责无旁贷。”

张群听了，亦喜亦忧，寻思良久，苦笑着摇了摇头，说：“王陵基在老头子面前说我反动，说我和你们几位有勾结。老头子恐有变异，对我控制甚严。唉！王陵基、老头子都怕我身高压主，我已经打算辞退到台湾去算了！唉！对不起诸位，我不能再管四川的事了。”

熊克武见形势既已如此，便另谋成立一“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意在掌握民间武力，削弱王陵基的权力，并作为协助解放、瓦解蒋帮势力的基础。邓锡侯、刘文辉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于是又由熊克武疏通张群，由西南长官公署明令成立此民众自卫委员会，以取得合法地位。

杨叔明在重庆时，多次与老友吕超会晤私谈。吕超告诉他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内容，更促使他坚定了跟着熊克武倒王和协助解放的决心。

1949年8月，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在成都正式成立，熊克武任主任委员。委员皆由熊克武、邓锡侯、刘文辉推举聘任。杨叔明、吕超、李蜀华、但懋辛、唐式遵、李铁夫、夏仲实等皆被推聘为委员。

熊克武运用民众自卫委员会与王陵基斗争，旨在夺取王陵基组训民众武力的实权，破坏其“反共救国军”之进行，障碍其征兵征粮之开展。

面对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的成立，王陵基气急败坏。他从该会的成立宣言中寻找攻击点，公开宣称：

“什么民众自卫委员会！它的成立宣言，通篇无‘戡乱’二字，可见其立场何在？打着民众自卫的招牌，实为变相的维持会。会中诸人，多为一些中间路线者及民革分子之类，有些人行为多所不轨，当予逮捕问罪！”

王陵基一方面扼死自卫委员会的经费，使其不能活动；一方面又密报国民政府，要求加以解散，明里暗里使该会遇到了很多困难。尽管如此，王陵基对四川人民的种种倒行逆施的阴谋，终因自卫委员会的抵制打击而一筹莫展。

1949年10月，国民政府由广州逃迁重庆。熊、邓、刘又再次相约到重庆以谋最后倒王。民联会也公推杨叔明、李蜀华、李炜如、黄瑾怀、张铁僧、杨声为代表，随同飞往重庆。

一行九人下榻于裕丰源银行内，洗尘后，他们便先去见代总统李宗仁。

“我不能负责，你们去问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吧！”李宗仁说。

他们又去找阎锡山。阎锡山接任行政院长时间不长，颇有要挽回颓局之态，百般为王陵基开脱。九个人和阎锡山争论了三个小时，最后，阎锡山明白告诉他们：

“现在形势危急，你们不是不知。西、秦、黔、彭已相继失守，共军已撞开四川的大门。在川省动乱之秋，牵一发而动全身。如若再撤王芳舟，岂不让与党国为敌之徒幸灾乐祸？于我于友，则全盘皆输。实言相告诸公，此时此刻，断断不能撤换王芳舟！请诸位不要存在任何希望。”

熊克武、邓锡侯、刘文辉鉴于西、秦、黔、彭逐一解放，他们必须抓紧解放四川腹地的协作工作，便决定先期返蓉，特嘱杨叔明留下，待蒋介石来重庆时，再作一次倒王的最后努力。

11月中旬，蒋介石来渝，杨叔明登记请见。延至下旬24日，蒋介石才接见杨叔明。

“王陵基治川无状，祸川有余。”杨叔明慷慨陈词，“四川的大门已被共军所破，皆因王陵基不能固结民心，团结御侮。时局如

此，换一王陵基，军心民心皆可稍定。军心定，士气盛；民心定，社会安。士气盛，社会安，四川腹地则庶几可保。因此，撤王陵基，乃安川保川的英明一着。”

蒋介石不动声色，板着面孔听着，只是举起手看看表，待杨叔明稍作停顿，便低低地、不阴不阳地说：

“我已告诉过他，他不是很改良了嘛。你告诉民联会、参议会，就说我蒋某的意见，大家还是要与他合作，才能保川。”

杨叔明还在争辩：“请总统明察，保川必去王，去王可保川。民意不可逆！纵使王陵基是一门重炮，而舍他即可保住将帅，转变全局，则舍何不可？孔明挥泪斩马谡，传为千古美谈。”

蒋介石不耐烦了，又看了看表，厉声说道：“我说过，我已经向王芳舟告诫过了，他必然会改良。我需要你们的，不是拆他的台，拆我的台，而是要和他合作，也是和我合作。若能如此，川事自有办法。若非别有用心，是不会一直纠缠这种事的！”说着，又抬手看表。

杨叔明碰了一个软钉子，怏怏而退。他为倒王已尽了最后的努力，毫无收获，只得返回成都。

杨叔明在重庆的那些日子，解放大军已逼近重庆外围。正在这时，他的一位亲戚正奉蒋介石之命，在涪陵、綦江、南川一带领兵抵抗向川中挺进的解放军。杨叔明的这位亲戚，就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

罗广文是杨叔明的连襟。他们俩的岳父叶筱庵，原为浙江杭县人，后官云南腾冲知府，罢官后携家落籍成都。叶筱庵子女较多。五女儿叫叶舜华（亦名纫秋），与杨叔明结婚五年，生子三人，后因产褥感染而歿。杨叔明悲痛不已，写悼亡诗多首。叶筱庵看了这些悼亡诗，十分感动，遂将六女叶云华许给杨叔明作继室，不幸还未过门即病逝。叶筱庵又以七女叶励华（亦名韵秋）填房。“叶氏三女共一夫”之说即源于此，可见杨叔明在岳父眼中之地位。

至于罗广文之妻，则是叶筱庵的八女，叫叶尧华（亦名堃仙）。叶尧华毕业于四川大学教育系，在罗广文的家乡当过忠县中学的校长。

罗广文和杨叔明的这层关系，在川省以及省外军政界是广为人知的。当罗广文的部队正在重庆外围抵抗解放军时，吕超把解放军约法八章的内容告诉杨叔明后，即嘱杨叔明劝罗广文反正投明。杨叔明迟疑说：

“我与罗广文虽是连襟，深有感谊，但性格素不相合，恐不易生效。”

“只要你对人民解放怀必胜信心，又从亲感情谊上打动他，定能立竿见影、水到渠成。”吕超鼓励杨叔明。

杨叔明信心不足，但还是去向罗广文做工作了。当时，重庆白色恐怖严重，环境十分危险。杨叔明却单刀直入地与罗广文谈了一次。罗广文只说：“形格势禁，无法着手。”就不愿再谈下去了。杨叔明又以朋友交往的方式，约罗广文与吕超两次会面。吕超经过旁敲侧击，多方试探，感到摸不透罗广文的心思，也不便深谈。

于是，杨叔明直接去找罗广文的父亲罗宇涵。罗宇涵曾任忠县参议会议长，这时正为家中遭事在重庆奔波。当时已是11月下旬，形势异常紧张，杨叔明先劝罗宇涵说：

“罗亲翁，快离开重庆吧，解放军已攻克酉、黔、彭，这里很快就要大动乱啦！”

罗宇涵悄声问杨叔明：“永浚呀，既然海内九州已解放七八，广文还带那些遭殃军做啥哟！”

“是呀，你老人家应该好好地劝劝他。”杨叔明赶忙抓住这个话题，要罗宇涵动员儿子起义。

“先不要说广文的话，”罗宇涵说：“我的老二罗广斌是共产党员，去年就被捕押在渣滓洞，请你先设法把他营救出来，我再找机会劝广文反正。”

11月26日，杨叔明同罗宇涵一道来到西南长官公署。杨叔明没有先去找张群，而是直接找到张群的亲信李肇甫，说：

“伯申(李肇甫的字)兄，罗广斌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连襟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的弟弟，和我的关系不一般。你要是还肯看在朋友面上，我就拜托你将罗广斌保释出来。”

李肇甫二话没说，当即拿起电话与公署某处长谈话：

“喂，喂喂……我是伯申……对对，哈哈，我就是找你呀。去年你们关进渣滓洞的那个罗广斌，最近查明，是我军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的弟弟。原行政院政委、监察院监委、国大代表杨永浚先生又是罗广文的连襟。经我们研究决定，罗广斌虽然是共党一分子，但鉴于罗广文及杨叔明两先生的关系，由我保释。……唉？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服不服。……由他自己吧，说他自己跑出的也行，反正你们放了他。”

次日，罗广斌果然就跑出来了。

这时，罗广文的部队已开到了川西。于是，28日早晨，杨叔明搭乘罗宇涵的汽车离开了重庆，30日才抵达成都。不日，吕超也赶到了成都。

12月5日，杨叔明在方池街住宅设家宴招待吕超和罗宇涵。席间，杨叔明对罗宇涵说：

“亲翁，今国家局势，胜败已定，十分天下，蒋仅余一二。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为广文弟前途计，我和吕超先生都打算策动广文反正。万望亲翁协同成此一举，以亲子骨肉之爱，开诚劝说，抑或事半功倍，立竿见影。”

罗宇涵说：“你们既已救广斌于虎口，又欲拔广文于泥坑，老朽深致谢忱。待广文来成都，我定以父子情谊，晓以大义。”

饭后，杨叔明送走罗宇涵和吕超，又想起他的老朋友，青年党中央委员邹枏。邹枏正任四川省保安司令部第四指挥部副指挥兼保安四团团长，在青年党内一向比较听李璜和他的话。如果写信给邹枏，劝他反正，是很可能见效的。于是，杨叔明向书房

走去，铺开纸，提笔给邹枏写起信来：

符兄：

自上次中央全会上一别，至今未见尊颜。然对兄的情况，弟始终关切，故仍大致了解。愚弟之见，保安之职，纯属党豺为虐。目前形势，胜败已成定局，不可逆转。兄托身于蒋，危如垒卵。弟思之再三，唯弃暗投明，倒戈反正，方为明智之举。国军中不少识时务者，均正谋图新生之路。弟与兄多年肝胆相照，近日所魂牵梦绕者，无非兄之前途及命运耳。鉴于目前川省形势紧迫，川西解放指日可待，刘、邓、潘、黄诸公将相继起义。兄在绵竹、安县一带掌握兵权，士官生杀予夺，在兄一手。望兄以奋勇减少战祸，避免社会牺牲为己任，快刀斩麻，当机立断，就近跟随邓锡公、黄隐公诸人起义。至于起义后的出路，兄不必多虑。起义之后，仍有可能掌握兵权。兄与弟情同手足，弟深信，兄见字后必别无他虑，定以弟意为己意，通电起义。

弟翘首敬候佳音！

崑頌

冬安！

道涵

十二月四日

信中用的“符兄”和“道涵”之名，均为化名。杨叔明写好信，又特意找陶元甘亲自给邹枏带去。陶元甘于12月7日由成都动身，赴安县桑枣镇找到了邹枏。

邹枏见信后，甚为欣慰，立即向陶元甘表示说：“听永浚的话，没问题！”

由于四川形势已至为紧张，早在11月中旬，青年党中央党部在重庆召开临时中常委会议，议定该党中常委全部逃往台湾。当时，杨叔明正为请撤王陵基逗留于重庆，也出席了这次常委会议。会上，杨叔明当即表示：“母亲病卧在床，怎忍远离！”

不久，重庆解放在即，青年党中央党部少壮派中常委夏涛声、王师曾、王岚僧、喻孝权等人乘飞机逃到成都。一日，他们来方池街会杨叔明，杨叔明不在家，便给他留下一张纸条：

永浚兄：

今日来访，不遇。我等已由渝来蓉，住向阳街七十号刘泗公（指刘泗英）家。请于明晨来此一晤，有要事与谋。切切。

日月山水 留

即日

杨叔明见字，知这“日月山水”这是他们四人的代名词（王师曾曾有“日”，喻孝权喻中有“月”，王岚僧岚中有“山”。夏涛声涛中有“水”）。次日清晨，杨叔明如约前往。数人中，王师曾和杨叔明在西康省时于刘文辉手下共事多年。当初，王师曾就是由于杨叔明的引荐才去西康任建省委员会秘书的。所以，这天自然是以王师曾为首，力劝杨叔明同往台湾。王师曾说：

“政府已准备好飞机，包送我党要员飞台。你虽年岁大了些，但请不必多虑，到了那边，一切有我们照料，叔公放心好了。”

杨叔明沉默良久，半晌，才带着几分痛楚似的，说：“唉！我如今内外交困，进退不由呀！家运不佳，老母生病，叔明怎忍离去？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如今，我就尽得了孝尽不了忠啰！”

“若不走，以后不要怨我们，我们是劝过你的。”

“诸君好心，叔明感谢。我留成都，也是迫不得已。唯望诸君到了那边，一帆风顺，万事如意。”

王师曾等见杨叔明决意留下，不便勉强，也就分手告别了。第二天拂晓，“山、水、日、月”等人便悄悄驰往新津机场，登机飞往台湾。同他们一起赴台的，还有刘泗英、陈翰珍、郑秀卿和何鲁之夫妇等人。

杨叔明回家后，妻子叶韵秋问他去刘泗英家谈话的情况，他

详细讲给妻子听了。

叶韵秋说：“前几天政府才发给你100多元国大代表生活津贴费，还有合二两黄金的疏散费，这就是叫你走的嘛。有什么离不开的！母亲不能交给孩子们照看吗？”

“母亲固然有病，这是一方面。”杨叔明摇摇头，“但我也细想过，我到台湾没有什么出路，因为青年党已被他们少壮派所把持。我既不属元老派，也不是少壮派。从他们免我政务委员的职开始，已经形成与我对立的形势。即使跟他们去了，他们对我也是貌合神离。至于蒋介石那方，我今年就曾三次见他，请撤王陵基。最后一次，老头子对我的态度极不好，嫌我的话多，话硬，两次抬起手来看表，表示讨厌，肯定他内心是十分恨我的。加之，现在我又要劝罗广文起义，他必更恨我入骨。你想，我若到台湾去，能有好结果吗？”

“算了算了，你就不想想，那么多年，你跟国民党握手，跟共产党顶牛。反对共产党的话，你说过，反对共产党的官，你做过。看着吧，我看你留下来又是啥下场！”

“我怕啥？近一年来，我跟锦帆、自乾、晋康他们一起做过好事，可以将功补过嘛。等解放了，他们会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证明我有些功，可能还可以在新社会站住脚挤个位子呢！嗯？你说不是！”

杨叔明和妻子的一席话，道出了他拒绝飞台的真实思想。他是经过一番个人利弊的权衡，才作出如此抉择的。这是关键性的一步，他没有迈错。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的拉锯中，杨叔明，他没有离开祖国的大地。

那些日子，蒋介石也飞来成都了。

12月7日早饭后，蒋介石的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打电话通知刘文辉和邓锡侯，说蒋介石召他们午后4时到北较场中央军校去谈话。刘、邓知有危机，便当机立断，决心潜赴彭县起义。此时，适逢杨叔明、李蜀华、李炜如三人在邓锡侯家。于是，邓锡侯嘱咐三

人，速到灌县投其部属于介胥师长暂避。杨叔明携家带小同二李仓皇避到灌县。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从彭县联名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表示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厉声讨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10日，邓锡侯即派车把杨叔明等人从灌县接到彭县，与刘文辉、邓锡侯及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李载之、朱德清、章浩然等同住龙兴寺。杨叔明这时便更加明白，刘、邓等人的倒戈，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领导下实现的。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跟随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的一系列活动，并不是孤立的。杨叔明从此参加了刘、邓、潘的秘书班子，负责起草各种电文，参与各种决策的讨论。

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节节溃败，胡宗南的军队开入四川腹地。当时，刘、邓、潘一方面作御防胡宗南部来攻的部署，一方面陆续发出电文，策动其他川康军反正。接着，二十四军将领伍培英、刘元璋、刘元琮，邓、潘两部将领黄隐、潘清洲等都发出拥护起义的通电。十六兵团副司令董长安还亲自赶来表示起义。

住彭县的中共二统战工作组考虑，利用杨叔明的关系做罗广文的工作已迫在眉睫，否则，如罗广文在川西坝上负隅顽抗，与解放军死硬对阵，势必给川西老百姓带来本来可以争取避免的苦难。于是二统战工作组提出，由刘、邓出面，派杨叔明加紧动员罗广文起义。刘、邓请杨叔明给罗广文写一亲笔信，约罗会谈。杨叔明写好信，由邓锡侯交其部某营长携往广汉、新都、成都一带寻觅罗广文。不得，又转赴温江，才找到罗广文。

罗广文得信，立即展读。读后，他忙把信撕碎，烧掉，然后悄悄对邓锡侯派来的营长说：

“王陵基现在正在温江，快要离去了。你先回去告诉我杨哥（罗广文称杨叔明为杨哥），等王陵基离开温江，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

来人去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吕振修也来向罗广文作过动员，

罗广文没有下定决心。

罗广文尽管还不愿意作出明确的选择，然而，他和杨叔明毕竟是亲戚，不管他持什么态度，他决不能对杨叔明的约请置之不理。于是，待王陵基一离开温江，他就往彭县给杨叔明挂电话，约定于25日晨在郫县两路口面谈。

成都出西门的郫灌公路上，分出一条通往彭县的岔路。这岔路口，就是郫县的两路口。1949年12月25日凌晨，两路口停着两辆军用小吉普车。一辆是罗广文和他的副参谋长张荣宪、贾应华坐来的，再一辆是杨叔明和邓锡侯之子邓亚民坐来的。就在停车处不远的农家田边上，坐着几个便衣人。川西平原上一场炮火纷飞的战斗化为唇枪舌战将在这里展开了。

先是邓亚民寒暄说：“罗司令，我父亲要我代他向你这位老朋友问好。本来他想亲自来拜访你，但彭县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抽不开身。”

邓亚民也真会说话。他知道，他父亲本来和罗广文是很熟悉的，本想出面劝罗广文起义，又怕正面不好措置，还是觉得以通过杨叔明的关系进行策动为好。另一方面，邓锡侯又想让罗广文念及他们俩的旧交，所以就派他的儿子陪杨叔明同往。邓亚民的这几句寒暄，一下就把罗广文和自己的感情距离缩短了。

罗广文听了邓亚民的话，笑了笑问：“令尊近好！晋康公已经率先起义了，当然是很忙的啰！哈哈！”

一番问候之后，一场开诚布公、短兵相接的舌战开始了。

“刘、邓二公对你的勇敢、正直向来钦佩，”杨叔明对罗广文说，“现在川局形势已定，刘、邓、潘已经通电起义。他们与中共工作人员商妥，要我们来劝你早日弃暗投明，这是他们之愿，也是中共之愿。”

“刘、邓诸公劝我起义，替我想得很周到，我很感激。但是，杨哥，我不能这样做，我如果这样做，就太没有人格了。”

“不对！难道刘、邓也没有人格？有眼光的人不这样看，中

共不这样看。奋勇减少战祸，避免社会牺牲，为着社会着想，这就是做人的人格嘛！”

“避免社会牺牲，自然也是高尚之举。但我为总裁尽力多年，若倒转枪口，也是愧对国民政府。我这两天反复想过了，有三个方法可作选择。第一，我自己结束自己，一个子弹足矣。第二，请刘、邓、潘把我枪毙，或者把我囚禁起来，把我的部队改编了。第三，我回去向我的部属讲明，劝他们起义，但我的身份使我不能跟他们走，请他们把我枪毙，或囚禁起来，他们再起义，我仍当我的战犯。”

“你这些想法纯属旧思想，只忠于一人一党，而不顾国家社会和广大百姓的福利。这是毫无价值的。前一时期在重庆时，吕超要我劝你，我因那时局面没有完全开朗，所以有些话我始终没有说穿。现在，解放军的约法八章，你也见了；中共工作人员对你也表示欢迎。这是你忠于真正的政府、忠于真正的国家的机会来了，你应该当机立断。你若固执下去，前途不堪设想。你想，你的部队数万人已经渐渐陷入解放军的包围之中，或抵抗、或投诚、或倒戈，内部态度不一，必然发生内讧，自相冲突，自相残杀。一旦残杀冲突起来，军民必将遭到极大的灾祸……”

杨叔明的话娓娓动听，滔滔不绝，使罗广文听着听着，不禁仰头痛哭起来。

痛哭之后，罗广文站起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才攥了攥拳头，说：

“好吧，我回去今晚就召集各师长开会，说服众将领，我指挥的二十兵团也照样办理。即使他们不赞成，就我一个人也要到彭县来。我明天一早就来龙兴寺发电起义。”

罗广文的副参谋长张荣宪、贾应华也表示赞成他的办法。五人遂分手而去。

次晨一早，罗广文果然同贾应华来到彭县龙兴寺，先见了邓、刘。邓、刘又约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李载之、朱德清、章浩然等与

罗广文见面，商量好起义步骤，由杨叔明拟好电稿，正式发出起义通电。罗广文宣布：

“十五兵团和二十兵团全体官兵，响应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诸首长起义号召，自即日起与国民党军队脱离一切关系，投向人民，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坚决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残余军队。”

全国大陆解放后，罗广文部队改编就绪，就调往浙江去了。后来，罗广文被党和政府安排为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军校末期起义前后

谷云鹏

作者系“黄埔军校”最后一期学员。对该期军校教官学员起义的背景、经过，知之甚详。作者详细地介绍了该期官生的概况及全体人员如何在该校教育处处长李永中、特种兵总队长肖平波二将军率领下，采取让、拖、等办法在适当的时机，率全体人员起义的经过。

黄埔军校23期概况

黄埔军校23期是1948年6、7月间在成都，通过考试向各地招生的，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东北学生。东北学生是在沈阳考取的，约640人。报考条件是高中毕业生，原规定学习期限二至三年，后缩短为一年半，属于大专程度的高等院校。沈阳学生于1948年8月13日从沈阳坐飞机到锦州，因那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就剩下三点（长春、沈阳、锦州）一线（锦山线）。在飞锦途中，一架飞机飞至大虎山上空一部发动机失灵，在机内明显地看到螺旋桨停止转动，飞机开始颤动，乘客受惊非浅。不过快到锦州时又修好了，还是安全降落了。在秦皇岛乘海鲁号海轮到上海又乘江华轮沿长江至重庆。船在汉口靠岸。步行走了3个月至11月中旬才到成都。

12月1日正式开学，首先是入伍训练，学生总数1509人，其中东北学生637人，分三个大队十个中队，地址在新都宝光寺。总队

长董桂森上校是东北人，高个威武，标准军人气质，善长游泳和打篮球，游泳能横渡长江。平时跟学生一起打球、游泳，平易近人，受到东北学生的尊重。训练科目有射击、投弹、刺杀、体操、步兵操、战术训练、队列等。学生装备是步枪、子弹、刺刀、钢盔。作息时间早6时起床，晚9时就寝、中午有两个小时的午睡，星期日休息，一般是上午训练下午讲课。课堂是步兵操典、射击要领、兵器等。学习比较紧张，由于东北学生多系伪满国高中生受过军训，因此6个月的训练期3个月完成，并于1949年元旦破例参加了立国纪念阅兵典礼。1949年2月在龙泉驿野营后，3月1日开始分科学习。

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位于成都市内，分北、西、南、东四个较场。

北较场位于成都市的西北角，与文殊院相邻，占地约一平方公里，正门向南开，设有森严的门卫，大门两侧挂有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进门首先是阅兵场，阅兵场北面正中塑有蒋介石全身武装的铜像，像下是检阅台，像后有三个大门，左门通向校本部，中间门内是会议场、对面正中是中正堂，右门通向步兵大队。当时校长是关麟征，教育长是陆军中将军吴允周。校本部下设教育、训导、副官、总务、医务五大处。

步兵大队管辖四个中队，共有学生453人，东北人199人。大队长是李光环。学习科目有步兵重武器射击、战术与指挥、军用地图的识别与使用、参谋业务等。装备很充足、迫击炮、重机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都能满足需要。

西较场位于成都市西南部，再往西就是青羊宫和草堂寺，占地约0.4平方公里。正门向西开，中间面西是中正堂，实际是一大型检阅台。西北是炮兵大队，西南为骑兵大队，东南角是工兵大队，正南是总队部，东北部是通信兵大队和辎重兵中队，东北角有一小门通向军官宿舍和南较场，西南角也有一大门是通向工兵实习码头——锦江岸百花潭。

特种兵总队包括骑炮工辎通都在西较场，总队长肖平波是陆军少将，是黄埔六期学生，副总队长龚如松是陆军上校。

骑兵大队辖两个中队，共有学生233人，其中东北学生23人。马匹、马刀均满足需要，还有两台摩托车。学习科目主要是马术、骑兵战术、侦查等，骑兵大队长肖敏颂是骑兵中校。

炮兵大队辖三个中队，共有学生314人，其中有东北学生161人，大队长是王健庭。装备有德式克洛伯105山炮4门、美式105榴弹炮4门，美式105加农炮2门，汽车4台，马16匹。学习科目有马术、炮操、射击、驾驶等。演习场小规模在青羊宫，大规模的在三合场。

工兵大队辖两个中队共206人，其中东北学生129人，大队长是韩旺春。学习四大教程：测绘、爆破、渡河、筑城。测绘的主要任务是绘制军用地图，爆破主要学炸碉堡、布雷和排雷，渡河是学习船渡和架桥，筑城是学建筑营房、修工事、筑碉堡。渡河实习场在百花潭、有橡皮艇、组合桥梁都能满足需要。

通信兵大队由两个中队组成共有学生204人，其中东北学生98人，大队长是黄德元。学习科目有旗语、有线电话、无线电话、无线电报等。仪器装备均能满足需要。

直属辎重兵中队共有学生99人，其中东北学生16人，主要学习汽车驾驶，装备有两台汽车，两辆装甲车。

西较场包括骑、炮、工、辎、通五个技术兵种十个中队1056人，其中东北学生427人。

南较场在西较东面不远处，是训练教导队的场所，东较场在成都东郊，23期3总队在那里训练。

每天早晚有升、降旗仪式，都要唱校歌。

起 义 原 因

黄埔军校23期的起义不是偶然的。它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共

产党统战工作的深入和黄埔官生的觉悟等综合因素的必然结果。

解放战争到1949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军队几万几十万的被歼灭，整师整军的向人民解放军起义或投诚，解放军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军校中的广大官生都是有知识有素养的一些军人，不能不考虑前途、命运和出路。他们开始怀疑国民党，也开始要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那时给工兵二队讲建筑工程课的姓孙的教官（中校军衔是华西大学的讲师），经常在讲课空余时，透露些消息或讲些评论性的言论。同学们也高兴问他这方面消息。1949年4月，解放军打过长江，国民党封锁消息也无济于事，消息还是不翼而飞，国民党内是一片惊慌。一次上课，同学们问：“共军是打过长江了吗？”孙答：“打不打过长江可不知道！南京都被共军占了，长江都挡不住，还有什么……。”学生们听了大吃一惊。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时，孙对同学讲：“陈明仁在四平同共产党打得难解难分，谁能想到他叛变？以后还能信任谁？”这说明陈明仁起义对国民党的震动是何等巨大。1949年6月庆祝建校阅兵典礼，正当阅兵总指挥撤刀报告时，悬挂在蒋介石铜像后中门上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自己断线坠落下来。阅兵完了，议论纷纷，都说：“国民党寿命已尽，该到垮台了。”有的军官甚至掉起泪来。1949年9月12日蒋介石飞抵成都，住在北较场。14日召集全校官生讲话，台上有蒋经国、谷正纲、顾祝同、陶希圣等陪同。蒋讲完话还故作姿态地走下台来从各排前走过检阅了一遍。15日谷正纲、陶希圣讲话。22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讲话。蒋的到来和这些大员们的轮番讲话，很明显是给黄埔官生打气。但人们不难发现，这些讲话：第一、不敢讲形势，第二、不敢讲战场，第三、再也不敢提多长时间打败共产党了。这就告诉人们：第一、形势不好，第二、战场上一败涂地，第三、打不败共产党。蒋介石想打气反而弄巧成拙。黄埔广大官生预感到形势严重、国民党没有几天了。出路何在？迫使人们早日抉择。

军校学生，普遍感到心情空虚，前途渺茫，思乡心切。特别是东北学生家乡解放，联系中断，更加上有些军官辱骂体罚学生，引起学生的不满和反抗。1949年7月炮兵一队上尉区队长李开荣平日挖苦辱骂学生甚凶，引起学生的不满。学生王孚申就在讲台上画个螃蟹，在螃蟹盖上写了李开荣三字。李看到后大发雷霆，声言非要查出来按共党严办，逼得王铤而走险。一天晚上王腰间插把斧子以承认错误为名到李家，请李到外边谈谈。当离开李家不远处时，王用斧子将李砍死后逃走。事后多次出动汽车、马队寻捕无获而罢休。

8月间一名东北学生因挖土塌方而被压死，这更引起同学们的伤感和不满。大家普遍感到前途渺茫。

1949年9月初，黄埔军校三名主要军官与共产党西南工作组秘密取得联系。这三名军官有李永中，他是黄埔三期学生，当时任教育处陆军少将处长，再一个是特种兵少将总队长肖平波，还有一个肖步鹏也是陆军少将。他们于9月8日双方达成协议，即军校将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

起义经过

1949年11月初，蒋介石第二次来军校，这次没有带那么多的随员，不过警戒是相当严格。7日蒋召集军校全体官生讲了话。他披件黑斗篷，只讲了7分钟。他说要迁校，却没说清迁到哪里。但人们都明白，只有一个台湾，别无他处。那时西南只剩一个四川省。贵州解放，云南卢汉起义。这时李永中、肖平波准备扣押蒋介石后起义，但肖步鹏采取两面派手法，出卖起义，把扣蒋计划告诉了蒋。蒋坐机仓惶逃走。接着张耀明、吴允周也坐机逃离成都。迁校事宜安排给李永中以代理教育长兼迁校行军总指挥的名义。肖平波仍是特种兵总队长。11月中旬，全校开始行军南下。李、肖二将军为了实现“九·八协议”使解放军能顺利接受

军校官生，采取了让、拖、等的办法。

让：就是军校行军至双流机场时，那里已经准备好30多架飞机，是运送军校学生去台湾用的。把守机场的是胡宗南部队，胡部也有坐这批飞机逃走的打算。李、肖二将军有意不出示指令，联系不成，将计就计将飞机让给胡部。在机场双方交涉时，守机场部队还开枪将军校骑兵队一名学生腿部打伤。军校学生马上弓上弦，刀出鞘。一场大战即将展开时，守机场部队的师长坐吉普车从公路上过来，军校马上扣押了这个师长。结果对方赔礼道歉，处理开枪者，给受伤者医治送回成都养伤。军校队伍越过双流机场继续南行。

拖：行军至双流向南过新津、彭山县、眉山到夹江又折回眉山、彭山回到新津又折向西到大邑，再向北过崇庆、温江最后到郫县。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回游动在川西平原中走了个倒“h”形，目的就是拖延时间，等待时机，将这批力量交给人民。从夹江往回返时，为了稳定军心，谎造“美军在天津、青岛等地登陆，国军已大举反攻，军校不需要迁校，北上回成都。”结果行至新津，看到胡宗南军队还在大举南逃，人们才恍然大悟。12月18日至大邑城宿营，正赶上是集日。赶集的人特别多，当地游击队混入人群，将距离测好。19日拂晓，游击队用迫击炮从城外向城内袭击。总队部设电台的通信队住处落了两发炮弹，伤二人。炮兵停炮场落了两发炮弹，重伤后死亡一人。等军校学生登上城墙迎战时，游击队已撤得不见踪影。只好等到天明从东门撤走北上。

等：就是等待时机，等待解放军接收。20日从大邑撤出北上走至崇庆附近的安顺场，和胡宗南带来的交警部队一个营相遇。交警在村内宿营，有一个排向南警戒。军校向北欲从村中穿过。双方前头相遇，话不投机动起武来。交警先开枪。听枪响，军校迅速展开。李、肖二将军见是小股蒋军，又据解放军较近，正好将其歼灭作为起义的献礼。当时交警凭一条壕沟为依托，李、肖

就组织一个排的兵力从正面佯攻，加强火力，虚张声势。另两个排的兵力向左右迂回，在壕沟两头各架一挺机枪猛扫，将敌人用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只好举手投降，此战大获全胜。我方轻伤一名，抓俘虏3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0余支。对方死亡1人，重伤3人，轻伤5、6名，30余人当了俘虏。战斗约一个小时结束，天已黑下来，双方对持宿营，各自严加戒备还算平安无事。次日双方联络官员接触，才知道交警的营长和随营的团长都是军校学生。李、肖二将军是他们的教官，看来只好讲和了。谈判地点设在交警住处，由李永中带工兵二队一个排警护着去谈判。肖平波在外边备战，防止谈判破裂被打个措手不及。不过对方有30余人的俘虏在我方，对方不致冒险突袭。谈判还算顺利，达成释放俘虏，归还枪支，各自处理自己伤亡人员，互不干涉对方行动等协议。军校继续北上至温江西，这时北面已和解放军接头；西面是罗广文的一个军，已经宣布起义；东面是胡宗南的三个兵团的国民党军。时机终于等来，23日在温江西临时指挥部内，由李、肖二将军召集各队队长和学生代表会议。李讲了形势和前阶段同中共的协议等；肖讲了政策，愿起义的留下，愿跟国民党的向东，愿回家的自便。学生都愿意起义。25日队伍至郫县，在北门外一个开阔地特种兵总队开全体会。由李允中宣布军校起义。讲话的大意是：“校长、教育长都坐飞机走了！你们都是青年学生，我不能拿你们年青的生命去作无谓的牺牲。目前的形势大家非常清楚，无他可图，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起义。如果说这是罪过，罪过由我一人承担。你们是青年，青年是有前途的，希望你们保重。今后一切行动都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接着由解放军代表讲话。他首先自我介绍他也是军校学生，并表示欢迎军校起义。他介绍了其他五位解放军代表、宣布军校保持原编制不变，名称暂叫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校。干部不变，六位解放军分别是总队和各大队的军代表。任务是担任西侧警戒。因为在东边已经有解放军将胡宗南的三个兵团包围，军校防止敌人西窜。讲完话后六位军代表

走到同学中间，分成六个圈由同学任意提问题，解放军给予答疑。起义的第一天，同学们就尝到民主平等的新气象。25、26两日，在远远的西南方，炮声隆隆，枪声阵阵。事后才知道，蒋军胡宗南部的一个兵团被歼，两个兵团起义，全军覆没在成都南部平原上。26日，步兵大队四个中队在大邑西北与解放军相遇。解放军二野误认为是漏网的胡部，双方火力都猛，伤亡较大。步兵总队长受伤，有一名区队长负重伤后拒绝救援并拔枪自杀。等起义的骑兵大队长来找步兵大队时，才喊话停止了战斗。至此军校23期全部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军校23期全军3000余人，全部设施，所有装备，完整的武器，全部交还于人民。

狱中八年记（下）

周春晖

“来世再见吧”

1943年6或7月的一天上午，监狱官来要我拿上一床被或褥子跟他走。

当时我正读《汉书》中的《霍光传》呢，过去的经验，李钟麟、袁景云等都是这样被领上刑场的，今天临到我的头上了么？我转身对同屋的傅希若说：

“来世再见吧！”我随手提起我永不敢离身的鹅绒大枕头，跟监狱官走了出去。

大门外停着一辆骡车，我上了车后，车帘被拉下来，监狱官跨在车沿，辘辘轮声响了起来。

我坐在车里寻思，是直接把我拉到刑场呢，还是先拉到第二监狱等夜里再执行呢？但愿刽子手给我一个痛快。

算来我在人间已经度过三十六年了。于国于家都是罪人，要自己讲也是历尽了艰苦，单是前后三次住狱就送掉了九个寒暑，占去生命历程的四分之一，我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呢？说为自己并未认真为己，果真为己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说是为人？如果说我不妄自菲薄，我有吃苦耐劳的毅力和钻研学问的热情，我从不谄上骄下，夺胜好强。我透过帘缝往外看，骡车似乎在乱坟岗子里转呢？

我口吟了一首绝命诗：

回首孤魂成野烟，
卅年春梦总茫然，
此身久做牵泥絮，
今趁飘风返本原。

骡车实际走了不到半小时，我却感到似乎走了一两小时，最后它停了下来。

下了车还没等我直起身子，迎面兜来一件大衣蒙上了我的头，有个人叫我弯下身就牵着我往前走。

我弯身扬起脸来看，前面移动的两条腿，是黄呢子马裤套着长筒皮靴，这与监狱员不同，监狱员穿的是青哔叽呢制服。

我被领进一间门向天井开的屋子，蒙头大衣取掉，眼前立着的是督署卫士打扮的士兵。

“这儿是严肃的地方，要老老实实在地呆着。别吱声，有什么事，等我们从门前过时，你轻敲几下门，就有人拉开门上的小窗同你讲话了。”这个卫士说，接着指对门的墙角上放的那张铺板说：“这是睡觉和休息的床。”

“你抽烟吧？”他把一盒苏联制的大楼牌香烟和半盒火柴丢到铺上，转身出去，咔嚓一声门随着锁上了。

我把原来铺在板铺上的被褥理好，摆上我带来的枕头就躺下了。

这间屋子有七、八平方米，大栅很高，地板干净，有两扇窗，一扇在南墙，一扇在东墙，门向东开，门外就是院子。窗里面有铁条，窗玻璃刷有石灰水，空洞屋子里只有一只床铺，床下放着一只面盆，盆里有一条毛巾，一把铁壶，两只饭碗，一双筷子。

“这是什么地方呢？”我跳到地上，手攀窗内的铁条纵身跃上向南的窗台，从石灰剥落的地方往外看。望见似天主堂里的双耸钟楼。

我记起作工犯时听人讲过的以137为代号的天主堂。这座天主

堂在迪化南关，是德法系统的传教士主持的。1939年被盛政权没收以后改为监狱，这所监狱没有按监狱的番号排，就用这儿的电话号码137作为代号了，许多人仍称它为天主堂。137是迪化最森严、关押要犯的地方，犯人被关到这里是为了审讯，审讯告一段落后，仍送到其它监狱里，

我又躺到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开门声把我震醒了，一个卫士送来午饭，本来这里每日两餐，这是对新来犯人的照顾，临时给的。

一大碗俄式肉汤，里面有西红柿、土豆，四、五大块羊肉和香料叶子，另外一大碗维吾尔族的饭——扒饭，是用大米羊油焖的，里面有胡萝卜条、葡萄干和羊肉，原来维吾尔人用手扒着吃，所以汉人管它叫“扒饭”，现在维吾尔人一般都用油漆木勺盛着吃了。

卫士说：“吃饱！饭不够，敲门要，给你添。”

新疆监狱的惯例，收拾你时，总给你好吃的。

我吃罢饭在地上来回遛的当儿，门又开了，卫士蒙上我的头把我带走。

天主堂的审讯

出号门往东走58步后上了台阶，进了甬道，往南拐，被牵进一个大屋子。

这间屋真宽敞，能容下百多人，地上铺着漫及全屋的大地毯，抬起头来看，靠东墙有两张对摆着的写字台，台后各有一把安乐椅，椅后又各有一张钢丝床，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坐在北边安乐椅上的那个人欠身指给我靠西墙的一只凳子。

“请坐到那儿，先抽支烟吧！”他奸笑着说。

卫士递给我一支关内产的香烟，又从衣袋里掏出大概是新疆省自产的黄磷火柴，划着替我点着烟。

我吸着烟继续观察环境，东壁两扇大玻璃窗，又亮又洁净，北墙三扇大玻璃窗，中间那扇顶端的窗开着。这间屋子至少有几十平方米，从我坐着的凳子到写字台前，总有十几米长，如果耳朵背，坐在这难得听清写字台前人的讲话。

卫士出去后，让我吸烟的那个人说：

“怎么样？还好吧！住几年了，五年了吧？脑子总开些窍了吧？”

这个人40岁左右，相貌平常，东北口音，他装作安详，平易近人的样子。

“是的，住了五年啦！脑子住坏了！”我说。

“你做几个月工犯了，国内外大势总了解一些了，我们的伟大领袖盛督办”，他说到这，扬起手来指向东壁两扇窗中间挂着的盛世才的巨幅照片，“把新疆这只巨舰引向了更安全更有利于14个民族400万同胞的新航路。”

14个民族，400万同胞是新疆当年人们常用的话。

他喝了一口茶，停了一会接着说：

“你知道吧，第三国际取消了，新疆过去不得不走的道也改了，其实新疆自始至终还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不只是保持了我国领土的安全，不只是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而且我们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对外人拱手称臣，被外人牵着鼻子走。督办牢实地掌握着中央交给他的权，没有受各形各色的帝国主义指挥，至于十年来对我们不怀好意的人，小集团都遭到灭顶的报应。今后谁想尝尝这个灭顶滋味，那也请便，我们纵然慈悲为怀，也不会对这类人发善心的。”他的文章和盛世才一样，其中不少地方是从俄语文章结构中学来的，这些年来大学都这样学，尽管现在已经展开了反苏、反唯物史观运动，但俄语式和风格依然被人运用着。

我仰头听他讲，一支烟已经吸完了。

“怎么样？你的一切，尤其是你的政治信仰和关系，督办我

们都熟悉。你来新疆前后，徐廉和你自己也都向督办正面交代过，这些情况大体是真的，不过主要的你们隐瞒了。不难了解，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前来新疆是别有目的的，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前来新疆的。过去的事理，说出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徐廉现今怎样？你们的一些同志不全都开释出去，而且成了政府要员了么！你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你的文才、能力，督办都了解，只要你把你过去的一切讲清楚，政府还会重用你的，既往不咎，来日方长么！你还不满40岁，正是大有可为的日子，只看你自己啦！”

我正要接他的话，他把手一摆：

“现在不必说什么，刚来这里，回去好好想一想该怎么办。这里条件好，伙食同我们吃的一样，蹲这么些年啦，也许想吃点什么，提出来，只要在新疆能弄到的，保证给你弄到，别辜负督办对你的苦心。回去罢，好好想一想！”

他按了一下铃，那个卫士走进来，我又被蒙上头，牵回原来的号里，这时大约是午后3时左右，屋子里透过几线阳光。

诚恳——肉刑

到天主堂的第一夜，我几乎没有睡，寻思盛政权法庭又对1937—1938年案要什么把戏，这个案里的主角，绝大部分都被秘密杀害了，如张馨和加呢牙孜、马绍武、冯櫟、黄翰章等人，一般角色也有不少或遭杀害、或自消自灭了，还来折腾它干什么？

我做工犯时听说介绍我来新疆的友人徐廉于1942年秋或冬已被释出狱，与他同类的人，即盛的小同乡，留日时的朋友，绝大部分也被放出去了，而且给以官职。如徐廉，出任伊犁区行政长，何语竹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委员，康炳麟任莎东行政长，王立士任迪化市政筹备处长，宋扶摇任《新疆日报》社长，郎道衡任副社长，郭喜良任汽车局长，程支白任教育厅长。这些人中凡是

过去参加中共或其外围组织的且由盛世才亲自给他们改了名，如徐廉改名为徐伯达，何语竹——何耿光，康炳麟——康明远，王立士——王履中，宋扶摇——宋念慈。盛右转后释出这些人组成新班底，如果还算他们的帐向国民党交代又重新重用，他还给他们更名干什么？不过新疆的事就是那么回事，用常理来衡量是行不通的，多想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过了两天，我又被提到那间大屋子去，还是以前的那个法官问我考虑得怎样了。我说，我的一切都报告给督办了，我以往曾加入过中共，但自1931年后就断了组织联系，到新疆来时是什么政治组织关系也没有的。

这样过了几堂，看样子法庭是让我画这样一张图，1934——1936我们这些曾是中共党员的人，前后来新疆的是中共派来的，是有组织地企图在新疆进行地下活动，联络当地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发展组织，策划夺取政权的。

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我当然不承认。

审问我的一直是两个人，一个问，另一个作笔录，有时也问几句，新疆当地汉人口音。

过了些天，他们看指路不成功，给我上刑了。

先是一般刑，打手板，在号里打，小时候我在私塾念书时挨过手板，打上只是火辣辣的，这里打的重，震得心痛难忍，但是重板子挨过几十下后，也许是人的生理构造吧，痛上加麻，麻比痛更烈了。

那两个法官一直叫我诚恳，我说：“我住狱已经五年了，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什么隐瞒的，在这里也用不着讲什么信义忠贞，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信仰和追求的东西了，编黑造白又算得什么？可是人嘛！起码总得遵守一点做人的道理啊！”

那个主审官点了点头：“我看你有点开窍了，你要诚恳，诚恳对我们也有好处，省得跟你缠个没头了，至于你个人还会比徐廉的出路差么？他们都诚恳了，诚恳后就没事了，督办就喜欢诚恳的

人，按政府要求办事的人，有句俗话：心诚则灵，你一诚恳心就灵了，心一灵，也就彻底诚恳了。竹筒倒豆子，一个也剩不下了。”

一个月的过程中，我挨过鞭背，更震得心痛，可是鞭过一阵腹背，也产生麻木之感；我还挨过倒悬，同时用小刀刺我的脚脖子，血顺着大腿、腰眼流经我后背、脖子、脸、流进我的双眼，流进我的口，一股腥咸，我想把自己的血咽下去，但头朝下，咽不进。

法官蹲在我头下，嘴里叼着烟卷，扬头笑着对我说：“真的是，这样自寻苦恼干什么？第三国际不会给你树碑立传，它本身都没有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诚恳吧！洋人耍的把戏全揭穿了，我们都是不甘心做汉奸背井离乡的，又何苦听洋鬼子摆布呢？”

令我难忘的是坐坦克，把我锁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白天黑夜不叫我打盹，我闭上眼睛，耳边就响起呼人铃，我坐了几天几夜也记不清了，到后来真是白日睁眼做梦啦。我看见妈妈来了，我呼叫“妈妈”说：“我是巴威尔。”站在附近的法官喊起来：“你是巴威尔，好极了，你把你的代号交代出来了！”他这一叫把我从白日梦中唤醒了。

巴威尔是高尔基《母亲》中的主角，当时我神经错乱，白日梦中把若干事物错乱地搭配起来。

有一次他们把一只铜盆扣到我的头上，说：“你们知识分子脑筋复杂，这是督办说的。来！给你洗洗脑！”于是卫士用木槌敲盆边，真够受啊，嗡嗡嗡，头有山大了，多少个月后还在响呢！

有一次在刑讯时我对法官说：

“事情已经大白，我头脑昏昏，就请法官代我拟出供状，我一定在上边签字，或者法官指出几个关键，我按着它做答，省得我们彼此不安静。”

法官并未发怒，他说“还是你自己讲好，我们的话终究不是你的话啊！”

不过法官终于给我指了路，我按照他的指点，大体上画出这样一个草图：我们是中共党员，1934—1936年奉组织之命，前来新疆，到新后又与联共党员取得联系，借当时新疆的政治形势大肆活动，联络各界人士，准备伺机武装推翻六大政策政权，在新疆成立红色政权。

当时这份供词，没有事实，像我这一类的来新的青年，来新当时没有一个保有中共组织关系的，尽管这些人中有的曾是中共党员，当时在新疆既无中共组织，联共即或有组织也不会接纳像我们这一类人。至于说我们在新疆进行反盛世才政权更是无中生有，反之我们这类人都是以盛政权为靠山，忠心为他工作的。

法官这份伪供提出后，又提出一个问题，我是由谁派到新疆来的，事已至此，我胡说是由何孟雄派来的，他们竟点头认可了。其实何孟雄在我来新疆前二年已经牺牲了，这些给盛世才塑造“叛逆分子”的人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

还提出一个问题，在新疆谁是我的领导？法官似乎已不耐烦，索性说出崔国政是我们的头头，我知道崔这个人，但从来没见过，法官说见过没见过没关系，当年列宁领导成千上万布尔什维克，难道每个布尔什维克都见过列宁吗？

在盛世才的小同乡中，他右转后未释出的只有崔国政和王延龄两个人。崔北大哲学系毕业，1929年在沈阳奉天省财政厅工作时，加入中共，1930年被捕，出狱后就与组织断了关系，1934年由盛邀来新疆，作过伊犁区行政长，1937年被押，此时仍在狱中。

接着又使我吃了许多苦，要我把徐廉已释出的拉进来，我不吐口，最后由法官给我落了他替我答出的供。

“你真住狱住糊涂了，多亏你还是编报能手，这篇并不难编的文章，竟从夏初拖到秋末，你还白吃了不少苦！”法官在最后提讯的那一堂含笑说。

我说：“总算完了一件大事，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辱而后死

比苟且再生总强一些啊！你们报告督办吧！”

法官出声笑了起来，“说你糊涂你就越糊涂了，要你诚恳你偏不诚恳，好了诚恳了，你却想死，督办还能错待诚恳的人么？就是你死不诚恳，也有人代你诚恳。你就是挺刑挺死了，将来在一份笔录上还会印你的手印呀！想死容易，但是督办不会让你随意死的，说不定明天来辆马车接你回家，同妻儿团聚呢！”

“谢谢你的拜年话吧！在这样的世道上，活着还有什么意味呢！”我最后说。

“回去吧！世道总是这样，聪明人还是能活下去的。”这是法官最后一句话，看来他并不十分糊涂。

从此我再没有遇见审问我的这两个人，后来听说，那个东北人叫富宝廉，1935年或稍后些投奔盛世才来的。这时已作到公安管理处副处长，专门审讯要犯，直接秉承盛世才意旨行事，有时在审问中还与盛世才直接电话联系，那个年纪较轻的新疆人叫何贵廷，专业审讯员，但在审问我时，他很少发言。

与赵丹相处的日子

我被关进另一个新地方。

这地方，以前未听人讲过，不久了解到，这是1942年以来在第二监狱原围墙外边修筑的新监狱。是由几条甬道相通的大房子组成的，甬道两边是监舍，监舍内地板、板铺、俄式壁炉、大玻璃窗，相当讲究。屋里的设备和布置同第二监狱监舍一样，人们把这所监狱叫“新监狱”。

我被押入的号里有七八个人，有个个子比较高的30多岁的人。别人给我介绍说，他是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先生。

1940年以来，我就听难友们谈过赵丹。据说是经杜重远介绍来的。以赵丹为首的实验剧团演出过若干话剧，还协助女子学院演出了《武则天》。赵的同伴和他们的妻子——这些女人都在女子

学院工作了——曾哄动过迪化市。后来他们都被送进了监狱，可能被打进了杜重远案。

通过杜重远介绍来新疆的人，就我前后了解，被押而又被杀掉的有杜的秘书孙某，职业外交家刘某，被押而在盛倒台后出狱的有赵丹及其剧团同伴朱今明、徐涛、王惟一、易烈（此人于1944年年底病故医院），杜的随从贾文新、政论家史枚及其弟史杰、农学家屠治（此人被押最晚，被打入董林案）、杜的妻弟侯某，幸而被纵回内地的有沈雁冰（茅盾）、张仲实、萨空了、画家鲁少飞、工程师姜某。这些人是盛有意放他们回内地的。

赵丹是个平易近人的人，据他介绍身世，他是南通人，父亲作过旧军官，他早年曾在上海艺专学美术，由业余话剧演员参加了电影演出，抗战后参加了救亡运动。

他向我说了不少上海的文坛掌故，谈了鲁迅同田汉、周起应等人的关系及鲁迅斥责徐懋庸的事。

赵丹感情易于激动。我俩对当日新疆政治的幻变，认为是所谓“政治家”耍人，政治也许不会长久如此，但像盛世才这样的“政治家”，心里想的同口里宣扬的截然不同，许多人被他蒙蔽、欺骗、玩弄。他把政治糟踏得一塌糊涂，同时也把不少人领入虚无和怀疑一切的境地。

我俩谈了不少文艺创作，他存有不少剧本，其中有一部分是我改编的外国话剧，曹禺的主要剧作他都有。

赵丹性格爽朗，遇悲事放声哭，遇喜事放声笑，从不违心饰貌。

他还对我讲了他被捕后的经过，他说他坐牢的地方可能是天主堂或特别监狱。当时他被单独监禁着。审讯者要他承认他是托派，是杜重远案的骨干，是由内地的汉奸托派派来新疆阴谋推翻抗日亲苏政权，在新疆成立汉奸政府，而且逼他把沈雁冰、萨空了和若干盛政府中的首要拉进本案，把这一群人诬蔑为汪精卫汉奸组织里的骨干。

赵丹说，他受过种种毒刑，三木之下，求死不得，照法官给的框框自诬了。但肉刑过去，他又觉得这些违背良心的供词是可耻的。尤其是诬及他人，他就翻了原供。有一次他激动得扒着门眼喊：“我要翻供！”这一来看守兵们开了锁闯进独身监里打他手板，一连打折了两支木板。打完后，看守们把笔、墨水、纸给他送来，说：

“翻供吧！打你，是你犯规，不是为翻供；供可以翻，你愿意怎翻就怎翻，写吧！”

赵丹每次翻供得到的都是重刑。后来他认命了，不想翻了，反正盛政权说什么算什么，不过真相终有大白的一天。可是良心的谴责难忍，他就时时把头往土壁上撞，把头撞昏，免得再想什么而苦痛。

杜重远案的白变红

1943年，赵丹重被提审，法官直接提出赵丹这些人本来是共产党，是由第三国际和中共派来新疆搞阴谋的，企图在新疆建立红色政权，可是，为什么1939年杜重远这伙人被捕后自认是汉奸托派呢？这是因为他们早就与在新的中共人士约好了，一旦他们被政府捕押，就自认是汉奸托派，以便转移盛政府的视线，从而保护外面的同党。

于是这个原来被打成白色汉奸案变成了红色共产党案了。

实际杜重远案中人，既非汉奸，也不是共产党，他们只是倾向后者，绝无颠覆盛政府的思想行动。

当年杜重远被押后，国内外的一些名流和部分握有实权的人曾拍来电报，为杜说情，盛当然不理。杜重远大约在1943年被盛秘密杀害了（这是我出狱后了解到的），他冤沉海底无人闻问。当时新疆的白色恐怖人们都知道，但没有谁公开加以揭露，以致内地青年还以为新疆是进步省份，有的还想方设法往新疆来，向进

步刊物投函询问去新疆的途径。

在当年，政治情势扑朔迷离，非一般人所得窥，但盛政权自1937年以来所要的把戏并不高明，卒至前前后后的人为其鱼肉，新疆地理条件对盛讲是有利的，但得挣脱生还玉门的人为什么竟讳莫如深？不向广大群众揭露新疆的真相呢？这令人百思莫解。

赵丹的见闻

我与赵丹同号时，他还讲过不少狱中见闻，现在把较重要的记在下边：

盛也讲心理战。有一次赵被提到督署内的东花厅，盛亲自审问他，但询及的大都是有关上海电影界的政治情况和明星们的生活，谈话显得相当轻松。这中间盛忽然喊出赵丹的小名，这个小名据赵丹说连他的妻子和一些亲近友人都不知道。当时赵吓了一跳，盛脸上表现出得意而傲慢的颜色，意在言外地表示：“你的任何秘密也掩盖不了，我掌握了你的一切，赶快按我指的路诚恳吧！”

赵丹还对我讲过一些有关秘密杀人和引诱犯人“自诬”的事。有一年他在第二监狱的厢房里住，前面我讲过的库尔班尼牙孜建设厅长同他隔号住。一天，赵丹和他的同号难友听见监狱长王兆祥同库尔班尼牙孜讲话，劝库尔班尼牙孜吃药，两个人吵了起来，最后听动静似乎王兆祥把药灌进库尔班尼牙孜的口里。第二天早晨，一群监狱员拥入甬道，进了隔壁，抬出了一个人，又过一两天监狱员来依分放在号外的库尔班尼牙孜的东西，这个要皮靴，那个要袷衫（大衣）……后来，赵丹了解到被抬出去的那个人就是库尔班尼牙孜。从这些现象看，库尔班尼牙孜是被毒死的。

库尔班尼牙孜当年和加尼牙孜在哈密举事反抗金树仁政府，

“四·一二”政变后一年多，和加尼牙孜归顺了盛政府。参加武装活动的和加尼牙孜这一系统里的骨干，都被盛政府任以厅、道级首脑，但自1937年以来陆续被翦夷，到1942年几乎全部报销了。

1933年新疆发生政变前后，有一些从苏联混入新疆的前东大和中山大的学生，有的被留在公安部门，有的到公路局等单位工作，也有做苏联军事顾问翻译的，这些人大都在1937年被捕押，其中一部分人在1941、1942年屠狱时被杀害，被害者有的曾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有的因在作工犯时与管理人員发生磨擦，到盛世才倒台后，还剩下一些。

赵丹讲1942年4、5月间，第二监狱戒备森严，散步都取消了，夜里加双岗，这正是屠狱的日子。

赵丹还讲过法官诱人供述伪供的手法。他在号里遇见一个在伊犁驻军中当号兵的人，叫陈天保，经过毒刑拷打，陈天保诬供起来，但总不能满足法官的要求。一天，法官说帮助他来结供，就同他对坐一张桌前，法官面前摆着一张名单，法官说：“你们的阴谋组织人太多了，也许你记不清了，现在我来帮助你回忆。”然后，用铅笔指点名单上的人名，陈天保发现人名的上角有的有轻微的铅笔点，法官又总在这地方多敲几下铅笔，陈天保便说，这个人他们的同党，果然不到半小时事情就完了。不过法官有时也要花招，把陈天保按铅笔点供认的人提示陈：“你可要认真想啊！不要冤枉好人，这个人真是你们的同党么？”弄得陈天保无所适从，不知为什么，盛世才政府竟选出一名号兵作假案的造案人。我出狱后了解到，陈天保也在1942年春被杀害了。

盛世才的日子完了

我转入新监狱十几天之后，隔壁难友从窗上传来消息，说在迪化的国民党要人和由重庆派来的人都被关了起来。这是隔号人对

我们号内的原新疆学院学生李邸平讲的。

李邸平被捕快两年了。他信仰马列主义，对盛世才的看法是1942年盛归顺国民党是迫于当时的局势，并非真的叛变革命。目前这个消息使他觉得由于国际形势转变，盛会走回头路的，他们这些人和中共人士，很快就会被释出啦。他还说，他以前过堂时，他的一个同学（当时作法官呢）对他暗示过，督办的向右转不过是权宜之计，押他们乃是保护他们。

我不赞同李的看法，但也捉摸不透盛为什么要这一招。号里人议论，也许苏德战争形势转变，盛督办可能又试图再次倒向苏联，先拿镇压国民党人作姿态。他这个翻云覆雨的人会干出这种事来的。不过说盛当年右转是权宜之计，未免过分了。那位维族老人说，就是盛想再投苏联，斯大林也不会再接纳他啦。

又过几天，隔壁又传来消息，监狱准许被押人的亲属来接见了，盛世才就要走了，重庆调他去中央，新疆的新主席已经任命了，朱绍良（八战区司令长官）暂时主持省政呢。已改名为省警务处的公安管理处门前集聚了成百在押人的眷属，查问她们亲人的下落，要求接见；有人在督办公署前放鞭炮，盛世才的政权垮了。

第二天，新监狱的各号号门一下子都开放了，人们成群地聚在院子里或到别的号里。相识的人们有的笑逐颜开，高谈阔论，有的相抱痛哭，呜咽得说不出话来。

新被押在这里的国民党人也出来活动，宣扬这是重庆方面重大决策的结果，解救了在押待死的囚徒。

我见到了过去的熟人、朋友，了解到一些难友的遭遇，见着了徐廉，我俩握住手，也一时说不出话来。

徐廉说：他同何语竹等人在本年4月间再次被押，毒刑逼迫他们诬认同重庆来的人合作，阴谋武装推翻盛政府，在新疆建立红色政权。前后从重庆派来的国民党要员都成了共产党，连一向忠于国民党的所谓三民主义理论家都被戴上了“共产党”帽子。事情弄大了，盛世才把他的几名师长也押起来。他还企图诱捕驻

迪化的国民党军预七师师长李禹祥，但未成功。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飞来新疆。盛世才无法善后，向重庆申请辞职，重庆电调他到中央任农林部长，新疆省政暂由朱绍良兼理，新主席吴忠信很快就来新接任了。警务处的头头李英奇也被调转，这个单位也将由重庆派人来接管啦。

徐廉说，这个最后炮制的案子是用急急风的谱调制成的。他们4月份被捕，几天的功夫就全被屈打成招，全认了供。他说，他这几天同8月间被捕的国民党人和当地人接触中得知，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也在集人间毒刑于一堂下，把自己描绘为“共产党”，这样，供词既矛盾百出，而且像梁寒操这样的人也被牵拉为共产党，与苏联合谋，企图在新疆建立红色政权，又怎能取信于重庆呢？

“好啦！”徐廉说，“一场噩梦算做完了！想不到盛老大竟耍这样的魔术，一耍十年，害了多少人，毁了我们的大半生。”

这样乱了几天后，号门又被锁上了，秩序又大体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听说监狱长换了，是重庆派来的东北讲武堂出身的侯维城。侯同方静远是讲武堂同期同队同学，方在他的照顾下回家住了一天。通过方的关系，傅希若也回家住了一天。他俩的妻子都在女子学院教书呢。傅回来给我带来消息，我的女儿海伦在她母亲离开迪化前把她送给一位东北同乡关世杰家。关家夫妇没有子女，对海伦很疼爱。过了几天，关本人来接见我，他是个军人，在省保安司令部工作，是抗战中期来新疆的。他的母亲与盛系军人柳正欣团长的母亲是姑表姐妹。

关凭他的身份，一个晚秋天由狱中把我接到他家盘桓了半月，我见到了我的女儿海伦。我们分离时她才满两周岁，当然不会认识我这个不才的爸爸。我呢，如果事前不知道，也不会认出她就是七年长别的我的亲生女儿。关家怕引起孩子离心，没对她说明我与她的父女关系，只让她称我为周伯伯。她已经是小学生，快满九周岁了，很健康。多年监狱生活弄得我家破人也几乎亡失，

不过比起那些子散妻离、本人骨沉废窑的难友们总算幸运多了。我忍住泪，极力安定起伏的心潮。

葫芦僧了结葫芦案

盛世才在新疆的权势垮了，被他迫害的人，被他残杀了的人的妻子儿女现在同他算帐了。一时控诉他的呈文、宣言、呼吁书雪片似地飞向重庆地方机关、团体、报社……但是重庆当局不愿算这笔帐。国民党中央组织了一个“军委会新疆积案清理审判团”前来迪化，表面作个姿态，但对各案均以不了了之。连盛世才最后炮制的把梁寒操都牵进去的“红色案”都未在新疆宣布一个究竟。这个案子的主角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和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林继庸等人都是以押犯身份被国民党用飞机解往重庆。对前此的各案更不求判明真伪，被押人和被害人是否冤枉了，对盛世才及其家属和头号特务，均听任其自由晋关，未动他们毫发。盛是以行政院农林部长身份飞重庆的。他十年来掠夺人民的资财，尤其是没收的“叛逆”分子的珍宝，除了他一家人随身携带以外，则由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在国民党军的保护下运入玉门，同他一道做恶的、掳掠无厌的他的岳父邱宗濬一家、他的连襟汪鸿藻一家，他的二、三、五弟都满载车归了。

据当时官方透露的消息说，国民党认为盛世才总算把新疆这个偌大地方交给了中央政府，还把成万两黄金、黑土和若干物资移交给下一任，这是辛亥革命以来边疆大吏所未曾干过的，对这样的人算帐未免太那个了。至于冤死冤押的人民在他们心目中还算得什么呢！

盛到重庆后，作了一个时期农林部长，面子圆过后，被调任散职，光复后，去西安，又去南京，已无地盘可耍弄他的魔术。大陆解放前全家逃往台湾。

再做工犯

1944年10月，盛世才离开新疆之后，我们号里的马良骏先被释出了。他是回族中有声望的老人，新政府自然要崇敬他。接着李邸平被拨出去当工犯。

我在新监狱又转了两个号。先同徐廉搬到一个号，后来徐出去了，我又搬到傅希若住的号里。11、12两个月除了访问难友，搜集狱中见闻外，就托人找旧报、旧杂志和当时的报刊。

这年年底我被拨到第四监狱，又做了工犯。在一般号里住了几天后，被调入原视察处现为警务处第三科的楼下宿舍里。宿舍里有三张床，一张床住着该科的一个股长岳某，原是我教过的学生；一张床住着一名工犯，东北人，姓王，有精神病。我就住在第三张的空床上。有在狱里的我的那只和田皮箱发还给我，其中剩下的有一只手风琴、一双冰鞋、当年我母亲亲自给我缝的一件皮袍，还有我在第四监狱保存下来的书。

我被派到第三科司法股，抄写公文，刻腊板。一天活不多，剩下的时间我用来搜集资料，整理记事读书报。

在这期间，我得到一件宝贵资料，是存在第三科的押犯花名册，是用苏联产的十六开横蓝格的道林纸订制的。上边划有竖格，分姓名、籍贯、年龄、入狱时间、移转情况各栏。订立的时间是1937年，一直使用到盛世才离开新疆。这时，当成废品无人经管了。我同在三科的一些工犯们检核了几乎一个月，发现凡是1941年秋、1942年春、1943年秋转出而未注明去处的人犯都是被送赴刑场冤死了。我把这类人总抄下来，汉、回、满等族人计412名，其他少数民族计422名。这份资料后来由刘兴沛抄去，发表在《盛世才祸新记（之二）》。盛的四弟妻陈秀英、小岳母姚某都在名单里。在被害的汉族人中以东北籍占多数。这只是在迪化被害的人犯，全疆各区县被刑死、处决的人远远超过此数。

在当时做工犯能够到外边去。科里的一个股长掌握出门证，领到出门证就可以通过门卫走出狱门，甚至在外边住一夜也没人管。可是，有一天，我走出大门时被释出不久而被任为三科科长刘锸遇见了。刘锸在盛时期作过迪化地方法院院长，后来被押。这个人当上科长后，亲自用榔头把第三科楼内外的六角星饰物全打下去，发泄他对盛政权的仇恨。他认为他的被押都是共产党搞的。他看见我到街上去，便对那个股长交待，说我是共产党，不能给我出门证。这一来，我就出不去了。不过，当日的情况不似盛世才时期那样事事板上钉钉。过了几天，我托其他工犯要出门证，转给我，门卫认证不认人，只要把证让他看一下，就让我出去。股长也不管这些，反正不是他亲自交给我的。只要入门躲开刘锸的眼睛就万事无碍了。

方静远通过他的老同学——侯监狱长的关系，已经被释出，留在警务处作视察了。我外出时，常到他那里去，有时，也到徐廉家里去。徐廉因“黄林案”不了了之，也被释出。据他说，该案的要角如国民党人：黄如今、林继庸、宋扶摇、程东白等人，已由飞机解往重庆，孟一鸣和黄义鸣等人也同机被载走了……

1945年我们在狱中度过最后一个春节后不久，亦被释放。此时我已是妻离子散。孑身一人……

附录:

盛世才新疆十年及“阴谋暴动案”大事记

1933年4月12日，迪化发生政变，统治阶级内部，部分汉族官吏，利用留居新疆已由金树仁政府编为归化军的白俄武力推翻了金树仁政府。当时，东路总指挥盛世才夤缘取得政权，开始其十年恐怖统治。6月，盛世才以代新疆省督办身份取得军权后，在本月中旬诬蔑4月12日政变组织者串通军队，准备武装夺取政权，未经审讯，立即枪杀了参谋主任陈中、省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处长李笑天。9月，盛世才取得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督办名衔后，本月逮捕假道苏联进入新疆的吉、黑两省抗日救国军、自卫军首脑郑润成、杨耀军、杨国等多名将领（翌年元月秘密处死于督署院内的特别监狱）。并软禁省主席刘文龙（刘被禁十年，盛走后始得脱）。

1934年秋逮捕省银行行长苏上达（盛世才的老友）等官吏，诬以图谋暴动。除苏被禁十余年，盛世才走后被释，其余人均被秘密杀害。

1937年，自9月起进行全疆政治大清洗。自省委委员以下扩大及区县各界官吏、文化界人士，及普通农牧民。迄翌年夏，全疆被捕人数不下两千人。其中包括以少数民族大资本家、大地主为首的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在被捕人中确有思想意识上反对盛世才的，也有里通外国（包括苏联）分子，但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盛世才六大政策的，而且并无组织暴动，推翻盛政权的组织行动。当时盛世才是伪装革命的。

盛世才凭毒刑，迫使被捕中的一部分人自诬，同时盛世才还向苏联政府，指控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为这个“阴谋暴

动案”的策动者。阿布列索夫被调回国，即被处死。苏联派来审讯人员协助审理本案。

本案中大部分人犯多被秘密处死（执行于1941年秋和1942年春），还有不少牧民出身的人（蒙哈两族上层分子占多数）瘐死于狱中。

1939年，盛世才大批逮捕少数民族中的官吏、地方头脑和部分农牧民。诬蔑他们为帝国主义走狗，策划武装暴动，并以当年阿山牧主发动反苏暴动为口实，迫害各族人民，且把当时的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梅尼拉入案中，向苏联政府控告（此时盛世才已混入苏联共产党〔布〕），苏联派来专案人员对案中主角及造案者进行复审，被审者多推翻他们在毒刑下所作的伪供。苏联专案人员提出异议，指出该案的虚伪。盛世才反手把这个专案组诬为引诱犯人反供，向斯大林呈控，诬指专案组是帝国主义暗探。

逮捕以杜重远为首的各族官吏、军人、普通人民，诬蔑这些人是汪精卫汉奸系统下的卖国贼、托匪，锻炼成狱。案中涉及在内地的爱国人士和文教界名流。本案中人1942年春多被秘密杀害，杜重远被毒死。

1941年，苏、德战起，盛世才暗中与重庆国民党拉拢，继续逮捕官吏、人民，并诬蔑“六星社”（盛世才亲自创立的军人“革命”组织）为里通外国的“反革命”集团，逮捕思想上倾向苏联的各级军官。这年秋大屠狱，秘密杀害囚徒数百人。

1942年，盛世才派人暗杀其四弟盛世骥（苏联陆大毕业，时为新疆机械化旅旅长），诬蔑盛世骥妻子与盛世骥的小岳母姚氏被以军事顾问（苏联人）的拉托夫为首的阴谋集团所引诱，利用通奸关系，威胁利诱这两个女人暗杀政府首要人员。这一集团是盛世才伪造的。诬称苏联领事馆与在新疆的中共人员（这些人都是盛政府自1937年以来聘请来的）策动当地文武，准备在1942年4月12日发动武装政变，推翻盛政权。一时盛政府首要及各地方军政首脑、普通公务人员、大专学校师生等被审者达数百人，这些

人中包括从延安公开来的新任盛政府安排工作的人员及其家属。该案中被划定为首要人犯的在毒刑下自诬。盛世才一方报告斯大林，诬称苏联在新疆工作和外交人员为“反革命”；另一方报告蒋介石，诬称苏联、中共在新疆进行夺权建立红色政权。案中被列为要犯者包括盛世才妻子陈秀英与姚氏二人。这些人均于1943年中秋节前后被秘密处死。中共人员同时牺牲的有陈潭秋（八路军驻新疆代表）、毛泽民（省府民政厅长）、林基路（新疆学院教务长，被捕时任库东县长）等数人。

凡平素表现左倾，与中共人员或与苏联专家顾问、外交人员接近者，均被网罗该案里。捕网自1941年底即撤出，1942年春部分被捕者遭秘密杀害；4月，大屠狱，杀犯数百人。

1944年4月又炮制大阴谋暴动案，捕网撒到中学生。当时，省府军政人员与厅级干部，多被捕押。在毒刑下，把本案“锻炼”为在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馆策动下的颠覆盛政府，建立红色政权的政治案。8月，捕网撒向盛世才表面倾向重庆后由国民党派来新疆的人员，包括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长林继庸，故又称本案为“黄林案”。被捕首要者在毒刑下，诬称国民党的忠实信徒梁寒操是共产党。梁到新疆视察时与苏联驻新疆外交人员串通，准备发动政变。国民党派来新疆的军政厅干部被戴上红帽子。盛世才亲信的新疆地方部队中的师长和部分公安要员也于8月被捕押。

盛世才炮制本案，重庆方面不予肯定，同时，国民党部队1943年有两个师人陆续进驻迪化，哈密等地。盛本人无法善后，提出辞职。10月上旬盛全家离新，在重庆就任国民党政府的农林部长。

盛世才的十年恐怖统治至此告终。但他在临行前，9至10月间某夕又秘密杀害了部分囚徒。

政治案名称

东北军首脑郑润成等暴动案，1933年9月。

苏上达案，1934年9至10月。

陈中案，1936年6月。

1937—1938大阴谋暴动案，1937年9月。

阿山案，1939年3月。

阿布都色以托卡案，1939年。

杜重远案，1939年至1940年。

马良骏案（回族宗教界案），1941年。

“四·一二”暴动案，1942年。

黄林案，1944年。

上列案是十年中的大案，其他牵涉面小的政案还有不少，至于各区县所办的案件更不胜枚举。有者当时目不见称道，各大案中的档案多数还保存着。但机密性强和与苏联当局来往的文件，有者经盛世才携走；有者散失，恐难得全豹。